

各企業，兩院共同行使創制和立法權力，代表國家最高權力」；第二，「實行司法獨立原則，取消黨委審查案件的權力，法院獨立辦案，不受黨委干涉」；第三，「建立獨立農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第四，「允許各輿論機關、新聞記者獨立地報導新聞，發表評論」；第五，「基層(企、事業機關)實行直接民主，逐步直接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第六，「取消政治局，成立三個權力平衡的中央機關：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和紀檢委員會」¹³⁰——這裡顯然吸取了社會民主運動的許多訴求。

我們前面討論過，以北大為中心的校園民主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80年10月-11月勃然興起，在年初的春寒中被打壓下去的社會民主運動也乘勢而起。9月，「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毅然宣告成立，有16個省、市，共31家民間刊物加入。此種的民間組織在全國範圍的聯合，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正是在這樣的時機下，作為社會民主運動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文立，審時度勢，於1980年11月15日發表了〈促進庚申變法的建議書〉(底下簡稱為〈建議〉)，公開提出中國社會民主運動的獨立意志，提出社會民主運動對中國改革道路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訴求。其要點有二：

其一，強調「只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變法才是切實可行的道路」：「當前的中國政治形態明確地告訴我們，自下而上的變革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不想動盪，也經不起動盪了」；「中國變法的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自上而下的變革是行不通的，因為僅靠上層的變革力量難以抗拒舊體制官僚主義的反抗」，「中國的事情再也不能由少數人來辦了。應該還政於民，由全國人民來辦」。

其二，主張「以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口號代替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也即要求推行全面的改革，而非單一的經濟改革。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並提出「在當代歷史階段，確立四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即「共產黨享有指導權，人大和政協享有立法權，國家機關享有行政權，法院享有完全獨立的司法權」的設想。

為保障以上兩條改革基本路線的實行，〈建議〉特別提出了以三大自由為

130 廖蓋隆報告的「民主改革」部分發表於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3期。

核心的基本要求，即思想的自由（「放棄獨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真正實行信仰自由的原則」），言論、出版的自由；以及結社、組黨的自由。〈建議〉最後強調：「一切變法革新的著眼點在於解放人，尊重人的價值，人的權利。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¹³¹

可以看出，〈建議〉所要求的兩個方面，和我們前面所討論的北大校園民主運動中所提出的訴求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把〈建議〉看作是1978-1980年間的中國社會民主運動的一個總結性、綱領性的文件。但它卻是「最後的呼聲」，因為鄧小平很快就翻轉過來，開始行使鎮壓之權了。

這段歷史幾乎是1957年反右運動的重演。早在1980年7月，波蘭團結工會發動民主運動以後，9月時胡喬木就寫信發出中國也可能「爆發像波蘭那樣的局勢」的警告，他說：「少數持不同政見者與心懷不滿的工人群眾相結合，可能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建議必須像毛澤東在1956年發生波、匈事件時那樣制定對策。1980年財政出現了100多億的赤字，物價上漲幅度較大，於是就有了陳雲「經濟搞不好要翻船，宣傳工作搞不好也要翻船」的擔憂。¹³²鄧小平也感覺到，由他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引發的政治體制改革熱潮，黨內外民主力量的空前活躍，都超出了他允許的範圍，從而產生某種政治失控而「翻船」的危險。在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決定華國鋒「辭去」中央主席、軍委主席的職位以後，「凡是派」所造成的後顧之憂解除，鄧小平就決心要對始終是他心腹之患的社會民主運動下手了。

這中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在討論如何處理民間「自發組織」時，黨內出現了分歧。時為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早就提出「要給那些自發組織以合法地位」，胡耀邦主持的書記處主張要通過立法（《出版法》和《結社法》）來進行依法管理。¹³³陳雲則指示，不要搞什麼《出版法》，過去我們同國民黨蔣介石鬥，就是利用國民黨政府那個《出版法》去登記，鑽出版法的空子進行合法鬥爭；現在我們不能讓人家來鑽我們的空子，變非法為合法，利用合法鬥爭形

131 徐文立：〈促進庚申變法建議書〉（1980年11月15日），轉引自杜應國：《奔突的地火——一個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132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頁271。

133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頁272。

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¹³⁴

如此看來，陳雲、鄧小平，以及他們的後繼者，都懂得如何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利益，不管「法治」、「民主」的口號喊得多麼響，時至今日，中國大陸也沒有制定《出版法》、《結社法》，原因就在這裡。

於是就有了最後的結局：1981年2月20日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宣布「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必須堅決取締，對「非法刊物」絕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¹³⁵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社會民主運動的合法性。

歷史將記下這一筆：從1981年4月開始，進行了全國性的秘密大逮捕（當時有明確規定：「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¹³⁶）。在我們的歷史敘述裡，大家所熟悉的文革後期民間思想者的代表人物王希哲、陳爾晉、徐水良，1978-1980年社會民主運動的骨幹徐文立、傅申奇等都先後入獄，杜應國也被傳訊，從此處於監控之中。

一位研究者說，這是一次「決定性的逆轉」：「在中華社會上民主運動的關係上是一個里程碑」，一段始於利用、終於鎮壓的歷史由此結束。¹³⁷實際上，這對整個中國改革史而言，也是一個「里程碑」：從此，中國的改革，變成了完全由中國共產黨掌控、不受任何監督與制約、以鞏固其一黨專政的地位與利益為最高目的、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國家改革；從此，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改革被長期擱置，中國的改革變成了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

134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頁117。

135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見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4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408。

136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見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4卷（上冊），頁408。

137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98）》（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9），頁289、295。

單一的經濟改革。這樣的改革帶有鮮明的「開明專制」色彩。後來發生黨的腐敗、兩級分化、環境破壞、精神危機……等等問題，都是鄧小平全面拒絕社會民主運動的訴求，選擇了「兩個單一」（單一的國家主導、單一的經濟改革）的改革路線必然導致的結果。

民間思想者關於國家政治體制改革的一系列重要思想，他們對毛澤東思想和體制的批判（我們在上一講與本講中都有詳盡的討論），也因此被強迫遺忘，從而造成了某種程度上的思想斷裂，以至我們今天不能不面對這樣的斷裂的後果。

二、體制內經濟改革和思想啟蒙運動

然而，結束也就是開始。鄧小平改革路線，從確立到後果呈現、出現危機，是一個歷史過程。而民間的變革、反抗的力量，也依然存在，並且會以新的形式繼續發揮作用。

歷史進入了八十年代的中、後期，這個時期可以說是一個中國社會發生激烈變革——用許多人的話來說，也是空前活躍、具有活力、大有希望——的時代。但在我們的敘述裡，卻只能是一個「簡述」：主要是因為對這一段歷史，我還沒有來得及進行專門的獨立研究，只能依然從「民間」和「上層」互動的角度，說說我的初步想法，而無法充分展開，這是要請同學們原諒的。

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們在上一講中，說到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主要有四大思潮，即「政治體制改革」派、「民主、法制」派、「思想啟蒙」派與「體制內經濟改革」派。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到，在文革結束，開始有可能將民間思考轉化為社會實踐時，首先採取行動的，是主張「政治體制改革」與「民主、法制」的民間思想者。他們用街頭政治的方式，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社會民主運動，試圖以自下而上、體制外的獨立民間運動，來推動體制內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因而和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改革派產生了複雜的關係，曾有過短暫的合作，最終因鄧小平堅持毛澤東思想與體制，拒絕政治體制改革而決裂。鄧小平始終將民間改革力量視為當年的「右派」，也就像1957年的毛澤東那樣，鄧小平對他們同樣是開始時利用，在控制不住時，就翻轉過來殘酷鎮壓。

歷史運動的發展自有其邏輯，而且是無法阻擋的：正當1981年初，以青年工人和學生為主體的社會民主運動被鎮壓，其骨幹人物如徐文立、王希哲、陳爾晉、徐水良、傅申奇等「被迫退出歷史舞台」時，¹³⁸民間青年思想群體中的另一些人——主要是「體制內經濟改革派」與「思想啟蒙派」——就開始走上歷史舞台的前沿。

這又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機。

(一)農村體制改革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首先創造這一歷史時機的，是中國的農民——正如我們一再強調，考察共和國的歷史，一定要注意中國農民的動向、農民的選擇對歷史發展的影響。

我們還是從一個細節說起。

1978年12月的一個夜晚，安徽鳳陽梨園公社小崗隊18戶人家自動聚集一起，開會討論自己的出路。當時小崗村的農民生活也確實到了絕境：人均年收入不到人民幣50元，戶戶討過飯，生產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濟——這也正是文革結束時中國農民的真實處境。一個月以後，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農業問題的決定草案〉裡，就有這樣的基本估計：「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全年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於1957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集體積累不到一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¹³⁹當時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1916-)下鄉調查，所到之處，問農民的最大願望是什麼？農民回答說：第一是「吃飽肚子」，第二是「吃飽肚子」，第三還是「吃飽肚子」。萬里大為震驚並潸然淚下：「搞了快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怎麼還這麼窮！」¹⁴⁰歷史似乎又回到起點上：還是要解決中國人民的，首先是

138 我們這裡講「被迫退出歷史舞台」，主要是指他們因身繫牢獄而不能再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和政治影響，但就他們個人的政治生涯而言，這只是一段暫時的休眠而非終止或終結。

1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274。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646。

140 吳象：〈農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歷程〉，載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218。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646-647。

中國農民的「吃飯問題」。而解決辦法也還是農民在1962年就提出的「包產到戶」^{viii}，這在當時被毛澤東所拒絕，並因此引發出一系列的鬥爭，從批判「中國修正主義」、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現在，毛澤東去世了，文革也結束了，堅韌、頑強的中國農民再一次提出原初的問題：小崗村的農民對幹部說，要想有碗飯吃，只有一家一戶幹，就怕政府不允許。你們當幹部的敢不敢！副隊長表示願意為此蹲班房。群眾說，如果你蹲班房，我們願意撫養你的孩子。於是，大家達成協議：我們分田到戶，如果以後幹成，每戶保證完成公糧上繳任務；如果不成、幹部坐牢，大家保證把幹部的小孩養到18歲。各戶主在保證書上按下手印，悄悄搞起了包幹到戶。¹⁴¹

這又是一個歷史的時刻：當中國的上層還在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改革路線進行著複雜的思想、政治(包括政治權力)的鬥爭，民間社會運動也在城市底層轟轟烈烈地進行時——如我們前面所討論，這都關係著中國未來的發展，自有重大意義；中國的農民，也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了選擇，為中國的改革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契機。大概就在1978-1979年間，由安徽發軔，貴州、四川、甘肅、內蒙、河北、河南、廣東等省、自治區的一些貧困社隊的農民，都或明或暗地突破禁區，搞起了「包產到戶」或類似的「包幹到戶」，並像1962年一樣，在黨的下層、中層和高層，引起了強烈反響和激烈鬥爭。

這時，中國的最高層正逐步完成了權力的更替：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ix}上，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新設立了以胡耀邦為總書記的中央書記處，以後趙紫陽又擔任了國務院總理，實際上就基本上建立起了「鄧、胡、趙領導體制」的新格局。¹⁴²「鄧、胡、趙新體制」首先面臨的，就是如何回應農民「包產到戶」的要求。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首先表態支持，他的理由也很簡單：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關鍵是發展

141 小崗村「秘密搞包產到戶」的故事，今天在大陸已廣泛流傳。較早的研究見龔育之：〈農民的偉大首創——《起源—鳳陽農業「大包幹」實錄》的序言和前言〉，《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5期，頁25。以及徐樂義：〈安徽農村「大包幹」的起源和發展〉，《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6期，頁27-36。

142 當然，這一體制的完成還有一個過程：先是1980年12月中央政治局確定，後又通過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正式選舉，由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主席，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趙紫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生產力」。鄧小平還提出：「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因此，政策還需要「放寬」。¹⁴³趙紫陽和新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農村工作的萬里，隨即組織大規模調查，其中一個引起高層注意的，由陳一諮執筆的調查報告稱「『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在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偉大創造。正是這個偉大創造使人們看到了我國農村的曙光，而農村的曙光就是中國的希望」。¹⁴⁴到9月就形成了一個〈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中央文件，正式給予農民「包產到戶」的合法地位——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鄧、胡、趙新體制」選擇支持中國農民的要求，從而使他們主導的改革首先得到了農民的支持，並以農村改革為基礎，完全打開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這與1962年毛澤東拒絕農民要求而產生一系列後果，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在這裡要著重討論的是，中國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改革，和「鄧、胡、趙新體制」的支持，如何同時為民間改革力量的參與，創造了新的契機。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早在文革後期，以陳一諮、張木生為代表的一些民間思想者，就提出了著眼於體制內的改革，以農村的人民公社體制改革，作為中國社會變革的突破口的設想。現在，他們要投身於這場農村體制改革的洪流，就是勢所必然，或者說是水到渠成了。

其實，對這一歷史時機的到來，陳一諮等早有綢繆。在文革後期，他就在河南聚集了一批高幹子弟，並且和胡耀邦、鄧力群(1915-)(在八十年代他們分別是鄧小平、陳雲的得力幹將)建立了聯繫。文革後，經過各方力量的聚集、準備，在鄧力群等的支持下，於1981年2月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底下簡稱為「發展組」)，小組的最初成員就有陳一諮、張木生等當年民間思想村落的骨幹。還有一批也是下鄉知青，他們是在恢復高考進入大學，受到了完整的現代教育(主要是經濟學和社會學)，有志農村改革的在校大學生和畢業生¹⁴⁵——請注意這個時間：我們剛才介紹過，也是在1981年

143 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15-316。

144 〈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關於安徽省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考察報告〉(1980年7月)，此時陳一諮已經調到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工作。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北京：知識出版社，1985)，頁53。

145 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的另兩位支持者，是時為國家農委副主任，後來是中共農村政策制

2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了〈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強力扼殺了方興未艾的社會民主運動；而代表了另一股民間改革力量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也就在這一個月成立，從此登上了歷史舞台。兩件事發生在同一個月，或許有些偶然，但終結與開始的同時性卻是必然的，這意味著，當體制外的民間改革運動受到壓制時，體制內改革的民間參與，就同時開始了。

下面這段話，大概可以作為「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宣言：

我們從事理論研究的基本態度是：站在中國農村發展的立場上，站在八億農民的立場上，站在振興中華民族的立場上；既要具有時代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又要具有歷史的眼光，現實的眼光；既要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也要探索與此相適應的、中國自己的農村發展的基本理論問題。¹⁴⁶

這裡有四個值得注意的基本點。其一，強調「站在振興中華民族的立場上」，這批年輕人從一開始就把自己個人的發展融入到民族振興大業裡，這是那一代人的必然選擇，也是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而把重心放在民族、國家發展目標，不再突出文革時期最為看重的社會主義理想，這其間的微妙變化，則耐尋味。

其二，強調「站在八億農民立場上」，這是典型的民間思想者的語言、姿態與立場，自然是和小組成員「文化革命時間都在農村生活、勞動過，瞭解農村，對農民有感情」有關，¹⁴⁷更和他們把中國改革的「立足點」放在「中國農村的發展」這一選擇直接相關，而這樣的中國變革與發展道路的思路，是在文革後期的思考中就已經初步形成的。這些，都顯示了發展組的「民間性」，和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文革後期「民間思想村落」具有明顯的延續性，和1978-1980

定的具體主持者的杜潤生，和社科院農經所副所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兼農業局長王耕今。鄧力群當時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高層的主要參謀。

146 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方法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工作的初步構想〉（1980年10月），《農村·經濟·社會》第1卷，頁13。

147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北京六四屠殺的背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頁36。

年的社會民主運動也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在「六四」之後，陳一諮也匯入體制外的反抗運動絕非偶然，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

其三，強調「時代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則顯示出和文革後期不同的、新的時代特點：八十年代的中國，已經開始向世界開放，因此，發展組的成員比之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者，顯然更具有全球眼光，並且對西方世界有更深入、具體的了解。這同時也是那些與世界隔絕的計劃經濟格局裡成長起來的中、老年經濟學者所不能及的。成員們給自己規定的歷史任務，是尋找一條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樣，他們也就抓住了新時期的時代主題，並且和同樣關注這些問題的中共黨內最具活力的部分——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高層、中層領導，和一大批長期受到壓制，而終於獲得精神解放和力量釋放的黨內高級知識分子——取得了思想的共識，並從他們那裡，獲得有力的支持。

其四，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時，特別強調了「基本理論問題」，這是最能顯示發展組的眼光與特色的。他們專門寫文章論證：減少改革的盲目性、隨意性和多變性的關鍵，是要有適合中國農村發展實際的科學理論、戰略與政策；而科學的理論、戰略、政策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研究基礎上；科學的研究又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並且要把作為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的中間環節的「戰略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¹⁴⁸——應該說，發展組成員的理論眼光、興趣與修養，和他們成長於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的大環境、大背景直接相關，是和我們前面討論的民間思想者一脈相承的。

這樣，這批有志於為中國的改革作出獨立貢獻的年輕人，就在八十年代初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找到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和位置。據說，小組的命名，是經過精心考慮的：「農村」自然是標明基本立足點；「發展」則是突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促進發展，而且是農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進而通過農村發展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研究」更是一個基本定位，目標是要「探索適合中國自己的農村發展道路的理論問題」，因此，所關注的更是「發

148 參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原載《農業經濟叢刊》1981年第3期，現收錄於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第1卷，頁III-vi。

展戰略問題」，並同時強調研究的專業性和開創性。如小組的組織者陳一諮所說，「成員們都在大學受過專業教育」，「不受教條束縛，敢於提出獨立的意見」。¹⁴⁹這就表明，他們所自覺選擇的，是一條專業化的發展戰略的研究，以此來為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理論支持，並為最高領導層的決策提供諮詢，進而影響中國的改革方向與進程的道路。這樣，就和在此之前那種以直接發動民眾的街頭政治的方式，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為目的的民間社會運動區別開來，也不同於學院和政府機構裡的研究；它要推進的是以農村體制改革、經濟改革為突破口、體制內的漸進式改革——這在當時中國的歷史條件下，是一個相當獨特的選擇，即他們要在「官方」和「民間」之間的灰色地帶來尋找和開拓自己的發展空間。這就在純粹的、激進的民間運動遭到鎮壓以後，為民間改革力量的聚集和繼續發揮作用，打開了一個新的空間，以一種更加曲折的方式來實現「上下結合」——政府主導與民間參與的結合。但這同時也就面臨著新的問題：如何在黨和政府的主導下，保持相對獨立自主性，即自身的民間性。而與高層政治的密切聯繫，也給自身命運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並最終可能成為高層政治鬥爭的犧牲品。

今天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他們所要建立的，實際上是一個智庫式的職業化研究機構，所要發揮的是「智囊團」的作用。這在西方民主政治中是一個行之有效的方式，但在中國卻是一個全新的嘗試：在毛澤東的政治中，不需要、也不允許這樣的獨立智囊團存在，毛澤東體制裡的「政策研究室」，不過是為其個人獨斷的決策服務的祕書班子。鄧小平也延續了毛澤東的思路與做法，只有胡耀邦、趙紫陽這種具有新的胸懷、眼光和民主作風、善於接受新生事物的領導人才有可能接受一種新的決策方式。趙紫陽是在1981年底，看到發展組〈「雙包到戶」地區農村發展的問題和趨勢——安徽省滁縣地區農村綜合報告〉¹⁵⁰以後，才注意到「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趙紫陽在主持經濟體制改革時，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處處遇到現行官僚體制的掣肘，他深感「只是在體制內兜圈子，轉來轉去始終難以『活』起來」，他的辦法就是「發展

149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北京六四屠殺的背後》，頁36。

150 這一報告由陳一諮、孫方明執筆，文收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第1卷，頁79-99。

各企業，兩院共同行使創制和立法權力，代表國家最高權力」；第二，「實行司法獨立原則，取消黨委審查案件的權力，法院獨立辦案，不受黨委干涉」；第三，「建立獨立農會，以維護農民利益」；第四，「允許各輿論機關、新聞記者獨立地報導新聞，發表評論」；第五，「基層(企、事業機關)實行直接民主，逐步直接選舉自己的領導人」；第六，「取消政治局，成立三個權力平衡的中央機關：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和紀檢委員會」¹³⁰——這裡顯然吸取了社會民主運動的許多訴求。

我們前面討論過，以北大為中心的校園民主運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於1980年10月-11月勃然興起，在年初的春寒中被打壓下去的社會民主運動也乘勢而起。9月，「中華全國民刊協會」毅然宣告成立，有16個省、市，共31家民間刊物加入。此種的民間組織在全國範圍的聯合，是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正是在這樣的時機下，作為社會民主運動最有影響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徐文立，審時度勢，於1980年11月15日發表了〈促進庚申變法的建議書〉(底下簡稱為〈建議〉)，公開提出中國社會民主運動的獨立意志，提出社會民主運動對中國改革道路的基本思路和主要訴求。其要點有二：

其一，強調「只有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的變法才是切實可行的道路」：「當前的中國政治形態明確地告訴我們，自下而上的變革是不可能的。因為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不想動盪，也經不起動盪了」；「中國變法的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自上而下的變革是行不通的，因為僅靠上層的變革力量難以抗拒舊體制官僚主義的反抗」，「中國的事情再也不能由少數人來辦了。應該還政於民，由全國人民來辦」。

其二，主張「以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口號代替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也即要求推行全面的改革，而非單一的經濟改革。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政治體制的改革，並提出「在當代歷史階段，確立四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即「共產黨享有指導權，人大和政協享有立法權，國家機關享有行政權，法院享有完全獨立的司法權」的設想。

為保障以上兩條改革基本路線的實行，〈建議〉特別提出了以三大自由為

130 廖蓋隆報告的「民主改革」部分發表於香港《七十年代》1981年第3期。

式同我們鬥，要讓他們登記無門，一律取締。¹³⁴

如此看來，陳雲、鄧小平，以及他們的後繼者，都懂得如何維護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利益，不管「法治」、「民主」的口號喊得多麼響，時至今日，中國大陸也沒有制定《出版法》、《結社法》，原因就在這裡。

於是就有了最後的結局：1981年2月20日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宣布「所謂非法刊物和非法組織，就是指違反憲法和法律、以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為宗旨的刊物和組織」，他們「打著『民主』、『自由』、『人權』、『改革』等旗號，進行反對黨反對社會主義的活動」，必須堅決取締，對「非法刊物」絕不允許「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發行，達到合法化、公開化」，¹³⁵這就從根本上取消了社會民主運動的合法性。

歷史將記下這一筆：從1981年4月開始，進行了全國性的秘密大逮捕（當時有明確規定：「對非法刊物、非法組織的處理，不要登報、廣播」¹³⁶）。在我們的歷史敘述裡，大家所熟悉的文革後期民間思想者的代表人物王希哲、陳爾晉、徐水良，1978-1980年社會民主運動的骨幹徐文立、傅申奇等都先後入獄，杜應國也被傳訊，從此處於監控之中。

一位研究者說，這是一次「決定性的逆轉」：「在中華社會上民主運動的關係上是一個里程碑」，一段始於利用、終於鎮壓的歷史由此結束。¹³⁷實際上，這對整個中國改革史而言，也是一個「里程碑」：從此，中國的改革，變成了完全由中國共產黨掌控、不受任何監督與制約、以鞏固其一黨專政的地位與利益為最高目的、單一的自上而下的國家改革；從此，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改革被長期擱置，中國的改革變成了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

134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頁117。

135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見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4卷（上冊），（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頁408。

136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處理非法刊物非法組織和有關問題的指示〉（1981年2月20日）。見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4卷（上冊），頁408。

137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98）》（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9），頁289、295。

歷史運動的發展自有其邏輯，而且是無法阻擋的：正當1981年初，以青年工人和學生為主體的社會民主運動被鎮壓，其骨幹人物如徐文立、王希哲、陳爾晉、徐水良、傅申奇等「被迫退出歷史舞台」時，¹³⁸民間青年思想群體中的另一些人——主要是「體制內經濟改革派」與「思想啟蒙派」——就開始走上歷史舞台的前沿。

這又是一個新的歷史時機。

(一)農村體制改革和「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

首先創造這一歷史時機的，是中國的農民——正如我們一再強調，考察共和國的歷史，一定要注意中國農民的動向、農民的選擇對歷史發展的影響。

我們還是從一個細節說起。

1978年12月的一個夜晚，安徽鳳陽梨園公社小崗隊18戶人家自動聚集一起，開會討論自己的出路。當時小崗村的農民生活也確實到了絕境：人均年收入不到人民幣50元，戶戶討過飯，生產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濟——這也正是文革結束時中國農民的真實處境。一個月以後，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下發的〈關於農業問題的決定草案〉裡，就有這樣的基本估計：「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全年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於1957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集體積累不到一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¹³⁹當時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1916-)下鄉調查，所到之處，問農民的最大願望是什麼？農民回答說：第一是「吃飽肚子」，第二是「吃飽肚子」，第三還是「吃飽肚子」。萬里大為震驚並潸然淚下：「搞了快三十年的社會主義，怎麼還這麼窮！」¹⁴⁰歷史似乎又回到起點上：還是要解決中國人民的，首先是

138 我們這裡講「被迫退出歷史舞台」，主要是指他們因身繫牢獄而不能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和政治影響，但就他們個人的政治生涯而言，這只是一段暫時的休眠而非終止或終結。

13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頁274。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646。

140 吳象：〈農村第一步改革的曲折歷程〉，載杜潤生主編：《中國農村改革決策紀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頁218。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646-647。

生產力」。鄧小平還提出：「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因此，政策還需要「放寬」。¹⁴³趙紫陽和新任國務院副總理、負責農村工作的萬里，隨即組織大規模調查，其中一個引起高層注意的，由陳一諮執筆的調查報告稱「『包產到戶』是中國農民在我國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偉大創造。正是這個偉大創造使人們看到了我國農村的曙光，而農村的曙光就是中國的希望」。¹⁴⁴到9月就形成了一個〈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幾個問題〉的中央文件，正式給予農民「包產到戶」的合法地位——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鄧、胡、趙新體制」選擇支持中國農民的要求，從而使他們主導的改革首先得到了農民的支持，並以農村改革為基礎，完全打開了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這與1962年毛澤東拒絕農民要求而產生一系列後果，形成了鮮明對比。

我們在這裡要著重討論的是，中國農民自發的「包產到戶」改革，和「鄧、胡、趙新體制」的支持，如何同時為民間改革力量的參與，創造了新的契機。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早在文革後期，以陳一諮、張木生為代表的一些民間思想者，就提出了著眼於體制內的改革，以農村的人民公社體制改革，作為中國社會變革的突破口的設想。現在，他們要投身於這場農村體制改革的洪流，就是勢所必然，或者說是水到渠成了。

其實，對這一歷史時機的到來，陳一諮等早有綢繆。在文革後期，他就在河南聚集了一批高幹子弟，並且和胡耀邦、鄧力群(1915-)(在八十年代他們分別是鄧小平、陳雲的得力幹將)建立了聯繫。文革後，經過各方力量的聚集、準備，在鄧力群等的支持下，於1981年2月成立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底下簡稱為「發展組」)，小組的最初成員就有陳一諮、張木生等當年民間思想村落的骨幹。還有一批也是下鄉知青，他們是在恢復高考進入大學，受到了完整的現代教育(主要是經濟學和社會學)，有志農村改革的在校大學生和畢業生¹⁴⁵——請注意這個時間：我們剛才介紹過，也是在1981年

143 鄧小平：〈關於農村政策問題〉(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文選》第2卷，頁315-316。

144 〈農村的曙光，中國的希望——關於安徽省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考察報告〉(1980年7月)，此時陳一諮已經調到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所工作。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北京：知識出版社，1985)，頁53。

145 農村發展問題研究小組的另兩位支持者是，時為國家農委副主任，後來是中共農村政策組

年的社會民主運動也有著內在的一致性，在「六四」之後，陳一諮也匯入體制外的反抗運動絕非偶然，這是我們首先要注意的。

其三，強調「時代的眼光，世界的眼光」，則顯示出和文革後期不同的、新的時代特點：八十年代的中國，已經開始向世界開放，因此，發展組的成員比之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者，顯然更具有全球眼光，並且對西方世界有更深入、具體的了解。這同時也是那些與世界隔絕的計劃經濟格局裡成長起來的中、老年經濟學者所不能及的。成員們給自己規定的歷史任務，是尋找一條在全球化時代「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這樣，他們也就抓住了新時期的時代主題，並且和同樣關注這些問題的中共黨內最具活力的部分——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高層、中層領導，和一大批長期受到壓制，而終於獲得精神解放和力量釋放的黨內高級知識分子——取得了思想的共識，並從他們那裡，獲得有力的支持。

其四，在探索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時，特別強調了「基本理論問題」，這是最能顯示發展組的眼光與特色的。他們專門寫文章論證：減少改革的盲目性、隨意性和多變性的關鍵，是要有適合中國農村發展實際的科學理論、戰略與政策；而科學的理論、戰略、政策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研究基礎上；科學的研究又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並且要把作為基礎理論研究與應用研究的中間環節的「戰略研究」放在突出的地位¹⁴⁸——應該說，發展組成員的理論眼光、興趣與修養，和他們成長於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村落的大環境、大背景直接相關，是和我們前面討論的民間思想者一脈相承的。

這樣，這批有志於為中國的改革作出獨立貢獻的年輕人，就在八十年代初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找到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和位置。據說，小組的命名，是經過精心考慮的：「農村」自然是標明基本立足點；「發展」則是突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促進發展，而且是農村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發展，進而通過農村發展促進中國社會的發展；「研究」更是一個基本定位，目標是要「探索適合中國自己的農村發展道路的理論問題」，因此，所關注的更是「發

148 參看：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原載《農業經濟叢刊》1981年第3期，現收錄於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第1卷，頁III-vi。

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成分，這一塊先搞『活』了」，以此推動體制內的改革；趙紫陽後來總結說：「這是中國改革的特色」。¹⁵¹ 由此而形成了「趙紫陽的改革策略」，即繞開現行官僚體制，在體制外尋求突破。趙紫陽後來一再稱讚「戈爾巴喬夫有效地擺脫了保守勢力及共產黨組織的阻擾，而成立了總統和政府直接領導下的一個委員會，來進行改革」，也是在體制外尋求政治突破。¹⁵² 現在，趙紫陽正是從發展組看到了繞過官僚體制，把體制外的，更具有現代思想和知識，更具活力的年輕人吸納到體制內，又保持相對獨立性，進行創造性的改革研究，成為決策的另一種信息來源的新的可能性。這樣，具有開拓精神的、新的黨的領導人，和具有活力的、來自民間的年輕一代改革者之間，就獲得默契和溝通。據說，趙紫陽對這些年輕人曾有過這樣的評價：「一大批三、四十歲的中青年成長起來了，他們上過山，下過鄉，瞭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又學了各種理論，思想上框框比較少。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服務，為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服務」。¹⁵³

1982年2月，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一致同意，要用幾年時間，從各大學選拔300-400個插過隊、後又考上大學或讀研究生的年輕人到各研究機構和有關國家部門，從事農村改革研究，並發布了專門文件。「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也因此迅速發展壯大，從1982年開始，連續5年參加了關於農村改革的中央一號文件的制定過程，成為中共農村改革的弄潮兒。¹⁵⁴ 到1985年初，又正式成立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底下簡稱為「體改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創造了第一個為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時，又在研究、人事、財務等方面，擁有高度自主權的研究機構」。¹⁵⁵ 有了這樣的研究機構，這批平均年齡僅有35歲的中國「青年經濟學家」¹⁵⁶ 在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六四」之

151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頁46。

152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4。

153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北京六四屠殺的背後》，頁74。

154 參看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461-465。

155 【美】凱瑟琳·奎塞（Catherine Keyser）著，方治立譯：《體改所與政策制定——毛以後中國的專業化研究》（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113。

156 這是他們在八十年代獲得的一個共名，他們先後成立了「北京青年經濟學會」，出版了《青

後，隨著趙紫陽下台，「體改所」也於1990年被解散，陳一諮等流亡到國外，之後參與國外的反抗運動；留在國內的，有一部分就逐步成為政府官員，依然主導著中國農村的改革和發展，像王歧山(1948-)就進入了國家領導層；有的則成為大學裡的著名的經濟學者，依然對中國經濟改革擁有重要影響——不過，這都已經是後話了。

關於「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和「體改所」是需要專門另作研究的，¹⁵⁷這裡只想針對他們與毛澤東的關係略做討論。有兩篇文章頗值得注意。發展組的一位重要成員王小強(1952-)曾寫過一篇〈農業社會主義批判〉，和我們前面討論中提到的民間刊物上發表的批判文章一樣，都著眼於自覺地清理曾經深刻影響過自己的毛澤東思想。清理的重心，則是對「人民公社體制」的批判，這顯然是為新的農村改革開路的。也就是說，這些年輕的改革者首先是通過「告別毛澤東」而走向改革之路的。¹⁵⁸而在另一篇我們已經提及的〈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裡，他們在作出以農村改革作為整個中國改革的突破口與立足點的改革戰略選擇時，又以毛澤東的兩個論斷作為論證基礎：「中國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¹⁵⁹「農民的情況如何，對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係極大」。¹⁶⁰他們正是在毛澤東的以農村作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基地的戰略思想的啟示下，把自己的改革思想根植於「十億人口，八億農民，是中國最基本的國情」這一基點上；基本國情不變，中國的改革也必須以農村體

年經濟學者》叢書，創辦了《中青年經濟論壇》。

157 我另寫有〈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的歷史背景，作用與經驗〉一文，未刊稿。

158 〈農業社會主義批判〉一文裡，強調「(農業社會主義)它的反動性，倒不在於它的空想成分不能實現，而在於它的實質內容本身就是對自己空想成分的否定」，「當農業社會主義消滅不平等的幻想破滅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要走上加強與小生產相適應的專制統治，靠超經濟的行政權力來恢復和鞏固自然經濟的道路」，這都是抓住了曾經給這一代人以深刻影響的毛澤東式的社會主義思想的要害的，和王希哲、杜應國對「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一致，都具有「走出毛澤東」的性質。原文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寫作組編《未定稿》49期(1979年12月15日)，後收《劉少奇與新中國》，前述引文見該書頁249。

159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652。

160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79。

制改革為突破口。¹⁶¹這就意味著，他們的改革之路又是從毛澤東出發的。

既「走出毛澤東」、又「從毛澤東出發」，這充分反映了八十年代的中國年輕一代改革者和毛澤東之間極為纏繞的關係。而且他們自己也不回避毛澤東對他們在精神氣質上的影響，按其中一位成員回憶中的說法，「那時，確實有一點毛澤東當年『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的味道」。¹⁶²我們通常能夠在八十年代的改革者那裡，發現毛澤東(特別是青年毛澤東)的身影，其中有些人還因為集中了毛澤東精神氣質中的正面和負面，而被稱作「小毛澤東」，這都是很有意思的精神現象。

(二)民間學術文化運動

1982年5月19日，《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正式成立——這又是一個標誌性的文化事件，它標示著「八十年代中國民間學術文化運動」¹⁶³的興起。

這一運動，同樣孕育於文革後期對「新思想啟蒙運動」的呼喚。文革結束後，在思想、文化界，首先提出的口號就是「思想解放，衝破禁區」，並且開始在官方主持下，有了民間力量的聚合。除了大量學術團體恢復與重建外，更有以刊物為中心的聚合。用一位研究者的話說，刊物「雖由官方主辦，卻更像是知識分子『自己的園地』」。¹⁶⁴八十年代初影響最大的，有三大刊物：《自然辯證法通訊》(1977年底創刊)、《讀書》(1979年4月創刊)和《未定稿》(1978年底創刊)。《讀書》提出「讀書無禁區」的口號，《未定稿》對毛澤東時代法定或公認的觀念所提出的質疑，涉及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各

161 〈認清國情，加強農村發展的綜合研究〉，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第1卷，頁IV、III。

162 張少傑：〈校後跋〉，【美】凱瑟琳·奎塞著，方治立譯：《毛以後的中國專業化研究：體改所與政策制定》，頁559-560。

163 這是《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金觀濤的命名，見其《從〈走向未來〉到〈河殤〉——八十年代中國民間學術思想文化運動的研究》。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460頁。

164 李懷宇：〈沈昌文以文會友辦雜誌「談情說愛」當編輯〉，南方網，2006年4月5日，<http://www.southcn.com/nfsq/ywhc/l/200604050346.htm>。

個領域，¹⁶⁵《自然辯證法通訊》對西方科學哲學及其他新思想的介紹，它們都在知識界和社會上，特別是在青年中產生幾乎是爆炸性的影響。這些刊物的作者主要是老一代的知識分子，包括黨內的知識分子，同時又逐漸吸納了中年和青年作者，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學人的結合。

中、青年學者逐漸開始了在老一代學者支持下的獨立集合。這主要是一批文革中畢業的大學生和在讀的研究生，以及靠文革自學的成績被招入研究機構的中、青年。他們都有底層生活的經驗，大都屬於文革後期的民間思想者，有著強烈的社會、民間關懷，突破禁區、進行獨立思考與研究的願望、要求與能力，渴望用自己的獨立研究促進中國的改革，推動繼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的又一次思想啟蒙運動。

但他們剛起步就遭到體制的阻截：1980年金觀濤、王小強、林春（1952-）、李銀河（1952-）等分屬於科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青年研究者，試圖創辦《青年文稿》叢刊，第一集《歷史的沉思》還未出版，就被中共中央宣傳部認定為非法出版物，而扼殺於搖籃中。¹⁶⁶而到了1981年，當局宣布民間刊物和民間組織為非法，就逼迫人們用更為迂迴的方式，尋找民間聚合、獨立發言的新的文化空間。

這才有了前述經過1981年整整一年的準備、於1982年成立的《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其特點有三：首先，它是「官辦」的，屬於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研究所領導，因而具有合法地位。但它卻具有極大的獨立性：青少年所不能撤換其主編和編委、不過問出書的具體事務、不干涉編委會內部運作，因而具有極強的「民辦性」，如金觀濤所說，它「實質上是民間的，個人性質的」¹⁶⁷——和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一樣，《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同樣是在「國家」與「民間」之間的灰色地帶找到了自己的發展空間，在國家嚴禁民間刊物的情況下，在其縫隙處，依然發出了民間的聲音。其二，它用「編委會」的合法形式，實現了民間改革力量的聚合，同樣是在國家嚴禁民間組織存在的情況下，建立了不具組織形態的民間組織。其三，它採取了如下生存策略：「在

165 參看李凌：〈勇破堅冰的《未定稿》〉，《書屋》2003年第1期，頁4-19。

166 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頁460。

167 金觀濤：《從《走向未來》到《河殤》——八十年代中國民間學術文化運動的研究》，頁17。
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461。

思想學術上大膽冒險、敢於創新，但在政治上絕不踩線」¹⁶⁸——這樣的策略絕不消極，而是在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主要訴求的民間社會運動受阻之後，選擇了一個新的進攻方向：開展民間學術文化運動，以求思想學術上的突破，更著眼於「中國文化的重建」。¹⁶⁹這是一個帶有根本性的戰略選擇。

刊物或叢書編委會此後就成為八十年代民間思想文化運動的主要組織形式，影響比較大的，除《走向未來》叢書之外，還有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青年經濟學者》叢書、《中青年經濟論壇》、¹⁷⁰《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其主要成員是北大和社科院的學習西學的博士，甘陽（1952-）是其組織者）、《青年論壇》（湖北省社科院主辦，全國第一個自負盈虧的刊物，主編李明華（生平不詳））、《新啟蒙》叢刊¹⁷¹（王元化（1920-2008）主持，創辦於1988年10月，雖僅出版了4期，但他們所提倡的「新啟蒙」卻在學界不脛而走、迅速擴散，產生了很大影響）。此外，還有由湯一介（1927-）、龐樸（1928-）等主持的「中國文化書院」^x。對於他們所進行的思想、文化、學術活動，及其影響（每一個刊物或叢書不僅聚集了一批學者，而且培育了大量的讀者，成長於八十年代、喜歡讀書與思考的青年幾乎沒有不受到影響的），還需要進行更專門的研究，這裡只能提出一個題目。

不過，按照本書的體例設計，還是要講一點毛澤東和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運動的關係。從總體而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想啟蒙，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從在文革中達到極點的「毛澤東崇拜」中解脫出來、從毛澤東思想專制所造成的思想蒙蔽裡解放出來。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新時期改革運動的需要，如前面提到的對毛澤東農業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是為農村體制改革開路的。當時幾乎每一個學科的發展，都首先要對占據主導地位的毛澤東的有關論述提出質疑，以此作為突破口。

168 金觀濤：《從《走向未來》到《河殤》——八十年代中國民間學術文化運動的研究》，頁17。
轉引自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461。

169 見金觀濤：《我的哲學探索》，頁52。

170 參看【美】凱瑟琳·奎塞著，方治立譯：《體改所與政策制定——毛以後中國的專業化研究》，第六章：「從叢書熱到民間熱：追求專業化的呼聲」，頁193-230。

171 《新啟蒙》叢刊每期一個書名，從1988年10月到1989年2月共出了4期，書名分別為《時代與選擇》、《危機與改革》、《論異化概念》、《廬山會議教訓》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某些思想也成為新的思想解放運動的資源。這裡可以講一個最後引發了上層鬥爭的「故事」。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與啟蒙運動其實有一個中心主題，就是「以人道主義反對專制主義」。我們在前面講到北大學生競選運動中所提出的「一切為了人」的改革目標，也是此種思潮的一個突出表現。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有關人道主義的討論，一開始就和異化問題聯繫了起來」，¹⁷²早在1979年，高爾泰(1935-)(錢註：美學家，曾被打成「右派」，改正後在蘭州大學哲學系任教)在〈異化及其歷史考察〉、〈異化現象近觀〉裡，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異化現象；1980年哲學家王若水(1926-2002)也從思想、政治、經濟三方面的異化，對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提出了尖銳批判。¹⁷³1983年周揚在中共中央黨校作了一個〈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進一步提出了「權力的異化」問題：「由於民主和法制的健全，人民的公僕有時會濫用人民賦與的權力，轉過來做人民的主人，這就是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叫權力的異化」。¹⁷⁴這就觸及到了中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問題，從而引起了黨內「老左派」胡喬木等人的強烈反應，並上告鄧小平。有意思的是，周揚上書鄧小平為自己辯護時，搬出了毛澤東，說毛在1964年就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這是可信的，毛澤東提出「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其實就是承認社會主義可能發生「權力的異化」；如果借用文革中「毛澤東主義者」的說法、承認社會主義的異化現象，這正是毛澤東思想「最革命，最激進」的部分，但恰恰是八十年代的鄧小平所要拋棄的。因此，周揚借毛澤東以自辯，結果反而引起了鄧小平強烈的反彈，他這樣反問道：「周揚同志講毛主席1964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啊？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繫說到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只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啊？」¹⁷⁵——我們多次說過，毛澤東思想的主體部分是維護一黨專政體制的，但它也有要衝擊官僚體制的思想與實踐這一面。八十年代以來鄧小平和他的繼承者始終堅守的是毛澤東思想中維護體制

172 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452。

173 參看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頁452-453。

174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第4版。

175 鄧小平和鄧力群的講話(1983年9月30日)，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頁413。

的主體部分，而體制的批判者也常要利用毛澤東思想中具有批判性的一面，這都構成了在「後毛澤東時代」裡，毛澤東影響的複雜性。

(三)我和安順朋友的選擇

這裡，我想補述一個問題：我和我的安順朋友在八十年代的選擇。這個問題我在《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裡已經有比較詳細的論述，在本講裡，只能作一個概述。¹⁷⁶

主要講兩點。一是在歷史轉折時刻我們的猶疑。如前所介紹，我們在文革後期的民間思考裡，堅持的是「毛澤東後期思想」，關心的是「特權階級的產生」和「社會主義民主」兩個問題，總體是接近陳爾晉那一派思想的；在民主牆期間，陳爾晉還專程來到安順，造訪了杜應國和我們一幫安順朋友。在政治上，我們既反感「四人幫」這些文革新貴，又對周恩來、鄧小平這些黨官僚持有高度警戒，而把希望寄託在毛澤東身上，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還是毛澤東主義者。這就決定了我們在歷史轉折關頭的猶疑態度。比如對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我們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一方面，我們對文革專政的批判深有同感，但另一面，事件本身所傳達出的那種明確不誤的「擁鄧」傾向，又讓我們隱隱擔心這會把歷史引向黨官僚專政的復辟。後來，我們把華國鋒等抓捕四人幫之舉，判斷為「右派政變」，也是出於這樣的隱憂——我到現在還記得很清楚：當我們所在的小城市也在舉行「歡呼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的遊行時，我們幾個朋友卻爬上城市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冷眼旁觀」；其實我們內心是非常矛盾的，我們知道，自己應該為四人幫的倒台而高興，畢竟我們早就對他們在極左旗號下行專政之實有尖銳的批判，但我們又確實高興不起來，我們擔心會從此拋棄毛澤東的旗幟：在我們心目中，毛澤東依然是民眾利益的維護者。尤其讓我們哭笑不得的是，我們清楚地記得，就在不久之前，就在這座小城，就是這些群眾，還在歡呼「粉碎鄧小平右傾翻案風的偉大勝利」，轉眼之間又在歡呼性質完全不同的「偉大勝利」了。我們由此感到中國

176 詳參錢理群：〈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大陸社會民主運動：杜應國《奔突的地火——一個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序〉（2007年10月7日-30日），《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221-330。尤其是當中「一九七六：社會民主運動第一次爆發，歷史轉折時我們的判斷」一節。

政治的荒謬和殘酷，以及自身的無奈，於是只能沉默。但後來我們還是手抄了一本《毛澤東論文化大革命》的小冊子，封面上寫著「以此紀念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幾個字。這本小冊子，我至今還保留著——不管我們在這歷史轉折關頭的認識和態度是否正確，也不知道我們這樣的反應，在當時的中國有多大的代表性，但這都是曾經有過的，是我個人以及我們這一群人的真實歷史記錄，就讓它留存吧。

當然，我們後來對此有過反省：其一，我們的失誤與悲劇在於，儘管我們同時反對文革新貴和黨官僚，卻「沒有看清毛澤東其實就是這兩大既得利益集團『老官僚』和『新貴』的總代表，我們所應面對與批判的正是『毛澤東專制主義』」。其二，我們對局勢的判斷嚴重失誤，一旦「面對現實，面對毛、鄧之間的對立和衝突，便只有陷入左支右拙，進退失據的二難之境」，我們甚至不能把握「人心的相背」，不懂得經過十年折騰以後，人們對永無休止的「運動」、「鬥爭」產生了極度的厭倦，因而渴望安定、恢復正常的生活秩序，希望得到明顯的物質生活的改善。因此，在「毛澤東的『走資派還在走』和鄧小平的『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之間」，「人心都倒向了鄧小平這一邊」，「我們卻未能把握這一時代的脈搏，依然在天真地構想，如何在未來的鬥爭中去捍衛毛的文革道路、文革思想」，¹⁷⁷這就嚴重地脫離了時代和民眾，走到了我們願望的反面。

但另一方面，「我們在歷史發生大轉彎的時刻，並沒有隨波逐流，而是堅守了自己的基本立場（例如『反對官僚主義者階級』，反對『一黨專政』的體制），基本訴求（例如『人民參與政治，監督與管理國家的權利』），因而也就保持了自身的獨立性：這對於民間思想者是帶有根本性的，是自身能否存在的基礎和前提」。¹⁷⁸如杜應國所說：「我們作出的『右派政變』的判斷，雖然表明了我們思想認識根源上存在的『左』的誤區，但它卻在個人立場上使我們得以和中共主流派，進而和中共的合法性統治拉開了距離，保持了應有的戒備和警惕。這同時也就為我們後來的思考和選擇，保留了更多的獨立和自由。而正是這種獨立和自由，最終為我們後半生的思想尊嚴和人格自持，提供了

177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242。

178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244-245。

必要的精神保障和心理支撐，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平衡點」。¹⁷⁹

但在八十年代的現實中，我們確實又面對著「如何走出毛澤東」的問題。這裡的關鍵，是如何認識所謂「毛澤東後期思想」。在前面的敘述中，談到1980年民間社會運動中關於毛澤東後期思想的爭論，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杜應國是堅持批判立場的一方；現在，我們就可以看出，這樣的批判，其實是一個自我清理，在某種程度上，他代表了我們安順這批朋友，進行自我批判——這當然也包括我在內。不過，杜應國在我們這批人中覺悟得最早，我受毛澤東的影響更深，但也在此之後，逐漸通過對毛澤東後期思想的清理而走出了毛澤東。這就表明，我們這批文革中的毛澤東主義者，對毛澤東的批判，就是一種自我批判，這是在對已經融為自己生命血肉的一部分進行割捨，因此格外艱難、分外痛苦、又真正刻骨銘心，而一旦割捨，就特別堅定、絕不回頭。因此，我們今天看到一些人又將毛澤東後期思想當作神明供奉起來，真有一種過來人的「不知如何說好」的感覺。

還是回到八十年代的歷史現場。在「凡是派」和「改革派」的論爭中，我們理所當然地站在改革派這一邊，但在鄧小平逐漸掌握了最高領導權、成為黨內主流派時，我們卻產生了懷疑。特別是鄧小平轉過來打擊曾經予以支持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時，我更作出了這樣的判斷：對鄧小平為主導的黨內改革派「不能抱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¹⁸⁰我們對他們已經採取和可能採取的「若干多少含有進步意義的措施是應該支持的。但從最終來說，我們並不是『同志』。我不相信，靠主流派〔錢註：鄧小平主導的改革派〕的恩賜，善心，或主流派與非主流派鬥爭的勝利，我們就能獲得真正的民主與自由」。¹⁸¹「我承認，目前聚集在主流派旗幟下的人員是複雜的，其中也不乏真誠的革命者、愛國者，甚至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如果將自己的立場堅持到底，到一定時候也必然地要與主流派分裂。因為在主流派中居統治地位的，也是那個官僚集團的一份子（他們只不過是官僚集團中尚有一定活力的一翼，與腐朽分子是有

179 杜應國：《奔突的地火——一個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180 錢理群給杜應國的一封信（1979年9月），參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271。

181 錢理群給杜應國的一封信（1979年9月），參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271-272。

區別，有矛盾、鬥爭的)」。¹⁸²或許，正是因為有這樣批判性的審視，我們，特別是我，對要不要投身於這場鄧小平主導的改革，就有了更多的猶疑。

但我們又是有極強的行動、實踐欲望的一代人——這也是毛澤東對我們的影響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在歷史巨大變動面前，儘管我們已經預感到它的結局未必如我們所願，但如果因為這種清醒而完全採取旁觀者的態度，又是我們絕不願意的。於是，接著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介入？加入到哪個改革潮流中？應該說，在具體道路的選擇上，我們曾有過激烈的爭論和許多的猶豫——我說過，這大概是顯示了我們身上的「哈姆雷特氣」——但我們更有「堂吉訶德氣」，我後來所寫的《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就是對我們這群人身上「二氣」的一個清理。¹⁸³最後，還是「堂吉訶德氣」占了上風，我們決定按照各自的選擇，分別走上殊途同歸之路。

首先「沖出大山」的是杜應國：他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與了解之後，於1979年8月與廣州的王希哲、北京的徐文立等取得了聯繫，以後又與分處各地的民運骨幹，如陳爾晉、何求(生平不詳)、傅申奇、孫維邦(1943-)、徐水良、王沖(生平不詳)等建立了密切聯繫，成為《四五論壇》、《民主之聲》、《自由談》等民間刊物的重要撰稿人。這是一次預知結局的悲壯努力，他在1981年初的大鎮壓中，遭到審查，從此一直處於監控之中，成為我們安順群體的第一個「犧牲者」。

大約就在此時——1981年2月，我們安順群體中的另一位骨幹孫方明(1948-)從貴州來到北京，參加了陳一諮主持的「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其實，早在文革後期，孫方明就和陳一諮在河南駐馬店的民間思想村落有了聯繫，當時這樣的全國性的串聯很多。因此，他順理成章地在此時加入「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從此，孫方明就捲入了八十年代的體制內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並逐漸進入上層的智囊班子。

我是我們群體中行動能力最差的一個。我儘管對政治有極大的興趣，但對政治實踐(無論是體制內的政治，還是體制外的政治)都充滿疑懼，是屬於

182 錢理群給杜應國的一封信(1979年9月)，參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272-273。

183 參看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

「好議政而不參政」的知識分子。我雖幾經猶豫，最後還是選擇了學者之路，並在1978年考上了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成為王瑤、嚴家炎(1933-)先生的學生。關心現實、關心政治的本性不移，成不了純粹的學者，於是我也就順理成章地參與到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民間思想學術運動中。不過，在八十年代，我的主要任務是「成為學者，為學術界所承認」，主要精力全放在學習、研究、教學上，很少參加社會活動。

在前一講裡曾談到，文革後期呼籲「新啟蒙」時，就已經提出了要「回到魯迅的啟蒙傳統」；這在八十年代就變成了具體的思想、文化、學術實踐。我也是從「重建魯迅傳統」這一角度參與八十年代的思想啟蒙運動的，而我的介入方式，又是從清理自己入手。我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心靈的探尋》，其實就是一種自我清理，是我的「狂人日記」。我所要清理的，是我在毛澤東影響下所形成、也是當時占據主流的「魯迅觀」，這是一個高度意識形態化的、被納入毛澤東思想體系的「魯迅」。因此，這樣的清理，就必然隱含著對「我和毛澤東」關係的清理。這就是我在該書〈後記〉裡所說的：

中國這一代知識分子對於毛澤東的英雄、領袖地位的確認，對於他的許多理論的接受，開始確實是一種理智的選擇——由於他代表了民族的利益，由於他領導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成功。但在發展過程中，卻逐漸變成了盲從。人們開始是出於信任，以後則出於盲目的慣性作用，逐漸接受了這樣的理論與事實：探索中國發展道路這類「大事」是毛澤東這樣的領袖的特權，而我們普通老百姓(包括知識分子)只需要按毛澤東的指示行事，踏踏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中國五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這一代知識分子中的大多數，就這樣作出了關鍵性的錯誤選擇：他們半是被迫、半是自動地放棄了探索真理的權利，放棄了獨立思考的權利；這不僅從根本上背離了魯迅所開創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傳統，而且也是知識分子歷史品格的喪失：在社會分工中，以思考作為本職的知識分子居然停止了思考，甘心作馴服工具，這真是歷史的大倒退，大悲劇，也是歷史的大嘲諷。但我們卻長期以來對此麻木不仁，安之若素，甚至沾沾自喜。在本書寫作過程中，當我重讀到魯迅這段話：「自己明知道是奴隸，打熬着，並且不平着，掙扎着，一面『意圖』掙脫以至實行掙脫的，即使暫時失敗，還是套上了鐐銬罷，他卻不過是單單的

奴隸。如果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贊嘆，撫摩，陶醉，那可簡直是萬劫不復的奴才了」。回想起我也曾長時間地「陶醉」於自己的馴服中，我覺得魯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靈魂，我無地自容！¹⁸⁴

從和毛澤東的關係中發現了自我的奴性，我如遭雷擊般被震醒，正是由此而開始「走出毛澤東」。

但我仍在這本著作裡，對毛澤東給予了肯定：「如果說魯迅這一代，還是『呼喚行動與實踐』的啟蒙的一代，那麼，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就是將先驅者的啟蒙理想變為現實的實踐的一代」。¹⁸⁵我在八十年代確實這樣認識魯迅與毛澤東的關係，不過後來我有更為複雜的看法。¹⁸⁶

八十年代的學術活動中比較引人注目的，是我和學友黃子平(1949-)、陳平原(1954-)一起提出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¹⁸⁷的概念。提出這樣的概念，是為了在文學史和現代史研究中擺脫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模式；但在對「二十世紀」的理解和闡釋裡，我又強調了列寧所說的「亞洲的覺醒」，這樣也就內在地肯定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既「擺脫」又「肯定」，這大概能夠反映八十年代的我和毛澤東的糾纏關係。好像是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提出不久，甘陽就邀請我們三人加入《文化：中國與世界》編委會；因為在《讀書》上連載我們的「三人談」，我也就成了《讀書》的作者——這樣，我就算成為八十年代民間學術文化運動中的一員了。不過，我對這類群體性的活動並不積極，也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從前面的概述裡可以看出，在八十年代三大民間運動——體制外有社會民主運動，體制內有著廣泛民間參與的農村改革運動，民間學術文化運動，當中都活躍著我們安順小群體的身影。我曾為杜應國的回憶錄寫過一篇文章，

184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頁307-308。

185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頁64。

186 參看錢理群：〈魯迅的命運〉(又名〈魯迅與毛澤東〉，2002年12月12日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遠行以後：魯迅接受史的一種描述：1936-2001》(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頁117-135。

187 參看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題目就叫〈大山裡的小溪怎樣匯入歷史的大潮〉。¹⁸⁸在我看來，這也能夠顯示「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和「後毛澤東時代」中國改革的廣度和深度：它把最邊遠地區、最底層的普通人、普通知識分子，都捲入其中。

三、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體制改革，天安門民主運動

歷史的發展是自有邏輯的：1980年初，鄧小平鎮壓了民間社會運動，從而將政治體制改革擱置，開始了單一的、自上而下的、由農村開始，又擴展到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迅速改變中國面貌的同時，也積累了巨大的矛盾。政治體制的問題，逐漸成為繼續推進經濟改革的阻力，還導致了改革動力的不足。鄧小平很清楚這樣的客觀情勢，他希望把改革的主動權依然控制在自己手裡，於是，就在1986年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¹⁸⁹到黨的十三大就正式重新提出體制改革的任務。但如趙紫陽後來所說，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只是「一種行政改革，屬於具體的工作制度、組織制度、工作方法、工作作風的改革」，是「在堅持共產黨一黨專政前提下的改革」，「是為了進一步鞏固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任何影響和削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改革，都是鄧堅決拒絕的」。在起草十三大報告時，他反覆關照：「無論如何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受西方議會政治的影響，連一點這方面的痕跡也不能有」，一再說：「社會主義國家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凡是一件事，只要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不受牽制，就能夠立即執行，不像議會民主經過那麼多複雜，那麼多反覆，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他不僅反對政治制度建立什麼分權制衡的制度，而且十分厭惡人們用遊行、請願、鬧事的方式表達意見」，正如趙紫陽所說，對鄧小平而言，「政治體制改革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不矛盾，可以相容的」。¹⁹⁰因此，在1986年，鄧

188 文收《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改題為〈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大陸社會民主運動：杜應國《奔突的地火——一個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

189 鄧小平：〈在全體人民中樹立法治觀念〉（1986年6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163-164。

190 趙紫陽：〈鄧小平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頁271、274、275、276。

小平在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同時，又大談「反對自由化」，宣稱「要講十年二十年」，¹⁹¹而他要反對的自由化，主要就是反對實行議會民主。

問題是，政治體制改革一旦提出，並形成社會輿論後，不同利益群體就會對此產生不同的理解和參與。特別是經過七、八年的經濟改革和思想啟蒙，中國開始出現了新的利益群體，主要是知識精英和民營企業的經濟精英，他們也必然要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要求。對此，趙紫陽也有一個分析：「由於市場經濟的實行，多種經濟成分的共存，外資的引進，個體經濟、私人經濟的發展，股份化的推行，公司制的發展，法人經濟的存在，於是各種經濟利益集團出現了，這種經濟基礎的變化，要求決策分散化、民主化，這跟上層建築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產生矛盾，客觀上必然要求政治上的開放」。¹⁹²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時代完全被控制與打壓，不可能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在改革開放初期也依然只是扮演一個受益者和支持者的角色；但到了八十年代末，就逐漸形成知識分子精英群體，並開始發出獨立的聲音。1988年6月播出的電視片《河殤》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他們的一個宣言，解說員滿懷激情地宣稱，知識分子是歷史給予中國人民的「一個十分獨特的群體」，「摧毀愚昧和迷信的武器操在他們手裡；能夠與海洋文明直接對話的是他們；把科學與民主的蔚藍色甘泉澆灑在黃土地上的是他們！」¹⁹³同時宣稱：「比他們〔錢註：知識分子〕更有現實力量的，也許是這些相貌平平、談吐也不驚人的新型企業家們。甚至在這些小商店的老板們中間，在這些急急忙忙的趕路的生意人中間，在這些離開土地四處攬活兒的農民中間，正在積聚的新的社會能量和衝動，都不可低估」。¹⁹⁴這裡掩飾不住知識分子的精英主義和對西方文化的浪漫想像，或許這就構成了這些知識精英的內在弱點，而對民營企業家的期待、把中國未來的民主寄託在中產階級的形成與發展上，幾乎是當時知識分子精英的一個共識；可以說這股激進自由主義思潮在

191 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86年9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182。

192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80。

193 蘇曉康、王魯湘：《河殤》（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金楓出版公司聯合出版發行，1988），頁97。

194 蘇曉康、王魯湘：《河殤》，頁98。

八十年代末的中國知識界和民間社會裡占有主流地位，此將引起後來人的反思。但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歷史語境和歷史條件下，知識精英和民營企業的經濟精英所提出的訴求，還是反映了歷史發展的要求和各階層民眾的心聲。他們的訴求，主要就是爭取《憲法》賦予的更大的思想、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即要求更多的民主權利和發展空間，以及從體制上防止黨內的腐敗。這兩大訴求，最終都指向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如此，也就必然和鄧小平的「政治體制改革」發生根本的衝突。

青年學生則把這些訴求變為直接的實際運動。顯然，正是連續七、八年的思想啟蒙運動喚醒了年輕人，加上這些年來社會矛盾的積累——政府官員的腐敗，農村改革的停頓，城市改革進展緩慢，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知識分子對於經濟、政治的要求得不到滿足等等——引發了巨大的不滿，最後爆發了1986年的「南北共震的十二月學潮」。¹⁹⁵值得注意的是，八十年代末的「學潮」，並不像1957年和1980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主要是校園內的思想運動，而是從一開始就走出了校園，成為街頭政治運動。這可以看作是1978-1980年社會民主運動的延續，是鄧小平在1981年強力鎮壓以後，民間反抗運動的再度興起。

時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本來對鄧小平在1981年對社會民主運動實行強力彈壓就持有不同看法，這時就更主張以和平、理性的態度處理學潮，卻因此被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發動宮廷政變而被迫下台——這自然更引起青年學生的不滿，於是又孕育了新的學潮。

值得注意的是，在激進自由主義影響日益擴大的情況下，同時出現了對其進行某種制衡的「新權威主義思潮」^{xi}。如其中一位代表性人物所說，「這種思潮以漸進、穩定與開明權威為槓杆的秩序作為主要價值。在新權威主義看來，開明專制下的社會進步，才是最終實現民主與現代化的條件」，¹⁹⁶主張者強調，「開明專制派」和「自由民主派」在實現自由民主的最終目標上是一致

195 參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頁317-326。

196 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頁60。

的，分歧只「在於通過什麼方法與途徑才能實現中國的民主」，¹⁹⁷開明專制派不贊成用激進自由運動的方式，而主張「用開明權威政治這只『看得見的手』，來創造民主政治這只『看不見的手』，保持轉型的可控制性」。¹⁹⁸新權威主義者並不否認「對秩序和穩定價值的強調，客觀上更能體現從舊官僚階級中轉化過來的新興技術官員與大企業集團的利益」，¹⁹⁹因此新權威主義立即在中共黨內，包括黨的高層領導中引起反響。

有意思的是，鄧小平聽了趙紫陽關於「新權威主義」的介紹以後，曾表示「他就是這個主張，但是不必用這個提法」。²⁰⁰如前面所分析，鄧小平所要堅持的可以說是一種「黨國威權體制」，他的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都以強化一黨專政為指歸，這就和「新權威主義」實現民主政治的最終目標，有著根本的區別。應該說，真正接受「新權威主義」並將其變成政治實踐的人，是趙紫陽。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趙紫陽與鄧小平的基本分歧，正在於是要堅持「黨國威權體制」、還是通過「新權威主義」，以實現中國的民主政治。

最初，他們在「通過權威政治來實現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點上還是存在共識。儘管他們對於改革的最終目標存在根本分歧，但這樣的分歧是在之後政治實踐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來的，最終也為他們自己所認識，以至最後分道揚鑣。因此，在1986年後當鄧小平要進行他的政治體制改革時，他順理成章地選擇新任的總書記趙紫陽具體主持，並成立了「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我們安順朋友中的孫方明也是其中的一員）。

趙紫陽也就按照自己「新權威主義」的理念來推行他心目中的政治體制改革。他給自己規定了兩條：一是黨的執政地位不變，二是要改變執政方式，即由傳統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轉變為「文明、開明、開放」的「現代」執政方式，也就是說，「在共產黨領導的基本框架下，更多地允許各種社會

197 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頁61。

198 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頁60。

199 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頁76。

200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154。

力量的政治參與，同時逐步以法治代替人治，把憲法已經原則規定的許多好的東西通過好的法律一一落實」。²⁰¹但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卻遭到了兩面夾擊：儘管趙紫陽強調「黨的執政地位不變」，但一旦他要改變無產階級專政的執政方式，就必然觸動黨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於是一些老人就開始醞釀「倒趙」。²⁰²這暴露了八十年代中國政治的一個根本問題，也就是元老政治的干預。如趙紫陽自己所說，他（也包括他的前任總書記胡耀邦）實際上只是執行元老決策的「祕書長」，他的手腳是被捆住的。另一方面，趙紫陽這種逐步到位、權威政治控制下的漸進改良方式，也不被激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所接受。這裡，正隱含著一個更為內在的根本問題：我們前面說過，1978-1980年的民間社會運動，至少在其初期，是和黨內的改革派相互配合的；但後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卻反過來鎮壓了社會民主運動，於是造成社會民主力量對黨內改革派懷有深刻的不信任感。到了八十年代末，黨內改革派中的胡耀邦、趙紫陽等人已經開始走出了鄧小平，在這時候就出現了社會民主力量和以胡、趙為代表的黨內民主力量彼此合作的可能性。但是，不但胡、趙一時還不可能與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集團決裂，而且社會民主力量也依然把他們（特別是趙紫陽），視為一黨專政既得利益的維護者，而未能給予有力的支持。這樣，也就錯過了社會民主力量與黨內民主力量聯合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機。

這樣，中國改革發展到八十年代末，不但政治體制改革已被納入未來討論發展的計劃中，而且各個利益群體都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訴求：一方面，以鄧小平為代表的黨官僚既得利益群體、元老集團希望通過他們所控制的、有限度的政治行政改革，減少改革開放的阻力，提高統治的效率，以從根本上維護一黨專政的絕對權力；另一方面，以知識分子精英和民營企業的經濟精英為主體的新興利益群體，以及受他們影響的青年學生，則希望衝擊一黨專政體制（但並不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進而提出了「爭取人民民主權利和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從制度上反腐敗」兩大要求，並且得到工人和市民群體的支持——由於八十年代後期嚴重的通貨膨脹（1989年上半年，官方承認的通

201 趙紫陽：〈我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認識過程〉，《改革歷程》，頁293、296。

202 參看趙紫陽：《改革歷程》有關〈「倒趙風」的由來〉部分，頁261-268。

貨膨脹率高達25%)，和1988年下半年為抑制通貨膨脹而採取的嚴厲的緊縮政策，以至生活水平下降、物質利益受到嚴重損傷，社會更產生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現象，使市民群體感到震驚、同樣不滿意改革現狀。而以胡耀邦、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民主派，則支持後者的要求，但希望政治體制改革能走上由權威政治控制的理性的、漸進改良的道路。由此形成了八十年代末的三大政治力量。他們之間的政治博弈，構成了1989年運動的深厚基礎和複雜內容。

因此，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可以說是勢之所至，而胡耀邦的突然逝世只是一根導火線，這和1976年以周恩來逝世為導火線而引發的「四五運動」，歷史是驚人地相似。而利益衝突的雙方：無論是鄧小平為首的元老集團(他們此時已在「維護一黨專政權力」這一點上取得高度一致)，還是青年學生、知識分子、民營企業家、工人、市民，都不願妥協。主張和平、理性解決的趙紫陽既不為元老集團所容，也沒有在民眾這裡得到有力支持。而雙方的力量卻過於懸殊：鄧小平為首的元老集團依靠一黨專政的體制，掌握了黨和軍隊的最高權力；而民間社會力量，經過1981年對民間報刊、民間組織的強力鎮壓，事實上是處於無組織狀態，在思想、理論上的準備也顯然不足。如此，天安門民主運動就必然成為一個缺乏有力政治、思想、組織領導，而由散漫、沒有政治經驗的青年學生主導的自發運動。前面我們提到過八十年代保存下來的半民間組織，如「體改所」、叢書編委會，在運動中都只能成為支持力量，而不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再加上社會改革力量和黨內民主力量的相互隔絕等種種因素，都決定這場運動的最後結局。

青年學生、工人、市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²⁰³同時留下了帶血的精神遺產，為後人永遠懷念——我說過，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繼1957年民主運動、1978-1980年民主運動(含1980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之後，第三次的社會民主運動，在中國當代政治史、民主運動史上占有不可抹殺的歷史地位。

203 「根據政府後來的聲明，死亡的平民人數不超過300人。[……]儘管確切的死亡數字難以知曉，但據當時在北京的獨立觀察家的估計，平民死亡人數在2000至7000人之間，而傷者的數量要數倍於此。」「軍事鎮壓之後，出現了全國範圍的逮捕浪潮。據估計，僅在6、7兩個月，祕密警察就逮捕了約四萬人，其中數千人被判有期徒刑，數百人被處死刑。大多數被判刑的和所有被處死的都是工人和其他普通市民」。轉引自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76。

研究者在總結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歷史經驗時發現，決定最後結局的雙方——黨內的元老強硬派和民間的激進派，其實是「可以互為對方的鏡子：一方是新理想，另一方是有革命的記憶；一方有着剛獲得的人民權力的感覺，另一方則早已習慣為人民掌權」，²⁰⁴研究者還認為雙方有著「同樣的摩尼教式的善惡對立的世界觀，同樣的埋頭不看現實的習性，同樣的缺乏與他方溝通的能力，以及同樣的革命理想主義」，「都同樣不願選擇以談判妥協解決政治衝突的政治行動方式，而是雙方都選擇『堅決鬥爭、絕不妥協』、『不屈不饒、寸步不讓』的政治行動方式」，「他們幾乎全都不假思索地認定，政治衝突只有一種解決方式，那就是『一方戰勝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亦即『要贏就全贏，不然就全輸』」，「政治結果也就變成了只有一種，即：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²⁰⁵這個分析是深刻的——我們卻驚訝地發現，這些觀念、精神、思維、行動方式，完全是毛澤東式的；也就是說，天安門事件的雙方，無論是毛澤東的戰友，還是青年反叛者，都沒有走出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模式和思維模式。當然，這樣的分析是從總結政治、思想的歷史教訓出發，並不會改變對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基本歷史評價：天安門民主運動的歷史意義，及以鄧小平為首的黨內元老強硬派的歷史責任，應該都是毋庸置疑的。

但同時，也必須正視歷史的後果：時代已經到了八十年代末，毛式政治只能導致兩敗俱傷。一方面，社會民主力量遭到了致命的打擊，從此很難形成獨立的、有組織的力量，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民主力量，也因趙紫陽的下台而處於群龍無首的地位。而隨著「體改所」被合併，《走向未來》、《文化：中國與世界》等編委會的被迫解散，體制內的民間參與之路基本上被堵死，八十年代蓬勃開展的思想文化運動被重創，民間社會反抗運動也就進入了十數年的沉寂時期。正是在這十數年裡，失去了民間社會監督、制約，黨的權力極度膨脹，肆無忌憚的權錢交易，就最終造成了權貴資本階層的形成。

另一方面，鄧小平在黨內元老支持下，為維護毛澤東留下的「一黨專政」遺產，不惜在首都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工人、市民開槍——這是毛澤東都不敢

204 鄒謙：〈天安門：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頁186。

205 甘陽：〈序言〉，鄒謙：《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和微觀行動的角度看》，頁 xviii-xix。

採取的極端手段，他在文革中就說過：「誰去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²⁰⁶於是「一黨專政」的體制從此失去了任何道義上的合法性——天安門大屠殺，成為這個政權永遠的恥辱柱，成為策劃者、指揮者、參與者永遠走不出的心中的魔魘。²⁰⁷

這裡，還有一個歷史的對比：1986年6月10日鄧小平第一次重提政治體制改革；²⁰⁸不到三個月前，就在1986年3月29日，海峽另一邊的台灣，國民黨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也通過了「政治革新案」——也就是說，1986年國、共兩黨都啟動了政治體制的改革，但兩者卻有真動與假動之別。1986年9月28日，民主進步黨在台北成立，國民黨黨內的專政派主張要立即嚴禁，其時掌握最高權力的蔣經國(1910-1988)卻指示李登輝(1923-)要「採取溫和態度，以人民、國家安全為念，在不違反國策、憲法規定範圍內，研究組黨的可能性」。蔣經國並在國民黨中常會上說：「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應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到10月7日，蔣經國就對外宣布：「臺灣決定解除戒嚴」，當時總統府祕書長沈昌煥(1913-1998)提醒蔣經國：「解除黨禁有一天國民黨要失去政權的」，蔣經國回答：「天下沒有永遠的執政黨」。²⁰⁹我曾經說過，在現代史上，國、共兩黨都跨不過「一黨專政」這個坎：1927年，國民黨要實行一黨專政，發動「清黨」運動，血腥屠殺共產黨人；1948年，兩黨都要堅持一黨執政，打開了內戰，失去了一次聯合執政的機會，造成兩岸的長期分離；1956年，大陸出現了進一步推進民主改革的機會，毛澤東卻發動了反右運動，強化了一黨專政；到1986年，國民黨在蔣經國主持下，順應歷史潮流，主動結束了一黨專政，邁出了走向民主的關鍵一步，但鄧小平領導下的共產黨卻依然堅持一黨專政，並因此在三年後不惜血腥鎮壓學生、工人和市民，

206 毛澤東對劉少奇、鄧小平等的講話(1966年7月19日)，轉引自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頁31。

207 最近李鵬公布《李鵬日記》就是企圖推脫罪責，擺脫他內心的魔魘。此書未能出版，僅在網上流傳。

208 鄧小平：〈在聽取經濟情況彙報時的談話〉(1968年6月10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160。

209 轉引自阮銘：《鄧小平帝國三十年》，頁124。

又一次錯過了歷史時機，非但沒有前進，反而倒退了一步。應該認真總結、吸取這其中所包含的深刻歷史教訓。

編註

- i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1978年12月18日-12月22日於北京舉行。這次會議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具有深遠意義的會議，被稱為「新時代的遵義會議」。由華國鋒主持，會議主要討論加速平反冤假錯案，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的文革路線，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路線，因此，被認為是中國走向「改革開放」時代的起端。
- ii 牛棚：始於1966年夏天。為文革早期各機關、團體、學校自行設立的拘禁「牛鬼蛇神」的地方。所謂「牛鬼蛇神」指被群眾揭發出來的黨的幹部(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知識分子(所謂「反動學術權威」)。
- iii 四化：四個現代化，簡稱「四化」。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1964年12月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周恩來根據毛澤東建議，首次提出。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重申四個現代化目標，就成為之後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理論依據。
- iv 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1981年6月27日-29日於北京召開。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建國32年來中共的重大歷史事件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作出總結，並評價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 v 1978年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於北京召開。
- vi 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1979年6月18日-7月1日於北京召開。
- vii 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簡稱中央政研室。負責分析國家情況，進而制定政策，並負責起草中共中央的主要文件、草案、報告、理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成立於1981年，原稱「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於1987年胡耀邦下台後被撤銷，改為「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1989年與「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合併為「中央政策研究室」。
- viii 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包幹到戶：1980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在農村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改革的標誌為「包產到戶(分田到戶)」，後來被成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俗稱「大包幹」)。
- ix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1980年2月23日-29日於北京召開。全會決定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常設工作機構，全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此外亦替劉少奇平反，決定撤銷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對劉少奇所定的「叛徒、內奸、工賊」等罪名。全會決定向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建議，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中的「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予以取消。

- x 中國文化書院：由馮友蘭(1895-1990)、張岱年(1909-2004)、朱伯昆(1923-2007)和湯一介等共同發起，是一個民間的學術研究和教學團體，1984年10月成立於北京。
- xi 新權威主義思潮：新權威主義在中國的興起最早可追溯到1986年，其代表人物為吳稼祥(1955-)。

第十三講

後毛澤東時代(中)

1990-1999

| 2010年7月補寫 |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就有了更為豐富、複雜的內容。我們依然只能圍繞毛澤東的影響和我與毛澤東的關係，作一個簡述。

一、「尋找毛澤東」熱

這是1989年末出版的《書刊導報》第26期的一個報導：「『毛澤東』的重新復活卻成了當代中國人無法回避的一個現實」。¹該報導提供了幾個「小鏡頭」：

鏡頭一 某地區，一些個體攤販正悄悄地高價出售毛澤東畫像。3角、8角、1元、2元[……]售價隨購買程度不斷上漲。²[錢註：毛澤東像也進入校園。有報導說：「1989年下半年北京大學新華書店還進了不少毛主席像」，很受學生歡迎。還有人看見「北京大學47樓側面一層的走廊窗口上就貼着毛主席像」]³

鏡頭二 一家報紙報道，文革郵票價格暴漲。一套《毛主席語錄》票，面值僅88分，中國集郵公司已調至150元。國內交換參考價為380元，新票在日本賣到710.50元。⁴

特寫鏡頭 在廣西桂南地區公路上，一座公路橋的橋欄上貼着一片小紅紙帖，上面寫着不太漂亮的幾個字：「毛主席在此」。毛澤東成了鎮守橋

1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頁16。

2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6。

3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39。

4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6-17。

頭的守護神。⁵

一位老農說：「我把他老人家請進家門，能驅鬼壓邪，保佑平安，掛上他的像勝過拜觀音菩薩，勝過求土地雷公」。⁶

湖南省臨湘縣〔……〕長安街上隨處可見少男少女款式新穎、價格昂貴的高檔服飾上，別着一枚毛澤東像章，這是流行而時髦的裝束。⁷

這是1990年4月4日《中國青年報》的一篇報導：

位於東西南大街的北京青少年書店，就只有27平米的地方，然而3月中旬以來，這裡常常人頭攢動。

日前，記者慕名前往，在不大的門臉前，有一條引人注目的橫幅——「尋找毛澤東」圖書展賣周。

〔……〕

「哪一類書買得最快？」

「河北版的《毛澤東傳》、文物版的《毛澤東書信手跡選》、中央文獻出版的《毛澤東哲學批注集》、河南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以及《走向神壇的毛澤東》、《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等等，都是很搶手的。」⁸

記者來到北京最有名氣的王府井新華書店。值班經理張超告訴記者：從去年6月到今年2月底，書店壓了近十年的250套《毛澤東選集》(1-4卷)全部銷完，目前供不應求。⁹

5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7。

6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8。

7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7。

8 據統計，《毛澤東傳》首版發行5萬冊，《毛澤東哲學批注集》首版發行5萬冊，《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首版發行7萬冊，《走向神壇的毛澤東》、《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首版發行均在10萬冊；此外，《毛澤東》首版發行25萬冊(一說28萬冊)，三次印刷達55萬冊，《晚年毛澤東》兩次印刷發行7萬冊，《生活中的毛澤東》首版發行6萬5,000冊，《毛澤東軼事》(湖南文藝版)首版發行8萬冊，《毛澤東逸聞錄》首版發行10萬冊，《毛澤東家世》首版發行5萬冊，《領袖淚》首版三次印刷發行26萬冊等。這樣的發行量相比今天的暢銷書發行量不算什麼，但在當年圖書市場非常疲軟的情況下，則相當突出。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24-25、46。

9 轉引自〈寫在前面的話：毛澤東重回人間的震撼〉，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序言，頁1-2。

根據這則報導中對1989年10月以來，北京新華書店總店對有關毛澤東書籍銷售的抽樣分析，發現當中個人購買的人數比例，占了94%。¹⁰

還有這樣的報導：

曾經冷清一時的韶山，如今更成了大學生們吸取政治營養的「寶地」，僅今年下半年，觀眾達40萬人次。（《中國青年報》1990年報導）¹¹

剛剛進入90年代，老歌新唱更是風靡全大陸。〔……〕在各地舉辦的大型音樂會上，最受觀眾喝彩歡迎的是〈北京的金山上〉、〈東方紅〉、〈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等歌唱毛澤東的曲子。¹²〔錢註：還有這樣的繪聲繪色的描述：「北京卡拉OK歌舞廳。著霹靂服、蹬『高耐』鞋的歌手彈著吉他，飛舞的激光中，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南泥灣〉等被譜成搖滾樂的歌曲」〕。¹³

去年〔錢註：1989年〕秋天的中國大地又出現了毛澤東詩詞歌曲熱。〔……〕中國唱片總公司〔……〕製作了《毛澤東詩詞歌曲欣賞》盒帶投放市場，銷路頗佳。去年毛澤東誕辰96周年紀念日，中央電視台和北京電視台都於晚間播出了《毛澤東詩詞歌曲演唱會》專場節目，強烈地吸引了觀眾。¹⁴（《新世紀》周刊1990年7月報導〈「毛澤東熱」透視〉）

湖北音像藝術出版社1990年上半年出版了《懷念您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的歌曲磁帶，將有關懷念、思念、敬仰毛澤東的歌曲匯集一起，並配之非常漂亮的封面，據講很受人們歡迎。¹⁵

出現在1989年下半年至1990年的這一「尋找毛澤東熱」，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它的民間性，這是活躍在大學校園、民間市場、民間娛樂場所的「毛澤東

10 轉引自〈寫在前面的話：毛澤東重回人間的震撼〉，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序言，頁3。

11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21。

12 林濤：〈「毛澤東熱」透視〉，《新世紀》周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50。

13 《中國青年報》報導：〈中國「領袖熱」〉（1990年），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77。

14 林濤：〈「毛澤東熱」透視〉，《新世紀》周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50-51。

15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33。

熱」。

當時有位學者作了兩點分析，很值得注意：一，它標示著毛澤東進入了民間精神生活，毛澤東熱成為人們(主要是中、老年人)的「朦朧的精神寄托方式和信念表達方式」，甚至開始成為民間宗教信仰的一個部分；其二，它標示著毛澤東開始成為人們(主要是年輕人)「文化消費」的對象，毛澤東像章熱、收藏熱、歌曲熱等等，無不表現了將毛澤東審美化、娛樂化的傾向。¹⁶同樣引起關注的，是人們閱讀毛澤東時，也主要是以描述毛澤東日常生活、家世、人際關係的傳記類的紀實作品為主，這也表示著一種走近「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的心態：人們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領袖」、「導師」的「神」的毛澤東，而是和自己更接近的「人」的毛澤東，而在另一部分人(主要是底層社會)那邊，又再轉化為有別於「意識形態神」的「民間神」的毛澤東——應該說，這樣一個「民間化、生活化、消費化的毛澤東」，從八十年代末以來，就一直存在於中國民間社會，其內在的思想、文化、心理的機制和意義很值得研究。

還有人注意到，在「不曾平靜的校園」裡，「大學生成立了一些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小組或毛澤東著作讀書會等組織」，「他們談論毛澤東，不僅僅着眼於談論毛澤東的日常生活瑣事，更多的是從毛澤東的一生經歷中，捕捉人生的真諦」，研究他的「思想、學說及所走過的道路」。¹⁷據中國新聞社報道，去年〔錢註：1989年〕暑假期間，北大、清華圖書館裡毛澤東的書被搶借一空；一些大學生宿舍的書架上出現了這些年來已經很少見到的《毛澤東選集》；許多大學生在傳看毛澤東傳記」。¹⁸這構成了毛澤東民間熱的另一個重要側面。

這樣一個「尋找毛澤東」的民間文化熱，發生在1989年「六四」之後，相對沉寂的民間社會和大學校園裡，在表面的消費性、娛樂性的背後，又包含著怎樣的思想、文化意味？當時，許多報紙，學校的師生、學者，都對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後還出了一本《中國：毛澤東熱》的專著。由此，對「毛

16 陳晉：〈我看「毛澤東熱」〉，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21。

17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39。

18 林濤：〈「毛澤東熱」透視〉，《新世紀》週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46。

澤東熱的評說」本身，也構成了一個思想、文化現象，它所提供的「六四」之後的大學校園、民間社會的思想信息和動向，對於認識毛澤東在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的意義，是特別有意思的。我們且作「文抄公」，把討論中的各種看法分列如下，並略作評點：

學潮之後，大家不管出於什麼原因，都進入了更高層次的反思。溫故而知新、知史可明志。通過了解毛澤東，可以了解中國當代的歷史，了解中國的國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學生任衛東)¹⁹

任何有意了解中國現代歷史的人，都無法跨越毛澤東。同樣，任何關注中國現實和未來的人也無法避開毛澤東，畢竟我們——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也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背靠著、腳踏著毛澤東留下的遺產：正面的和負面的。²⁰

「毛澤東熱」的出現，說明了各方面的人們都在對現實的問題作出反應(不管層次是淺是深)，而這眾多方面的反應正好彙集在毛澤東這一點上。這個事實本身即說明了毛澤東的巨大豐富性。²¹

雖然其中〔錢註：指毛澤東思想〕有許多烏托邦與民粹主義的因素，與現今工業主義的世界格局格格不入，但它們確實代表了人類的平等、公正、自由、和諧的追求與探索，終究是一筆精神財富，哪怕它只開花不結果、或常結出苦澀的果。就是毛澤東的這些豐富性，吸引了一部分好學深思者。他們人數不多，但卻代表了「毛澤東熱」中的一支冷靜、理性的力量。(北京大學世界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研究生梅俊傑)²²

對毛澤東思想中的烏托邦主義、民粹主義，在八十年代時對其主要做的是批判性的審視，但現在開始注意到了其內含的積極因素，這本身就值得注意。

〔中國〕社會的發展已經離毛澤東時代甚遠了，而且毛的形象曾被放棄一

19 〈中國人大師生座談「尋找毛澤東」〉，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58。

20 〈首都青年學者、博士生討論「毛澤東熱」〉，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11。

21 〈首都青年學者、博士生討論「毛澤東熱」〉，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14。

22 〈首都青年學者、博士生討論「毛澤東熱」〉，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14。

隅；所以，近來的「毛澤東熱」似乎是一種歷史的回歸。〔……〕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在獲得物質上的保障的同時，精神的支柱卻發生了動搖。〔……〕經濟領域出現分配不公，物價上漲等混亂現象，腐敗現象嚴重，社會不安定因素存在，這些都增加了人們的不安全感、無能為力感、迷茫失落感和無所適從感。在這一點上，當今中國與毛時代正好形成一種對照。在毛時代裡，雖然物質生活相對貧乏，雖然是一種盲目的個人崇拜，但是，這樣卻給人們提供了保障和安全感。拋棄了毛的時代的狂熱，中國當今卻又進入兩難境地。〔……〕「毛澤東熱」實質上是一種時代裂縫的象徵。誠然，中國人並不想再回到毛時代，並不呼喚毛式的領袖人物，而是渴望消除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無能為力感、迷茫失落感和無所適從感，這是「毛澤東熱」出現的根源。（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學生李博柏、閻麗靜）²³

這些顯示：一方面，人們「並不想回到毛時代」，因為九十年代初，人們（包括年輕人）都還保留著對文革災難的記憶，這不同於今天完全不了解毛時代的年輕人；另一方面，人們又處於對現實的不滿，而自覺、不自覺地在不同程度上將毛時代理想化，這兩方面都展示了許多人對毛澤東時代的複雜態度。

有人認為，毛澤東熱「是商品經濟衝擊下民眾意識的一個體現」，²⁴「不同階層、不同地位的人們都在商品競爭和流動的環境中適應新的角色」，²⁵「民眾意識正在逐漸顯示其重要性。不同民眾之間的差別已不能在某種統一的旗幟下被抹殺。各個階層、各個集團都在尋找着代表自己利益和觀點的思想表達方式」，²⁶而自稱「農民的兒子」，有著「民本思想」的毛澤東就很容易被視為民眾的代言人，而成為新的「大眾文化」一部分；²⁷但民眾不過是要藉毛澤東來

23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15。

24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主編王延中在座談會的發言，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17。

25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主編王延中在座談會的發言，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20。

26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主編王延中在座談會的發言，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20。

27 參見，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北京大學研究生學刊》主編王延中在座談會的發言，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17-121。

表達他們的利益和要求。

「〔毛澤東思想充滿〕成功與錯誤的交織，或者過去看是錯誤的，而今天看則包含着真理的東西」（括號內文字為錢所加），比如「毛澤東早就提出，社會主義還存在着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如果過去還不清楚的話，今天確實應該引以為戒」。²⁸因此，有人認為，毛澤東熱是「對社會主義的禮贊」，是「民族自豪感的再度爆發和呼喚」。²⁹後來「新左派」的毛澤東觀已經呼之欲出了。

「一位大學生告訴我，去年〔錢註：1989年〕六月以後，他們沉寂下來反思這一切時，發現需要學習、了解和熟悉毛澤東的思想方法，才能更好地從中國國情出發，把握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規律和條件，而不是照搬西方的東西，更不能搞全盤西化」。³⁰這裡隱含了一個尋找中國自己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的問題；注意到毛澤東的貢獻是有意義的，但對其錯誤經驗教訓的總結，也許更為重要，但這在當時似乎是被忽視的。

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報導：「在這股〔尋找毛澤東〕熱潮慢慢地擴展的時候，各高校有關部門如學生工作部、團委等予以了高度重視」（括號內文字為錢所加），「給予了適當的引導，即人們近一年來常用的『導向』」。³¹於是，就有了這樣的「提醒」：「一些學生看毛著甚至是把它作為『逆反哲學』，從片言只語中為學潮中的錯誤行動尋找理論依據。毛著中的個別激進主張對這些學生是很有影響的」，³²「有些人特別熱衷於毛澤東晚年的言論，這一點應引起我們的重視」。³³這裡對毛澤東思想中的「激進」部分，及其可能對青年產生影響所提出的警惕，是很有意思的。於是，又有了這樣的「引導」：要把「毛澤東熱」作為「樹立新一代領導集體權威的一次機緣」，因為毛澤東熱正昭示著「人

28 《北京青年報》載：〈尋找毛澤東什麼？〉，該文為1990年3月20日上午，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之「毛澤東思想研討會」情況介紹。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63。

29 北大哲學系學生辛鳴在「大學生『尋找毛澤東熱』座談會上的發言」（1989年12月13日召開），載《大學生》1990年第2期。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87-88。

30 林濤：〈「毛澤東熱」透視〉，《新世紀》週刊第13期（1990年6月出版）。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46。

31 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43。

32 〈中國人大師生座談「尋找毛澤東」〉，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57。

33 北京師範大學馬列所程仁華的發言，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109。

們渴望有一個新的強有力的領導權威來建立起新的社會秩序」。³⁴這又是在鼓吹「新權威主義」了，但也反映了九十年代初中國現實政治的需要。

也還有人指出：「有一種人，是在不適應現代社會基礎上懷念毛澤東的〔……〕近十年來，雖然我們也遇到種種挫折，但進行扎扎實實的建設都是有目共睹的。這就比毛澤東浪漫傾向有意義得多。如果尋找毛澤東是為了拿毛澤東對抗鄧小平，那將是非常危險的」。³⁵談話者顯然更認同於鄧小平的改革。這說明，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的評價，聯繫著每個人對現實中的鄧小平及鄧小平時代的態度、評價。

不難看出，以上關於毛澤東熱的評說、討論所提供的信息相當複雜，其間也多有相互矛盾、衝突之處；但或許正因為如此，其所折射出的「六四」以後至九十年代初的大學校園與民間社會的思想動向、民間和毛澤東的關係，也是多元而複雜的，而且當中許多內容還可以有更多的發展空間，以後的許多事情都起源於此。

二、我的「毛澤東研究」

在民間社會「尋找毛澤東」的時候，我開始「研究毛澤東」。

這同樣是出於「六四」體驗。「六四」後的紅色恐怖，確實讓我以及許多人都聯想起毛澤東時代，而且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北大當局提出「醜話說在前面」，「槍打出頭鳥」，「不是秋後算帳，現在就要算帳」，「圍觀即參與」等，如此露骨地公開宣布北大已成為不受法律制約的監獄，大概是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時候也不曾有過的。³⁶鄧小平所堅守和實行的，正是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思想路線與體制，這才是發生「六四」最根本的原因。「六四」之後，不同的人都在總結經驗教訓。鄧小平總結的是「對思想教育上的放鬆」，也就是對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控制有所放鬆，因此「六四」後便要加強思想、政治、社會的全面控制，這就意味著要強化鄧小平體制的

34 徐文秀對毛澤東熱的評介，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75。

35 〈中國人大師生座談「尋找毛澤東」〉，轉引自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頁61。

36 參看錢理群：〈未名湖畔的老人——悼吳組緝先生，並悼北大〉（1994年10月1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507。

毛澤東色彩；而在我看來，恰恰相反，1978年以後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最大失誤，就是沒有明確提出並進行對於毛澤東思想、文化及體制的科學批判。我的「毛澤東研究」大概也就由此開始。

當我冷靜地面對九十年代的中國問題、知識分子問題、以及我自己的問題時，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科學清理的必要與迫切。當時我寫了一篇總結性的文章，題目叫〈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和現實困境〉，其中有這樣一些具體分析與判斷：

(一)九十年代所面對的思想文化問題

1. 關於「如何看待毛澤東時代」的困惑

九十年代理想喪失、道德惡化與社會風氣毒化的現狀，重新提出了理想主義的價值，精神的意義，集體主義的倫理觀是否還有生命力的問題，而廣大工人、農民的生存狀況的日益惡化，也再一次提出了知識份子與工農關係的問題。這樣，對我們在歷史回顧裏所提到的對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的負面作用的批判，就發出了一個要防止「將孩子與水一起潑出去」的警告。但另一方面，在前述以理想主義與專制主義互為表裏為主要特徵的毛澤東思想、文化體系沒有得到認真清理的情況下，人們很容易產生對毛澤東時代的唯尊精神、崇尚個人犧牲的聖徒社會的懷舊情緒〔錢註：這在前述民間毛澤東熱裡看得很清楚〕。因此，過份強調追求物質與個人利益孫〔錢註：此「孫」字應為「所」之誤〕造成的精神危機，會不會忽略、否定了物質欲望、個人主義精神在今天中國仍然具有的積極意義；對於理想、精神、集體主義、與工農相結合〔……〕的重新強調，會不會導致對毛澤東時代及仍然在當今中國嚴重存在的專制主義的默認與肯定，從而與官方重新恢復毛澤東主義的權威意識形態的統治與控制的努力劃不清界限。³⁷

這正是我在九十年代初感到的困惑，並且至今依然困擾著我。

37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93。

2. 關於「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如何反思『西方現代性』」的困惑

在中國現實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資本主義化，這恐怕是不容忽視與否認的事實。(至於中國是否已經發生了整個社會資本主義一體化，則還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就必然提出了一個對於資本主義文化，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道路的批判問題[錢註：這正是九十年代中期「新左派」所提出的問題；在當時對我有振聾發聵的作用，這是我一直感謝「新左派」的]。³⁸問題的提出，顯然具有積極意義：不僅有助於打破一些知識份子美化西方現代化道路的幻想(這在反省東方專制主義時是極容易產生的)[錢註：事實上包括我在內的大多數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都是以「西方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化」目標的]，而且提醒中國知識份子要關心中國的現實問題，對中國已經出現的資本主義化問題不能採取迴避、漠不關心與緘默的態度[錢註：我當時就有這樣的反省：自己過多地關心知識分子的邊緣化問題，而對現實生活中發生的兩級分化現象，工人、農民貧困化的問題，則顯得有些麻木]。³⁹

但是照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對西方現代性、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卻是危險的。因為中國的現實不僅存在着正在發展着的資本主義化，更嚴重存在與保留着專制主義的基本體制[錢註：這是當時我對「新左派」的主要保留和疑慮]。一位年輕的學者在與我的通信討論中，曾這樣提醒人們注意：「有些東西，在西方是極須批判的，在中國，卻發揮着有效的作用；或在中國，被證明是反動的東西，在西方卻是療效的良方」。他舉例說，「人道主義在西方，不僅僅是對人的關懷，更是人與自然主奴關係的確立，是認識論上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的確立。因此，人道主義在西方是一種現代性，它產生了一系列可怕的後果，必須被『消解』。但人道主義在中國，更多的意義是在對人的關懷，它要對抗的是極權主義的政治。如果以同樣的方式消解中國的人道主義，那實在是理論上的誤區」。

38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93-494。

39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94。

我以為，這一警告，是重要的，不容忽視的。我們知道，毛澤東多年所提倡的是一種反西方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因此，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知識份子在批判西方現代性時，或許可以從毛澤東思想中獲得某些理論資源；但對於中國的知識份子，在前述毛澤東思想體系沒有得到徹底清理以前，卻要十分警惕，不要重蹈「以專制主義批判(代替)資本主義」的歷史覆轍[錢註：當時這一警告，是針對剛剛興起的「新左派」的；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是更加重要了]。⁴⁰

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知識份子的困惑，既來自中國資本主義與打着社會主義旗號的專制主義並存的現實，又來自知識份子對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重否定與超越欲求。⁴¹社會主義旗號下的專制主義是他們急欲打破的，但他們又不願意在中國實行全面的資本主義化。前者是他們已經飽嘗而不願繼續下去的災難，後者是他們開始感受到、並且是可以預見的災難。固然可以由此而在理論上提出「各取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長，去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短」的綜合社會的理想，但這一理想是否可以實現，又如何實現，會不會又是一個烏托邦的幻夢，都是一個問題。於是，人們不能不陷入彷徨無路的苦悶與惶惑之中[錢註：這一「苦悶與惶惑」已經糾纏了我近二十年，而且越陷越深]。⁴²

40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94

41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94-495。這恐怕是當時許多人的共同想法。《走向未來》叢書的主編金觀濤和劉青峰在這一時期所寫的〈開放中的變遷〉裡就明確指出：「歷史輪回所告訴當代人的，決不是應該毫不保留地重返資本主義文明，而是要超越一百多年以來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極對立」，「以資本主義為特徵的開放社會，和社會主義一樣，並不是人類社會演進之終極。人類由傳統走向現代的歷程至今尚未完成。一個開放的，穩定的理性社會也許只有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極震動中吸取教訓後才能出現」。「中國學者必須為當代批判意識的重建去承擔自己應有責任」。見〈導言：尋找歷史之路〉，《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頁18-20。

42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95。

3. 關於「毛澤東思想、文化的當代命運」問題

在我看來，「毛澤東思想包含着兩個互相矛盾、衝突的方面。一方面，毛澤東構建了以黨的全面專政為核心的專制主義體系，通過對於人的全面控制與改造，最大限度地把中國人民組織起來，建設現代國家；另一方面，毛澤東又具有反體制的天性，他通過不斷革命，發動大規模的群眾階級鬥爭，不斷地，無休止地衝擊和摧毀在他看來日趨資本主義化的現存體制，以實現他的烏托邦夢想。這樣，毛澤東思想就同時兼具『建構與強化體制』與『反體制』的兩重性，這就使中國社會的各種力量——要求全面恢復毛澤東時代舊體制的力量，希圖維持『中學(毛澤東體制)為體，西學為用』的現體制的力量，必然出現的反舊體制與現體制的力量，都有可能從毛澤東那裏找到相應的理論根據，並從中吸取力量〔錢註：從這一角度看前面所說的對民間毛澤東熱的種種評說，就非常有意思〕。現在，『毛澤東』在中國大陸底層人民中已經成為能夠幫助他們避禍得福的『神』；可以預計，在今後中國社會的變動中，毛澤東的旗幟仍然會為多種政治勢力所反覆利用。事實上，毛澤東思想、文化已經滲透於幾代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並成為中國現代文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部份。因此，要真正深刻地理解現在以及未來的中國大陸，就絕不能繞開、迴避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性存在與影響：這是二十世紀留給中國的最重要的遺產」。⁴³

可以看出，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在1995年所得出的這些結論，⁴⁴與前述1990年左右的民間毛澤東熱所提出的問題，青年大學生、研究生、青年學者的思考，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很大不同，但都是當時歷史的真實記錄。

(二)關於「毛澤東陷阱」：理想主義向專制主義轉化的歷史經驗的總結

在確立了對毛澤東思想進行科學的清理和批判的目標以後，緊接著的問

43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96-497。

44 以上所引自〈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的內容，於1995年寫於韓國漢城(今稱首爾)，本是為韓國部分左翼知識分子作的一次講演準備的講稿，後未發表，1999年12月按原文重錄入電腦，後作為「附錄」收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

題是：這樣的清理與批判從哪裡入手？

事實上，在「六四」，以及接著而來的蘇聯、東歐瓦解，許多人都在歡呼「歷史的終結」時，我卻一直在思考一個反向的問題：不能因為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而否認或忽視一個事實：共產主義運動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曾經吸引過眾多的世界各民族最出色的知識分子，它也是我們自己年輕時候的理想，這是為什麼？——我認為不能回避這個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解釋，也才能從中總結出真正的歷史教訓。因此，在九十年代初，我做的第一個研究，是寫作《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一書，試圖通過知識分子身上的「堂吉訶德氣」與「哈姆雷特氣」，討論「共產主義運動與知識分子的關係」。⁴⁵這和九十年代中期我對毛澤東思想的研究，其實延續了同一思路：通過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理想主義」和「專制主義」關係的討論，研究「知識分子與毛澤東的關係」。

這同時也是「我和毛澤東」關係的一個連接點。也就是說，我對毛澤東思想、時代的清理和批判，從一開始，就是把自己擺進去的：對毛澤東思想、時代的清理、批判，實質上就是一種自我清理與批判——這裡，我要強調的是，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態度，而是同時期的毛澤東研究者（主要是當時被稱作「中青年一代」的毛澤東研究者）共同的心態。1989年出版的《晚年毛澤東》一書的主編，同時寫有《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的蕭延中（時為中國人民大學的講師、副教授）就這樣寫道：「批判不僅銷蝕着靈魂，它也深深地觸動着自我。寫作過程中，我時時感到『毛澤東』總與晚年自身聯繫着，研究他總彷彿背負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令人氣悶、傷心和後怕」。⁴⁶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研究發現：「毛文化的幾乎每一個命題在其起點，即最初的理論形態都是具有革命理想主義和烏托邦色彩的〔錢註：這正是能夠吸引知識分子的最重要的原因〕，然而其理論命題的展開與實現，對象化的終點，都成了反動的專制主義。應該強調的是，終點的專制主義並非對起點的理想主義的反叛，而恰恰是起點的理想邏輯的與歷史的展開的必然結果。

45 詳參，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6 蕭延中：〈出版後記〉，《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頁356。

也就是說，專制主義的後果正孕育於起端的理想主義之中，「而且這裡還奇妙地存在著理論的邏輯過程與現實的歷史過程的一致性」，「二十世紀中國歷史運動最基本的特點，即是這起端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烏托邦主義逐漸走向專制主義，或者說逐漸展現其專制主義的內質。所有的追求都走到了自己的反面：這正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悲劇和荒謬劇」。⁴⁷

問題是如何如實與精細地描述、揭示這個我稱之為「毛澤東的陷阱」的「由理想主義、烏托邦主義向專制主義轉化」的理論與歷史過程——於是，我就有了底下幾項歷史經驗教訓的反思和總結。

1. 關於在「地上」建造「天堂」，實現至善至美的「大同」世界、理想社會的反思

這其實就是我們以前講課中一再強調的，毛澤東的大躍進、人民公社，以至最後的文化大革命都是他「在中國建立一個徹底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的，政治上絕對平等，經濟上絕對平均，人人都獲得全面發展的『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的烏托邦試驗，其結果是直接引向大饑荒和文革中的無窮災難。這確實是一個理論與現實的「陷阱」，並存在著深刻的教訓：

至善至美的理想社會，只能存在於彼岸世界，是一個可望不可及的遠方目標。它的存在，使人們永遠也不會滿足於現狀，從而加強對現實的批判和改造力量。但這種改造、變革的努力，只能使此岸世界不斷改善，不斷趨向、接近理想，卻永遠也不會達到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任何將彼岸世界此岸化的努力，都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天堂」的現實化就是「地獄」。⁴⁸

47 見錢理群：〈為什麼要研究毛澤東，打算怎樣研究毛澤東〉，電子稿。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一生投入於中國革命的美國人李敦白在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時，也有這樣的反省：「我們當初所選擇的構築烏托邦世界的方法，一開始就已經埋藏了毀滅的種子；我們當初所設想之計劃的原罪，在於一開始就認定要創造一個十全十美的民主，就一定要利用『鎮壓』來對付『一小撮的階級敵人』。而『十全十美的民主』這樣動人的承諾，便誘使原本善良的人們加入了鎮壓的行列」。李敦白、雅瑪達·伯納著，林瑞唐譯：《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頁2。

48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84。

這是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最大悲劇。這一點，在我們過去的講課中多次提到，就不多說了。

2. 關於至善至美的人性的追求，以及「人的改造」的反思

我說過，毛澤東不同於其他掌權者，他的革命不滿足於社會的改造，更要傾其全力進行「人的改造」：這是他所發動的二十世紀中國一個最大膽、也是最荒謬的烏托邦試驗。

毛澤東提倡所謂純粹、至善至美的人性。其主要內容有二：一是自覺地壓抑、克制人的動物性本能欲望，從性欲到物欲，使人成為純精神、道德的存在物，即所謂「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二是自覺地壓抑、克制人的個人欲望，成為「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高尚的人」。⁴⁹這兩方面合起來，就是要求人的「非動物化」和「非個人化」——作為個人修養，「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或許還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境界；但問題是，毛澤東要以此作為普遍、絕對的倫理原則，要求所有的人，並採取強制改造的手段，如文革時期那樣，要求人們「狠鬥私字一閃念」。

問題更在於，毛澤東又強調：「在階級社會裡就是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而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⁵⁰於是，就有了這種邏輯性與歷史性轉換：無產階級是最先進的階級，因此無產階級的人性(階級性)是善與美的；而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又是無產階級利益的自覺代表，因此中國共產黨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人性)的集中體現，從而具有至善至美性。這樣，前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種非個人性的要求就變成了「個人利益絕對服從黨的利益的黨性原則，壓抑本能欲望的非動物性的要求，就變成了「為實現黨的理想、崇高的精神原則，而奉獻一切」、無條件地犧牲自己的精神，用毛澤東引述的列寧的話來說，就是自覺地成為黨領導的革命機器裡的「齒輪與螺絲釘」。這樣，許多人(包括知識分子)誠心誠意接受的「人的改造」，最後落實下來，就是成為「黨的馴服工具」。這也正是毛澤東的目的：通過「改造人」實現對人、知識分子外在行為和內在精神、心靈的全面控制和利

49 毛澤東：〈紀念白求恩〉(1937年12月21日)，《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620-621。

50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5月)，《毛澤東選集》(一卷本)，頁827。

用。

3. 關於追求思想的至善至美性、絕對真理性，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宗教化的反思

這同樣存在著一個轉換：一開始許多知識分子接受馬克思主義，是探索民族振興之路中的一個自覺選擇；但毛澤東和共產黨卻將其宣布為「歷史必由之路」，也就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知識分子的必然歸宿與探索真理的最後終結，這樣，也就賦予馬克思主義以至善至美性與絕對真理性。建國後，馬克思主義更被宣布為全民族必須接受的國家指導思想，使其成為國家宗教，並且寫進了憲法；之後，無論是毛澤東的「六條政治標準」，還是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都將「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地位」作為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這樣，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切質疑、批判都是非法的，並能以「維護憲法」的名義，對一切獨立知識分子進行殘酷鎮壓——這正是典型的思想專政。

4. 關於「人民崇拜」的反思

「人民(人民群眾)」在毛澤東的理論體系和中國意識形態的宣傳中，一直占據極其崇高的地位。如前所分析，人民被宣布為歷史的創造者、上帝，道德的至高者，更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的源泉、依據。也正是這一點，吸引了許多的知識分子，他們也都是人民的崇拜者。

問題是，歷史的發展卻由「人民崇拜」轉化為「領袖崇拜」。這裡也有一系列的邏輯轉換：人民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的最大利益與長遠利益是通過無產階級政黨體現的；政黨是由一定的領導集團領導的；領導集團是必須由領袖代表的。這樣，由「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組成的金字塔結構，逐層推演的結果，處於塔尖地位的領袖，就以處於基礎地位的人民的名義，取得了實際上不受任何監督與制約的權力，所謂「人民民主專政」，實際上就變成「人民代表專政」、「黨專政」、「領袖個人獨裁」。浪漫主義的人民崇拜最終結出了最嚴峻的專政之果。

5. 關於將矛盾、反抗、鬥爭、運動絕對化、神聖化的「鬥爭哲學」的反思

魯迅說過：「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⁵¹許多知識分子也是因被壓迫而走上革命鬥爭之路的。在備受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的二十世紀中國，鬥爭的尖銳、複雜、激烈，本來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現象，並且具有顯然的歷史合理性。但毛澤東卻將矛盾、鬥爭、反抗、運動的客觀性、合理性絕對化，形成了他「鬥爭就是一切」的鬥爭哲學，他宣布對立面的鬥爭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但這實際上是他自己的哲學的核心，而對立面鬥爭就是「一個吃掉一個」，你死我活。毛澤東充分利用他手中的權力，不斷地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性的、疾風暴雨般的階級鬥爭，人的嗜殺性，以及中國人喜歡窩裡鬥的惡習，都被誘發出來，每個中國人、每個知識分子，都成了這殘酷的生存競爭的參與者和受害者。所有的鬥爭、反抗，都最終成為對他人和自己的傷害。

這樣，在毛澤東時代，所有對至善至美的社會、人性、思想的追求，對人民的崇拜，對反抗精神的強調，最後都走向反面，走向新的專制。這裡充滿了思想邏輯和歷史的陷阱。我們必須走出這些陷阱，同時，如前面所提醒的，又要防止「把孩子和髒水一起潑掉」，⁵²這正是我們面對毛澤東的遺產時最為困惑之處。儘管我至今也還沒有完全擺脫這樣的困惑，但在1995年，我作出了上述總結以後，卻有如釋重負之感。⁵³

51 魯迅：《三閒集·文藝與革命》（1928年4月4日），《魯迅全集》第4卷，頁84。

52 後來我對防止「把孩子和髒水一起潑掉」問題有進一步的思考，對1995年的反思又作了反思：「是的，我們必須吸取將『彼岸理想此岸化』的教訓；但是，我們能因此放棄對『烏托邦理想』的嚮往與追求嗎？是的，我們要反對將人『非動物化』和『非個人化』的『思想改造』；但我們又能走到另一個極端，把人僅僅看成是動物性的，純個人的存在嗎？是的，我們反對將馬克思主義絕對化、宗教化；但我們能從根本上拋棄馬克思主義嗎？是的，我們反對『人民崇拜』；但我們又能鄙視人民，漠視他們的利益，完全脫離普通老百姓嗎？是的，我們反對將鬥爭絕對化，但人受了壓迫，為什麼不能反抗？難道反對國內階級壓迫與剝削，就是『破壞穩定』，反抗國際強權，就是『恐怖主義』嗎？此外，還有許多相關的問題。比如，在歷史的再認識、再考察中，我們如何認識五四以來的激進主義的革命思潮及其實踐？如何認識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等等」。見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頁221-222。

53 以上討論，均見〈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年5月19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81-498。

三、1998年前後北大百週年校慶的民間紀念

(一)「尋找真北大的聲音」

我們還是從人們似乎已經遺忘了一個細節說起：1997年11月20日，北大學生社團「時事社」主辦的油印刊物《時事》試刊號發表了一篇〈尋找真北大的聲音〉的發刊詞：

一切的大興土木似乎在表明北大是欣欣向榮的。可是我感覺不到一點新鮮的氣息，只有壓抑的感覺。因為三角地上只有TOFFL培訓和招聘廣告了，因為民主草坪上只是坐著相互擁抱的情侶了，因為圖書館裡只有一張張透出英語單詞和微積分的麻木的臉孔了，理想和責任感已經在我們的頭腦中缺席了。我實在難以找尋到北大的氣息，青春的活力。我不斷地問自己：我是在北大嗎？怎麼我聽不到五四的吶喊，怎麼我看不到三角地的指點江山，怎麼我聽不清理想主義的聲音，怎麼我看不到熱血沸騰的青年，怎麼我感受不到心憂天下的責任……失去精神的北大正如一個被抽去有脊柱的巨人，他的肌肉在不斷發達，可他總也立不起來。

[……]批判地叛逆地永遠抗爭，積極地建設地不斷開拓，這才是真北大的精神。[……]時事社為你，為北大，為中國撐起一方理想主義的天空，讓你聽到真北大的聲音，讓你感受到多少年來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真北大的精神。⁵⁴

這裡，是對「六四」之後中國大學校園的真實的揭示，如學生刊物裡的一篇文章所說，「大學生活卻出現了狹窄化、專業化、技術化的傾向。『三點成一線』的單調生活，⁵⁵使學習成了機械訓練和應付考試的枯燥過程，生活成為注重實用，只對專業技能感興趣的單維化生活。在工藝層面的操作和忙亂之中，個性和創造逐漸消隱」。⁵⁶

這裡，更有對北大「獨立，自由，批判，創造」傳統的呼喚與自覺繼承。

54 在時事社被取締以後，我把學生送給我的這份刊物保存起來，並將這篇發刊詞收入我編輯的《走近北大》一書，算是我的默默紀念。《時事》編輯部：〈尋找真北大的聲音〉，錢理群主編：《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頁282-284。

55 指每天奔走於「寢室」——「教室」、「圖書館」——「食堂」三點之間的直線單調的讀書生活。

56 〈大學的興盛和文化重建〉，轉引自錢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學的歷史記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417。

這是在「六四」鎮壓九年之後，終於發出的新一代北大人，新一代中國青年的獨立的聲音。我當時就寫了一篇題為〈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學的歷史記事〉的文章，表示「要以史家之筆，作出這樣的判斷：《時事》、《微光》、《大學》這些學生民間刊物，衝破了九十年代的精神禁錮與商品經濟的衝擊所造成的思想沉寂狀態，重新高舉『精神、思想自由與獨立』的旗幟，表現了極其可貴的批判、創造的精神與勇氣，他們為北大的傳統所寫下的這新的一頁，將會載入史冊」。⁵⁷這是對1919年的五四運動、1957年的五一九民主運動、1980年的校園選舉運動，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一個呼應與回響，儘管它的規模與影響都不能和這些北大輝煌的歷史相比，但它又確實是對這些輝煌時刻所開創與發展的北大精神的自覺繼承，而且它發生在民間聲音完全被扼殺、民間運動失去了生存空間的九十年代的大學校園和中國，標示著獨立、自由、科學、民主的火炬在新一代人中的傳遞，因此就有了不可忽視的意義。

這裡所說到的《微光》、《大學》是同時出現的學生社團「微光社」、「百年同行」主辦的刊物，當時還有一些類似的刊物，因此，在1997年的北大，形成了一股民間思潮。我之所以在其一出現時，就對它作出這樣的歷史性評價，是因為他們當時正受到了巨大的壓力，如我在文章裡所說，「《微光》、《時事》的主編均遭審問、調查，強迫交出作者名單，刊物也被查禁，相關社團則被禁止繼續活動」。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時事社請我演講，卻不能在北大校園裡講，只能轉移到另一所不太知名的學校的一間教室裡。因此，我要記下這歷史的一筆，同時又這樣自責：「我恨自己的軟弱無力，就連此刻我寫下的這一切，所謂『史家』的判斷，又有什麼用呢？說穿了不過是阿Q式的自慰，而孩子們需要的是現實的保護與抗爭啊！……。」⁵⁸

那麼，這些年輕的北大學子究竟表達了怎樣的意見和思想，讓當局如此不能相容呢？

這是他們對九十年代中國現實的判斷和批判：「『六四』事件以後，政改〔即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甚至倒退了，而經濟改革卻繼續推進」，形成了

57 錢理群：〈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學的歷史記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418。

58 錢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學的歷史記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415、418。

「政治專制，經濟開明」的局面，並反過來影響經濟改革，造成「股份制改革起點極不平等」，「操作極不公正」。面對這樣的現實，中國的知識界在自身「邊緣化」以後，既「喪失了對社會批判的勇氣」，又「對日日發生在自己身邊的犯罪保持沉默，以致於偽學者氾濫，知識份子普遍奴性化，成為這個時代的特徵」。他們因此而發出警告：「隨著這種不公平的改革的進一步推進，社會深層次的矛盾日益顯露，而政治上的專制又必然會轉化為經濟領域的更加腐敗，國企大面積癱瘓，失業工人隊伍進一步擴大，社會不公越演越烈，經濟崩潰那一日終將來臨！」⁵⁹年輕人是敏感的，他們對「『六四』事件以後」的中國「政治專制，經濟開明」的「不公平的改革」的批判，以及對九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普遍奴性化」的批判，都抓住了要害，並且為其後的歷史所證實。

這是他們所意識到的歷史任務：「有必要再一次高舉『科學』的旗幟，啟科學之蒙，啟民主之蒙，要根植於中國國情，以理性批判的態度探討有中國特色的道路」。⁶⁰這也抓住了要害：中國依然需要新的思想啟蒙運動。而且這是在九十年代政治高壓下，在民間參與方面，這是一個可以嘗試的領域和方式。儘管從一開始就受到打壓，但也說明了這樣的參與是要付出代價的。

(二)另一種民間紀念

這是我在1997年前後的一個想法，也可以說是我內在生命的一種需要。「六四」以後這九年，儘管我有許多緊張的思考，但總體來說，是過著平靜的書齋生活，遠離了社會實際運動。這種情況，引起了我的不安，而且與日俱增。到1997年幾乎到了臨界點，我在一篇文章裡，這樣寫道：「我無法回避內心的疑慮，擔憂，恐懼與悲哀。我擔心與世隔絕的寧靜，有必要與無必要的種種學術規範會窒息了我的生命活力與學術創造力和想像力，導致自我生命與學術的平庸與萎縮；我還憂慮於寧靜生活的惰性，會磨鈍了我的思想與學術的鋒芒，使我最終喪失了視為生命的知識分子的批判功能；我更警戒、恐懼於學者的地位與權威會使我自覺、不自覺地落入權力的網絡，成為知識的

59 《中國雪崩》，轉引自錢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學的歷史記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416。

60 《我說中國學術界的現狀與出路》，轉引自錢理群：〈一九九七年北京大學的歷史記事〉，《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頁416。

壓迫者與政治壓迫的合謀與附庸。我同時又為成了學術『名人』陷入傳播媒體的包圍中，在與普通百姓及年輕人的交往中增添了許多不必要的障礙，而感到悲哀。於是，我內心深處，時時響起一種生命的呼喚：像魯迅那樣，衝出這寧靜的院牆，『站在沙漠上，看著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也在所不惜。⁶¹我內心的呼喚，就這樣和北大學生的呼聲相應和了。

於是，就有了一次用民間的力量推動思想啟蒙的相互合作，時機就選擇在1998年北大百週年紀念。如當時的一篇報導所說，由於北大在中國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它的百週年校慶「已經不僅是一個著名學校的生日，它甚至超乎教育界而成為整個國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⁶²為全國所矚目。當時，在思想、文化、學術界圍繞著如何認識與理解北大傳統，曾有過一場影響深遠的爭論。一位學者編了一本《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⁶³我們在前面講到的因為提出「大民主、小民主」的概念而遭毛澤東批判的李慎之(1923-2003)，在為此書寫的序言裡明確指出：蔡元培(1868-1940)「提出『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並包』的方針，使北大正式成為在中國引進和發揚自由主義的基地」，⁶⁴「值此北京大學慶祝建校一百周年之際，最要緊的是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⁶⁵文章強調「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價值」，並呼籲和斷言：「發軔於北京大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在今天的復興，一定會把一個自由的中國帶入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而且為世界造福爭光」。⁶⁶據說李慎之此文是「近四十多年來第一篇公開地講自由主義的文章」，

61 錢理群：〈尋求精神支援——《魯迅和他的論敵文選》序及其他〉(二)(1997年4月27日)，《走進當代的魯迅》，頁323。

62 參看錢理群：〈另一種民間紀念——《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序〉，《論北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頁204。

63 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

64 李慎之：〈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頁2。

65 李慎之：〈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頁1。

66 李慎之：〈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

因此被認為「開拓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言路空間」，使「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理立場浮出水面」。因此，也遭到了以後被稱為「新左派」的學者的批判：這或許就是九十年代最有影響的「自由主義」和「新左派」論戰的發端之一吧。⁶⁷

有意思的是，國家最高領導也高度重視北大的百週年紀念，江澤民發表長篇演講，突出的是愛國主義傳統。⁶⁸於是，北大的校慶就被高度政治化了。這樣一個政治功利化，同時又有濃厚的商業化色彩的官方紀念，引起了學校師生、校友，以及社會的不滿，於是就有了「民間紀念」的客觀需要。我和一部分師生就順勢提出要編寫、演出《蔡元培》話劇，讓老校長的形象重現北大舞台，開展一個以「繼承和發揚蔡元培校長開創的北大精神傳統」為中心的民間紀念活動。因為是要宣揚蔡校長，學校當局難以禁止，於是就採取了「不反對，不支持，不宣傳」的態度，不管怎樣，我們總算獲得了一個民間參與的活動空間。我們的《蔡元培》話劇組也就成了「志願者的精神自由集合體」。劇組用了很大精力進行「傳播蔡元培思想與精神」的活動：組織對和蔡先生有關的老人和專家的採訪；舉辦各種學術講座；發動校友、師生撰寫研究論文；舉辦有關圖書、圖片展覽；開闢宣傳櫥窗，印發《編演資料》等等。而劇本的編寫、排演、演出、宣傳，策劃等，實際上都是一次次民間的自我教育、啟蒙的過程。最後又通過舞台的表演，傳遞給北大師生，它所引起的強烈反響，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料之外。這種民間的「另一種紀念」就成為北大百週年紀念的一個特殊亮點。⁶⁹最後，我們編寫了《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一書，算是一個歷史的記錄吧⁷⁰——當然，這只是「死水

的先聲》，頁5。參看楊繼繩：《燦爛的夕陽——悼李慎之》，《懷念李慎之》，自印本。

67 關於這場由北大百週年校慶引發的論爭，可參看李蔚新：〈9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復興〉，文載《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夏季號。

68 江澤民：〈繼承和發揚五四運動的光榮傳統〉（1998年5月4日），《江澤民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頁121-126。

69 一位社會學系的學生曾以北大百週年校慶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寫了一篇畢業論文，因為要經過體制內的答辯，自然不可能寫入我們的民間紀念活動；但這位學生卻執意要將這篇論文送給我，或許是要藉此彌補他的某種遺憾吧。我們都相信，1998年前後的民間紀念遲早是要進入北大的校史的。

70 參看錢理群：〈另一種民間紀念——《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序〉，收錄於錢理群編：《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微瀾」，既形成不了民間運動，影響也有限；但同時也要看到，類似的民間活動所在多有，只不過發生在北京大學，就有幸留存下來，更多的情況，還是如魯迅所說的，人們「在前仆後繼的戰鬥，不過一面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⁷¹而我們自稱「志願者」這一點倒頗值得注意：在下一個歷史階段，「志願者」將成為民間參與的重要方式。

(三)新的思想啟蒙：毛澤東文化影響下的國民性批判

下面，還要多說幾句我對1998年前後思想啟蒙的一種理解，以及相應的教學活動。在我看來，九十年代的思想啟蒙，既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和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精神的繼承，同時也要面對時代的新問題。我又認為，鑒於八十年代未能對毛澤東思想進行徹底清理，九十年代需要進行補課，因此，「批判毛澤東思想對國民性的影響」，就應該是新啟蒙的重要任務。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於1997年在北大專門開設了一門選修課：「周氏兄弟思想研究」，⁷²而且講明，我的重點是講魯迅、周作人的思想在九十年代中國的意義；後來，我把它概括為「講魯迅、周作人，又接著往下講」，而講述的一個重點，就是「改造國民性」。主要講四個題目，「都是有很大的現實性」，⁷³而且融入了我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思考」。⁷⁴這門課開設在1997年，是自覺地為百週年校慶民間紀念提供思想和理論資源的。

後又收錄於錢理群：《論北大》。

71 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1934年9月25日），《魯迅全集》第6卷，頁122。

72 這次講課的講稿後來整理成了《話說周氏兄弟》一書，在該書的〈後記〉裡談到了聽課的情景：「因為聽課的人越來越多，不得不一再地改換教室，直至全校最大的可容三百多人的階梯教室，有時還有學生要站着聽課。聽課的人遠遠超過了中文系的範圍，包括了許多外系（甚至理科）的學生，進修教師，更有不少外校的有工作單位、無工作單位的旁聽者。這樣的聽課熱情八十年代中後期有過，在九十年代卻是久違了的。這或許傳遞了時代氛圍的某些變化的某種信息」。錢理群：〈後記〉，《話說周氏兄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頁304。

73 錢理群：《話說周氏兄弟》，頁159。

74 錢理群：《話說周氏兄弟》，頁306。

1. 說「食人」

魯迅所說的「吃人」，或者說中國民族是一個「食人」的民族，不僅是象徵，而且是實指：中國人真的是在「吃人」，包括肆無忌憚地殺人。而且在中國，「食人」是與「忠」、「孝」這樣一些中國傳統的儒家主流文化的基本概念聯繫在一起的，是在倫理道德的美名之下，在道德理想主義的旗號下食人。更可怕的是，這種吃人已經進入了中國的文學，被審美化了。中國老百姓家喻戶曉的《三國演義》、《水滸》，都有吃人的描寫。而且都是繪聲繪色，塗以「道德美」的神聖光彩。

而且還有許多為「食人」張目的現代理論。如將「革命」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以後，還要求一種整體性的思維，即為整體性的利益必須犧牲個人的，包括個人的生命，在中國，正是太不把人的生命當成一回事了。魯迅曾十分沉重感嘆說：造物主「實在將生命造得太濫，毀得太濫」。

還有「殺反革命」，好像革命一到，一切反革命者就得死，更泛化為「殺非革命」，實際就是「所有的異己者都該死」。中國這一個世紀的歷史就是以「革命」的名義殺害「反革命」與「不革命」的歷史。

而中國知識分子在食人、嗜殺中往往扮演幫凶的角色，藉助政治力量來扼殺對手，甚至把對手送上斷頭台的知識分子是大有人在的，一部「五四」以後的思想文化史，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互相殘殺的歷史。⁷⁵

2. 談「做夢」

中國民族沒有宗教，好像沒有宗教的狂熱，但有另外一種形態的宗教狂熱。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就是一種宗教的狂信：首先是迷信主觀精神和意志，第二，迷信群眾運動，第三，迷信權力。將不受監督的權力和群眾運動結合起來，彷彿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由此，引申出迷信青春，迷信無知等等。

迷信主觀精神意志的同時是反科學、反理性；在迷信群眾運動的另一面是反專家、反知識分子；在迷信多數的同時壓制少數；在迷信權力的同時壓制民主；在迷信青春的同時反對老年人。所以「狂信」的另一面就是周作人說

75 參看錢理群：〈說「食人」——「改造國民性」思想之一〉（1997年11月11日、18日講），《話說周氏兄弟》，頁157-178。

的「專制」。

還有「群眾性的大批判運動」。這首先是語言的迷信，語言的狂歡，用語言的魔力將人的本性迷惑。然後，語言也變成一種「施暴」的力量。但沒有人會對此有任何的反省，因為每個人都處在高度興奮的狂熱中，都有一種莫名的神聖感，彷彿自己在創造歷史，為「真理」而戰。因此這就使這類「狂信的專制」又帶上了某種道德理想主義的色彩，中國這個民族沒有宗教狂，但有道德狂，道德理想主義的狂熱，道德理想主義和不受限制不受監督的權力的結合，從而造成很大的災難。

要追問的是，在全民夢造成的全民族的災難中、專制裡，知識分子扮演什麼角色，負什麼責任？客觀地說，知識分子是受害者，另一方面又是推波助瀾者，這裡也隱含著對於權力，對於「專制的狂信」的恐懼，進而在「從眾」心理中尋得平衡，找到為自我辯護的理由。

中國的歷史是在一亂一治中循環前進的，本世紀好像有這麼個規律——一亂就殺人，一治就做夢。亂了就殺人，人殺夠了，天下太平了，就講「治」；而一講「治」就做夢，不顧主客觀條件亂來一氣，又造成災難，又亂，又殺人。在做夢和殺人之間不斷反覆，好像這就構成了本世紀的一部歷史。⁷⁶

3. 論「演戲」

魯迅說，中國人多是「做戲的虛無黨」，中國人很少是「信而從」，而是「怕而利用」，整個中國的天地是一個戲場，整個歷史就是一部做戲的歷史。⁷⁷而這種「做戲的虛無黨」是通過語言表現出來的，中國就是一個「文字遊戲國」，⁷⁸在中國「有明說要做，其實不做的；有明說不做，其實要做的；有明說做這樣，其實做那樣的；有其實是自己要這麼做，倒說別人要這麼做的；有一聲不響，而其實倒做了的」。⁷⁹中國的語言完全游離於想和做之外，

76 參看錢理群：〈談「做夢」——「改造國民性」思想之二〉（1997年11月11日、18日講），《話說周氏兄弟》，頁179-197。

77 參看魯迅：《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1926年7月12日-8月16日作），《魯迅全集》第3卷，頁346。

78 參看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逃名》（1935年9月5日），《魯迅全集》第6卷，頁409。

79 參看魯迅：《偽自由書·推背圖》（1933年4月6日），《魯迅全集》第5卷，頁97。

自由行動。問題是，大家都清醒地知道語言的虛偽性，卻仍要繼續維持這個虛偽性，因為已經形成了遊戲的規則。明知是假的，也要做出相信的樣子，才能維持遊戲的規則，如果其中有一人說出真話，指出它是假的，這人就是蠢物，就破壞了遊戲規則，使遊戲做不下去，大家都會反過來要把他撲滅。

在中國，權力與語言的合一，形成語言的霸權，所謂「凡當局所誅者皆有罪」。在這種情況下，語言只具有政治功能，唯一的功能是征服，不是可以討論、交流的，官話成為唯一合法的語言存在：在權力者統治下的臣民為了取得生存權，也必須跟著說官話。強權統治的可怕處在於，不僅剝奪人們說話的權利，也剝奪人沉默的權利，每人必須表態。強迫說話必然帶有表演特點，必然說假話，這就造成語言的遊戲化，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相互欺騙，而且雙方心照不宣。

近百年來中國盛行的是這樣兩種語言形式，或者是以服從模仿為特徵的「土八股」，或者是胡說八道、顛倒黑白，語言形式又很漂亮的「洋八股」、「黨八股」、「幫八股」、「革命八股」，基本籠罩了中國人的說話與寫作。「黨八股」、「革命八股」周作人認為在中國傳統中的根源，就是中國「古之史論」，是「宋以後的策論」，韓愈的文章是它的「祖師爺」。我認為毛澤東的語言就有相當的策論成分。而「毛語言」是包括毛澤東時代所形成的一種思維方式、情感方式、心理方式以及語言方式，對中國國民性的影響，是絕不可低估的。⁸⁰

4. 析「主與奴」

魯迅發現，在中國，主與奴是可以互換的，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也就是失去權力）的時候就奴性十足。因此，在中國很容易產生「權力崇拜」，產生「權力至上」的觀念，在毛澤東時代就有了更大的，或者惡性的發展，以至毛澤東明確地作出理論的概括，叫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文化大革命」中更是發展為「有權就有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文化大革命最後變成全民大奪權，就是因為每一個人的利益都跟權力聯繫在一起，你這一派掌權了，你就是「主人」中的一分子，可以分享各種權力；你這一派的對立面掌了

80 參看錢理群：〈論「演戲」——「改造國民性」思想之三〉（1997年11月18日、11月25日講），《話說周氏兄弟》，頁198-233。

權，你就是「奴隸」，隨時都有可能被「專政」的鐵拳剝奪一切權力。

因此，這種權力崇拜已經滲入到不同程度捲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國人的靈魂深處，並且遺傳到了後代。當今之中國，幾乎每一個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由於社會分工而享有的權力，既為自己撈取物質的利益，又在施虐於他人中，得到自我精神的滿足。另一方面，人們又在形形色色的精神暴政面前，處處顯示出麻木、忍從的奴相。跟阿Q似的，在對他人的更加肆無忌憚的報復中，贏得精神的補償與自慰，由此形成惡性的循環。⁸¹

不難看出，我在1997年重新闡釋周氏兄弟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其矛頭正指向了毛澤東思想、文化對中國國民性的消極影響，並且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可以說是對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的精神病象的一次集中診斷。因此，不僅在聽課的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而且引起了最高當局的注意。以致最後在2000年7月高校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主管教育的副總理李嵐清(1932-)出面，對我進行點名批判，試圖將我趕出北大，後來遭到了北大學生和老師的強烈反對而不了了之。⁸²這也算是個不大不小的事件吧。

四、「六四體制」：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結構、體制的變化

以上討論，雖主要集中在九十年代的中國校園，但其實，我們更應關注的是這十年中國社會結構、體制的變化。

我曾經說過，在共和國歷史上，1957年的反右運動，是一個關鍵，其所建立的「五七體制」與之後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四清與文化大革命的出現密切相關。這裡，我還要強調，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又是一個歷史的關節點。提出「六四體制」的概念，便是要強調「六四」以後進一步強化、發展的一黨專政體制，既是毛澤東時代「五七體制」的延續，又有新的鄧小平時代的特點，而這樣的「六四體制」又和「六四」以後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緊密聯

81 錢理群：〈析「主與奴」(上)——「改造國民性」思想之四〉(1997年11月25日講)，《話說周氏兄弟》，頁234-248。

82 參看：〈「大批判」紀實(1999年8月-2000年12月)〉，《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78-113。

繫在一起：既是此結構變化的體制上的原因，同時，社會結構的變化，又賦予「六四體制」有別於「五七體制」的新特徵，並深刻影響了此後中國社會的變化。

「六四體制」的形成有一個發展過程。其中的關鍵，是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⁸³。有研究者在研究「不同的制度背景」對社會結構的變化的影響時，將「1978-1991年」作為一個階段（在此之前，還有「1949-1956」、「1957-1965」、「1966-1977」三個階段），而把「1992年以後」列為一個新的階段，⁸³這是有道理的。

「六四大屠殺」，給中國政治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全面後退，對民間反抗力量的全面打擊，以及黨的權力的全面擴張。在最高領導層則是陳雲影響力的急劇擴大，在政治上提出要把「反和平演變」置於和經濟建設同樣重要的地位，即所謂「兩個中心」；在經濟上則批判「改革的市場取向」，並提出「兩種改革觀」的問題，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而反對「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的改革」，矛頭直指鄧小平的改革主張。可以看出，陳雲派的目的是要全面地恢復毛澤東的「五七體制」，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毛澤東時代——這一直是中國「老左派」的目標，我們在下一講裡會有詳盡討論。而鄧小平對毛澤東時代的態度則更複雜，他一方面和陳雲一樣，否認文化大革命、肯定與堅持「五七體制」，但另一方面，他比陳雲更清醒地看到，不打破計劃經濟的桎梏，經濟無以發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提高，就會威脅黨的統治權力。因此，他堅持要「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對毛澤東思想、體制進行一定程度的揚棄。當時新任黨的總書記的江澤民重申毛澤東所說的「兩把刀子（列寧、斯大林）不能丟」⁸⁴的警告，大有回復毛澤東時代的趨勢。鄧小平於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到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時，就連續發表講話，這在之後被稱作「南巡講話」，實際是對執政者提出警告，其中心是：「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並且強調「計劃經濟不等於

83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頁183。

84 「兩把刀子」是毛澤東在1965年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來的，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強調中國不能丟」。詳見《毛澤東選集》第5卷，頁321-322。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要「堅決地試〔驗〕」（括號內文字為錢所加）發展市場經濟。⁸⁵所謂「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就是鄧小平路線，其內容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在經濟建設上就是要走市場經濟道路。

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及時地阻止了向「階級鬥爭治國」的毛澤東路線回歸的趨向，將中國重新拉回到「改革開放」的軌道，這又是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鄧小平看得很清楚，是否「改革開放」，關係著黨的統治合法性；現在鄧小平重申「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就再一次挽回了因為「六四」鎮壓而失去的民心、黨心，凝聚了人心，繼續保持了中國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中國，重又走出了「六四」之後的困境。⁸⁶

應該說，在鄧小平發出警告以後，江澤民迅速地回到鄧小平的路線，在以後的執政期間，也基本上執行了鄧小平的路線。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1992年以後的中國，鄧小平的路線得到了全面貫徹，在逐漸形成、完善了「鄧小平體制」（即「六四體制」）之後，其改革路線的正面與負面，才得到更充分的暴露和揭示，我們今天正可以對其進行全面的科學考察與評價。

如前面一再分析的，鄧小平路線的核心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其中

85 以上材料轉引自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491、493。

86 在聽了我的講課以後，一位台灣學生曾來信提出她的困惑，其中一點即是「始終無法理解毛一次次政策與實踐出現巨大落差後，人民怎麼繼續被吸引？」我在給她的回信裡，說了這樣一段話：「建國60年來是出現過三次大的危機的：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文革造成的大破壞；六四造成的信任危機。而實際情況也並非你說的『人民繼續被吸引』，事實上每一次危機後，都有因對根本體制的懷疑而引起的民間反抗。〔……〕都遭到了殘酷的鎮壓，以致今天人們（包括你在內）都已經不知道這些確實有過的反抗。這是『硬』的一手。當局同時還有『軟』的一手：一是對人民作出讓步，〔……〕另一方面，就是提出一個多少反映了老百姓要求的新的目標，例如在饑荒年代借著外國的封鎖而提出『自力更生』，高舉維護民族獨立的旗幟；在文革結束以後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新目標；在六四以後提出『繼續堅持改革開放』，這些都是符合民意的，至少向老百姓表明，毛澤東、共產黨雖然犯了錯誤，但他們還是願意改正的。〔……〕在中國只有一個黨，而完全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共產黨始終是唯一者，而不可能有任何力量取代。……這樣，在更根本的、也更徹底的反抗被鎮壓的情況下，大多數人就只能採取支持共產黨自己改革的態度，這就容易給人（包括你）一個『人民繼續被吸引』的印象，其實是有很多無奈的」。見錢理群：〈和台灣學生的一封信〉，載《思想》第15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頁265-266。

心是「堅持黨的領導」，在這一點上，他堅定不移地要維護毛澤東的「五七體制」，特別是其核心的兩條。一是「黨總攬一切」的政治、軍事、經濟、思想、文化權力的絕對集中與壟斷，在「六四」以後，如前一講所說，社會民主力量和黨內民主力量，都受到了全面、徹底的打壓，失去了自下而上的民間改革運動來監督、制約，黨權的擴張就達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二是「第一書記專政」，鄧小平在「六四」之後特別提出所謂「核心論」，把江澤民指定為「第三代領導核心」，並預先指定胡錦濤(1942-)為「第四代」接班人，其目的就是要維護與強化「第一書記專政」。儘管鄧小平之後，中國本已無政治強人，但在江澤民、胡錦濤穩定了黨內的領導地位之後，都在試圖不同程度地製造個人崇拜，⁸⁷也都是意在強化「第一書記專政」。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省委第一書記兼任省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任，實際上取消了人大的監督職能，與此同時，在幹部任命上，更加強化了領導人的意圖，⁸⁸這都給「第一書記專政」提供了組織的保證。正是在權力的高度集中，即人們說的「權威政治」這一點上，可以說，鄧小平的「六四體制」是毛澤東的「五七體制」的自覺繼承與強化。

鄧小平路線的另一要點，是所謂「改革開放」。它有兩個特點，其一是由共產黨一黨掌控的、以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為出發點和目的的、單一的經濟改革。這一點，在「六四」之後得到了徹底的執行，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思想文化體制的改革完全被擱置，並自覺地強化了政治、社會、思想、文化的全面控制。其二是在經濟改革上以「建立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為中心，這一點，在「六四」後才真正得到實現，研究者指出，1978-1991年期間，儘管市場機制已經開始在不同領域發揮作用，但計劃體制仍然居於主導地位，只有到了1992年以後，市場體制才上升為基本的經濟體制，同時，計劃體制也在一些重要領域發揮作用。⁸⁹但這樣的和「權威政治」結合為一體的「市場經濟」，

87 這一點，江澤民做得十分露骨，引起了普遍不滿；胡錦濤在2009年的國慶遊行中推出自己的「方陣」，在2008年奧運會、2010年世博會的開幕式上都著意突出個人，其實也是在強化「核心地位」。

88 參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09。

89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4。

就只能發展為「權貴市場經濟」，這大概就是所謂的「中國特色」。⁹⁰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作進一步討論。

這種「權威政治加市場經濟」，即權力和市場的結合，可以說是鄧小平路線的精髓，事實上也成為江澤民時期的執政綱領，並具體體現為江澤民時期的兩大指導思想和努力目標：「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就是一切」。而正是這兩個「一切」，引發了中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變動，產生了一系列的後果。

(一) 社會結構的變動，新階層的出現

在1992年以後，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動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出現了新階層⁹¹，形成新的利益群體：權貴資本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知識精英階層、下崗工人群體、失地農民群體與農民工階層。

1. 權貴資本階層

權貴資本階層的形成，是鄧小平「權威政治加市場經濟」體制——即權力和市場相結合——的直接產物。研究者這樣分析：「在『市場經濟加權威政治』的條件下，經濟領導部門掌握的是各種經濟活動的審批權，即發財審批權；黨政部門掌握的是人事任免權，即升官審批權」，這樣的「經濟活動審批權」與「官員任免權」本身就是一種「高度壟斷性的商品」，於是，就必然發生「權錢交易」，實行權力向資本的轉化，這就是官僚權貴資本階層形成的一個基本原因。⁹²

這種權力向資本轉化、新階級(階層)出現的危險，是人們早已注意並警惕的。⁹³同學們應該記得，早在1957年北大的校園裡，就討論過權力高度集

90 參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10。

91 我這裡使用的是社會學上的「階層」概念，這也是當下中國大陸學術界普遍運用的概念；而沒有用馬克思主義、左翼政治經濟學上的「階級」概念。「階級」的概念，在毛澤東時代強調的是「區分敵我」，「區分依靠、團結、打擊對象」，在實際政治中會出現許多問題。因此，我們選擇了「階層」這一相對中立的概念，但也並不忽視、回避不同階層之間的利益衝突。

92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10。

93 從下文的引述看來，在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用「階級」的概念(「特權階級」、「官僚主義者階級」等)，也有用「階層」的概念(「新興官僚統治階層」、「特權階層」等)，兩

中可能產生新的「特權階級」的問題；在六十年代《星火》再一次提出「新興的官僚統治階層」的問題；到1965年毛澤東自己也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的概念；在文革中，在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特權階級的問題，更成為民間思想者最熱衷討論的話題，其中陳爾晉提出的「特權資本化」的警告，幾乎預言了以後歷史的發展。而毛澤東去世前，也發出了「資產階級在黨內」的警告。但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資本主義並沒有得到發展，也沒有市場化，這就使得「特權資本化」還只是一種危險，其現實化是有限的，人們所反對、批判的「特權階層」，是指「政治上、精神和經濟上都享有特權，對其他階層人民進行欺壓、掠奪與奴役」。⁹⁴再加上毛澤東不斷發動群眾階級鬥爭遏制黨的幹部的特權，破壞幹部隊伍的穩定性，⁹⁵所謂「特權階級」實際上是不具有完整的階級形態的，還處於萌芽狀態，或者叫「低級階段」吧。

但到了八十年代，特權向資本的轉化，就有了經濟的基礎與條件。據有關研究，這樣的「藉權力聚斂財富」大體經過了四個階段。首先是1984年以前對外貿易有限度的開放，導致有權力背景的人可以藉倒賣⁹⁶「進口商品許可證」，利用進口商品國內、外價格的差價，獲取暴利。其次，1984至1992年，國家實行計劃價格與市場價格並存的雙軌價格。1988年，1噸鋼材計劃價格700元，市場價格1,500元；在1988年，商品、資金、外匯的雙軌價差高達3,569億元。⁹⁷巨大價差給掌握計劃內商品、資金、外匯的權力者與關係人獲得暴利創造了最好的機會。但這都還是「小試身手」。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所掀起的全民經商的熱潮中，高幹子弟紛紛「下海」，投身於剛剛興起的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利用權力操縱市場，利用所獲得的土地使

個概念是重合的。

94 向承鑿：〈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星火》第1期，油印稿。收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頁34。

95 據統計，1957-1962年，受到清理、批判、處分的黨員、幹部有433萬人，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下冊），頁1043-1044。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65。在文革中，全國脫產幹部中有17.5%，近300萬人被立案審查，據魏宏文主編：《國史紀事本末·「文化大革命」時期》，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66。

96 「倒賣」是大陸習慣用語，台灣叫「轉賣」。

97 轉引自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13。

用權、舊區拆建權和銀行貸款權，聚斂了驚人的財富。這是特權向資本轉化的第三階段。1997年以後，國家開始實行大規模的國有資產重組，一部分國有資產低價出售給有權力背景的人，變成了對國有資產的變相瓜分。只有進入了生產資料、金融等領域，權力和市場結合，「權力是在市場當中行使的權力」，「市場是權力在當中起作用的市場」，⁹⁸「權力的資本化」才真正成了現實。⁹⁹

國有資產重組的結果，形成了巨大的國有壟斷企業和部門，同樣也因為權力高度集中、缺乏監督與制約的原因，使得國有壟斷企業和部門，逐漸疏離公共職能而突現其特殊利益，形成研究者所說的「『新國有化』與『權貴私有化』左右手聯動的『原始積累流水線』」，成為形成權貴資本階層的一個重要來源。¹⁰⁰而這樣的國有壟斷企業又具有極強的擴張衝動，而且越來越沒有邊界，擠占非國有部門的發展空間，觸角伸向每一個可以獲得利益的角落。其大肆挺進房地產領域，就是攪亂經濟秩序，造成嚴重後果的一例。如研究者所指出：「國有企業已經演變成一種有效的財富轉移機制，把財富從非國有部門轉移到國有部門，從地方轉移到中央，從大部分人轉移到少數人」。¹⁰¹

形成中國權貴資本階層還有一個重要背景，即八十年代開始實行、到九十年代又進一步發展的「向地方分權」政策。應該說，向地方分權，倒是毛澤東開創的傳統。毛澤東1956年發表〈論十大關係〉、實行經濟改革、1958年發動大躍進，都以向地方分權、發揮地方積極性為重要突破口。現在鄧小平在實行市場經濟條件下，向地方分權，就造成了「以地方政府為能動主體，結合市場刺激而形成了改革經濟的主要動力」，並且在九十年代逐漸「建立、形成了以擴增GDP為主要審核『政績』的制度」。¹⁰²因此，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

98 孫立平：〈中國正在加速走向社會潰敗〉（2010年4月1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中華網：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2713/17/51/6_1.html。

99 以上討論參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12-514。

100 參看秦暉：〈「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本文原刊載於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電子報第1254期。但該網站上目前本文刊載不全，故轉引學術批評網，2011年7月27日取自：<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12&type=1002>。

101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路徑及其走向〉，《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3。

102 參看黃宗智：〈改革中的國家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危機的同一根源〉，載《開放時代》2009年第4期。

話後，全國掀起的「經商下海狂熱」當中，地方政府是一個主要推動力。其結果是，由於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確實有效地促成了各地方經濟的快速發展，但卻同時造成了地方政府功能的根本性變化：一方面是在公共服務上失職，在履行社會管理職能上的粗暴；另一方面，逐漸以「招商引資」為其主要任務，自身成為經濟的主體，形成社會學家所說的「政府行為的經濟化與企業化」，¹⁰³這就必然為自己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並且自覺地站在強勢群體（外商和私營企業主）這一邊，許多地方政府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外資與中資的代理人，這是典型的權力向資本的轉換。¹⁰⁴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及其親屬、關係人，就成為高幹子女之外的另一個權貴資本階層的重要來源。此種地方既得利益群體的形成與發展，就成了當下中國官吏腐敗難以遏制、改革難以推行、社會矛盾難以解決、惡性事件屢屢發生的根本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1994年實行的分稅制。在實行向地方分權之後，藉此舉擴大中央的稅收和功能，顯然是要將經濟發展創造的財富向中央集中——這樣的分權與集權之間的擺動，在毛澤東時代也發生過，這是集權體制固有的矛盾。分稅制實施後，縣、鄉財政普遍陷入困境，地方官員為擺脫困境、維護既得利益，一方面巧立名目增加農民負擔，另一面就更加仰賴招商引資，不惜以賤買勞動力、土地，破壞自然資源為代價，這樣造成的地方經濟繁榮，其實預伏著巨大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但在另一方面，地方保護主義也因此而滋生、發展，形成日趨強大的以地方權貴資本階層為中心的地方勢力。這是地方政治的極權（土皇帝），以及地方資本的極權，對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長遠影響。

權貴資本階層的另一個重要來源是軍隊。1992年以後軍隊也捲入全民經商熱裡，軍隊與市場結合，這在中共軍事史上是空前的。如研究者所說：「下海經商大潮中的最大奇觀是人民解放軍成為國際貿易和金融的主力軍，除了

103 據孫立平分析，「政府行為的經濟化和企業化」的主要表現有幾個方面：1.「政府機構直接參與贏利性的經營活動」；2.「利用行政權力牟取部門或個人的經濟收入」；3.「以『為企業辦實事』的名義介入企業活動」；4.「層層下達經濟增長指標，將經濟增長速度作為衡量政府官員的基本標準」。參看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47-169。

104 參看溫鐵軍：〈我們還需要鄉村建設〉，載《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

生產和出口武器外，軍隊還開辦了許多民用品企業，經營著兩萬多家工業、商貿和服務業的企業或公司」。¹⁰⁵軍隊經商，由於更加缺乏監督與制約，就更加肆無忌憚，更為瘋狂地攫取財富，這便為軍隊權貴資本階層的形成提供了經濟基礎，儘管後來明令禁止，但卻是禁而不止。由於中國的軍隊特別缺乏透明度，許多內幕至今不明，我們的討論也只能點出問題。但可以肯定其嚴重程度遠超過人們的估價與想像。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結果：一是社會財富的急劇集中——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的全國範圍的住戶調查，2002年收入最高的1%人群組獲得了社會總收入的6.1%；最高的10%人群組獲得了總收入的近31.9%。¹⁰⁶另一是權貴資本階層的形成：中國億萬富豪中有80%至90%是高幹親屬，其中2,900多名擁有的資產達20,000億多元¹⁰⁷——多年來喊的「狼來了」，大概是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權貴資本階層之「狼」才在中國特色的「六四體制」內真正培育成熟。

對於新生權貴資本階層，我有如下的分析。

首先是「從一開始就具有了極大的腐朽性與寄生性」。¹⁰⁸他們根本就不創造任何新的社會財富，不過是將建國幾十年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勞動的血汗，在「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下積累下來的國有資產攫為己有，因此，他們只攫取利潤而絕不承擔任何資本家都必須承擔的風險，這在典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即使是原始積累時期的西方國家，都是未曾見過的、特殊的狀況，也即具有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階層，他們及其子女在國內外肆無忌憚地、不計後果的瘋狂消費，連西方資產階級都為之瞠目結舌，其秘密即在於此。

105 海耶(Eric Hyer)：〈中國的軍火商：指令利潤〉(*China's Arm Merchants: Profits in Command*)，《中國季刊》1992年12月第132期，頁1101-1118。轉引自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在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頁443。

106 李實、岳希明：〈中國城鄉收入差距調查〉，《財經》2004年3、4期合刊。轉引自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522。

107 轉引自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下)，頁787。

108 錢理群：〈酷夏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39。

其次是「與國際壟斷資本的勾結，具有某種買辦性」，¹⁰⁹這在下面再作論述。

其三是「與中國傳統的，這些年有了惡性發展的黑社會相勾結」。¹¹⁰中國的不少基層社會事實上已經控制在這相互連通的兩種勢力手中：他們既用瘋狂的掠奪威脅普通平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同時又用暴力維持著權貴資本階層所需要的社會穩定。這就是所謂「官匪一家」的實質，是所謂「打黑打黑，打而不絕，越打越黑」的內在原因。許多學者已經論證了中國傳統中的流氓政治與流氓文化對中國社會的深刻影響。應該看到，這種流氓文化對這些年中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生活的滲透已經達到了驚人的地步。中國權貴資本階層的流氓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最後，還要補充權貴資本階層的代際繼承性。這是從毛澤東時代傳承下來的，即所謂「打天下者坐天下」，或所謂的「血統論」。我們在以前的歷史敘述中一再談到，這是從「五七體制」中的「重新劃分階級」，以及六十年代「貫徹階級路線」、「培養接班人」，再到文化大革命中的「高幹子弟要永遠掌權」等思維一路延續下來的。對權貴資本階層來說，他們覬覦的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一體化的全面權力，而且要代代相傳。現在中國出現了所謂「官二代、三代」，當然不是偶然的。

2. 私營企業主階層

按社會學家的分析，所謂「私營企業主階層」，是「由各種非公有制企業組織的投資人組成」的，其形成與發展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在毛澤東時代，傳統的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先是1956年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運動ⁱⁱ，基本上消滅了私營經濟，資方人員成為拿定息的階級；到1965年，定息制度被取消，傳統的資產階級完全失去了經濟上的存在基礎；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更對之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到了改革開放時期，私營企業有了恢復與發展的可能，但在八十年代初，卻或者混跡於個體工商戶

109 錢理群：〈酷暑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39。

110 錢理群：〈酷暑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40。

裡，或者隱形於集體企業中，沒有獲得法律的認可。直到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¹¹¹，國務院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私營企業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才獲得了公開存在和發展的合法權利。之後，隨即進入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特別是1992年以後，私營企業的戶數和投資者人數的年增長幅度均達到了兩位數，到2002年，全國私營企業總數已經達到202.85萬戶。1992-2002年十年間，全國私營企業實現的產值總增幅為75.5倍、實現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總增幅為87.3倍、實現稅收總增幅為206.8倍、吸納就業人數總增幅13.7倍。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私營企業已經占到1/3以上的比重。在私營經濟發展較快的浙江等地，私營經濟已經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甚至超過70%。¹¹¹研究者指出：「正是由於私營企業的發展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貢獻，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近年來迅速上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對私營企業的發展寄予越來越大的希望」。¹¹²

據社會學家的研究，中國新興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具有這樣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1)「機關幹部和企業管理人員家庭出身的人成為私營企業主的可能性大於總體結構中的平均分布」；¹¹³(2)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文化程度在逐漸提高：從1993-2002年，擁有較低文化資源的私營企業主所占比例，從47%下降為19.7%；擁有中等文化資源的業主所占比例從35.9%上升為41.9%；擁有較高文化資源的業主比例從17.2%上升為38.4%，升幅達123.3%。這說明，私營企業主最初是以低、中文化水平的成員為主的，但隨著私營企業的發展，「低學歷的人越來越難以進入私營企業主這個階層」。¹¹⁴(3)「私營企業主的社會來源越來越以其他領域的精英為主，尤其經濟精英的轉化更為明顯」，從1993-2002年，原企業負責人所占比例從六分之一上升到一半以上，成為第一位。這都表明了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精英」性質，普通老百姓創辦私營企業的機會越來越少。¹¹⁵(4)「國家幹部和農村幹部是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極重要來

111 以上數據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41-243、245、257-258。

112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58。

113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47。

114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49。

115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51。

源」，¹¹⁶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黨員比例也在逐漸上升，2002年已高達30%，這都表明私營企業主階層與國家權力關係的日益密切。¹¹⁷(5)隨著私營企業主階層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的貢獻與地位提高，他們的政治參與意識也逐漸加強。國家——特別是地方政府——也在制度和政策上不斷調整、擴大私營企業主階層的政治參與空間。除了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的比例和層級呈上升趨勢外，私營企業主階層更積極介入基層選舉，以直接掌握一定的組織權力資源，這都表明，私營企業主階層與政府權力千絲萬縷的聯繫正在被自覺地強化。¹¹⁸

我對私營企業主階層也有這樣的觀察：黨內權貴資本階層實行權力的壟斷與經濟的壟斷，迫使中國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只能在他們的庇護、卵翼下求得發展，從而具有先天的依附性。他們在黨內權貴資本階層上付出的一切，就只能在對工人的瘋狂盤剝中得到補償，黨內的權貴資本階層也利用他們的權力壓制工人的任何反抗作為回報。兩者的勾結，一方面使私營工廠裡的工人處於空前悲慘的境遇，同時也使得中國的私營企業主階層對工人的盤剝，從一開始就是將現代資本的剝削方式與傳統的封建方式結合，他們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仰賴專制體制來維護其超經濟的剝削。再加上中國的許多私營企業主，在初期有不少是從不具有「現代文化知識」¹¹⁹的農民轉化過來的，因此，他們自身不具有民主的要求，至少這種民主要求是不強烈的。這就是說，中國權貴資本階層的反民主性與腐朽性，也影響了依附於他們的中國私營企業主階層的品質，這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因此，我對一些知識分子把中國民主化的希望主要寄託於私營企業主階層，是持保留態度的。¹²⁰

當然，前述社會學家的研究也表明，中國的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來源、內部結構、自身的知識結構也都在變化中，更重要的是，他們自身的發展，也必然要提出政治、經濟民主化的要求，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中國的私營

116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53。

117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49。

118 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63-265。

119 主要指近現代從西方傳入的現代文化知識，其中包括科學、民主等現代觀念。

120 以上分析詳見錢理群：〈酷夏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40。

企業主階層也有可能成為推動中國社會民主化的一種力量。我特別注意的是，在投入1992年的全民經商、下海的熱潮中的人裡，有一部分是八十年代民間民主運動和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骨幹與積極分子，許多人後來都取得了商業的成功，成為私營企業主階層的骨幹。因此，其中必有一部分人依然堅持當年的理念，而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再度在中國民主化運動中發揮其獨特的作用，這或許是可以期待的。

私營企業主階層的代際繼承，最初或許並不明顯，到了下一時期，才逐漸引人注目，「富二代」就成了一個熱議的話題。

3. 知識精英階層的分化

我們已經多次說過，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時代處於相當尷尬的地位。對毛澤東而言，國家的建設與發展需要知識分子，不能不給予一定的地位，但他卻從根柢上不信任知識分子，將其視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因此，毛澤東不但從理論上不承認知識分子的獨立存在，認定他們只能依附於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而且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竭力將他們排斥在體制之外。可以說，在1957年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已經不再作為獨立的政治、社會力量，在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發展中發揮獨立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們更成為「全面專政」的對象。

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在全民現代化建設熱潮中，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同時又處在鄧小平「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陰影之下，知識分子自身也在發生變化，逐漸從體制的依附中擺脫出來，在八十年代末，就發出了自己的獨立聲音。這同時意味著知識精英階層已開始形成。但在八十年代，知識精英主要是依靠自己的知識資本所造成的聲望對社會產生影響，本身並不具有多少經濟實力，當時甚至還有「腦體倒掛」、「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之說。

但到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發生了深刻而重要的變化。這是和國家體制越來越重視對知識分子精英的接納、吸收直接相關。我對之曾經有過這樣的描述：「花樣繁多的評獎、立項，評職稱、評學科帶頭人、評博士點、提拔接班人……，已經形成了一套操作性極強的新科舉制度，目的仍是請君入甕：只要爬了上去，就有錢有房有地位，但必須聽領導的話，至少要削弱

自己的批判的鋒芒。如有個別不識相者，得了利益還要批判，就視為大敵，必封殺而後快：這也是傳統的胡蘿蔔加大棒的統治術的新用」。¹²¹

知識分子體制化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學院、專家類型知識分子的增長與突現，同時，隨著網絡、報刊等新舊媒體的急劇擴張，造就了龐大的新聞從業人員，更造就了一批所謂「媒體知識分子」，這兩類知識分子的情況當然很不一樣，但卻都導致知識分子獨立性與批判性的減弱，這也是十分明顯的。¹²²

知識分子體制化的結果，一方面極大地提高了經濟實力，知識分子精英階層既以體制內的身分獲取不斷提高的工資、獎金、課題項目費用，其中一部分人同時又以體制外的身分參與市場分配，積累了與八十年代不能相比的經濟資本，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生活方式明顯的中產階級化，並成為九十年代消費文化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精英進入權力機構，原有的知識資本也迅速轉換為文化權力與學術、教育權力，權力資本的極度擴張，也成為九十年代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的顯著特徵，到了新世紀更有了惡性的發展。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就是這樣藉助自己原有的知識資本，以及新積累的經濟資本和權力資本，加上其以原有和新闢的社會關係資本作為優勢，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和新世紀，逐漸進入了「中間階層」¹²³，而「中間階層」的成熟與發展，¹²⁴也正是這一時期中國社會流動中的引人注目的現象。

知識分子精英中間階層化的結果，總體上形成了知識分子的保守性品格，和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激進化形成鮮明對比。但知識分子由於主要從事

121 錢理群：〈酷夏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45。

122 參看李陀：〈序言〉，《七十年代》，頁xiv-xv。

123 據社會學家的分析，「中間階層」具有以下特徵：（1）一定的知識資本及職業聲望資本。（2）從事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3）所從事的職業有較高的市場回報。（4）具有一定職業權力。（5）收入和財富在社會屬於中等水平。（6）具有購私產房、私人汽車、定期旅行休假等消費能力和相應的生活方式。（7）對社會公共事物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參看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70-271。

124 據《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一書的分析，中國中間階層主要來源，除幹部群體，知識分子群體外，還有小業主、小商販，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家，就業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和白領員工。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277-279。

精神勞動，其政治、經濟、社會地位與其精神取向和思想發展的關係是複雜的：既有被體制收編者，也有依然堅持反體制者；在具體的思想、觀念、立場上更會有不同的傾向。這樣，就形成了知識精英階層的思想分化，並引發了激烈的論爭，這也是九十年代最矚目的思想、文化現象。

「六四」以後，首先興起的是保守主義思潮，當時就有「國學在燕園(北京大學校園)悄然興起」之說，以後新儒學就源源不斷鼓吹了20年。與此同時，是建立學院派學術的自覺努力，這既是對八十年代激進主義思潮的反思，也是在專制回潮下知識分子的自我保護。在九十年代初，又有「人文精神」的討論，這是對專制體制與市場經濟對人文精神的衝擊，以及「六四」之後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邊緣化的一個反撥。我曾經說過，「這樣的批判性的關注，在整個社會風氣趨向遠離現實、遠離政治的情況下，自然是有積極意義的；但形成對照的，卻是知識份子對同時發生的兩極分化現象，工人、農民生存狀態的急劇惡化，反應的遲鈍，他們對自身邊緣化的敏感，就多少帶有自憐、自戀的病態」。¹²⁵

影響最大、最為深遠的，自然是九十年代中後期所謂「自由主義者」和「新左派」的論爭。¹²⁶儘管這樣的命名，特別是用這樣的命名，在知識分子中排隊，可能把問題簡單化，但兩種意見的分歧，是確實存在的。在我看來，主要是對九十年代中國社會性質的認識不同，導致思想文化的批判對象認識的不同。「新左派」認為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化，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標誌著中國社會的質變，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的主要危險，也應該成為主要的批判對象。「自由主義者」則認為，就社會性質和社會制度而言，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和毛澤東時代一脈相承，是在社會主義名義下實行的專制，而幾千年的封建殘餘還在阻礙中國前進，因此對於中國特色集權專制的批判，還是一個未完成的任務。

與此相聯繫的，是對九十年代獲得極大發展的中國式的市場經濟的態度。「新左派」把批判鋒芒指向市場霸權和壟斷精英，認為試圖通過市場經濟

125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中心》，頁148。

126 一般認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標誌性代表作是：1998年李慎之為劉軍寧所編輯《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一書寫的序言：〈弘揚北大的自由主義傳統〉；1997年《天涯》第5期發表的汪暉：〈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

的發展達到民主、公平和正義，是新市場崇拜，是另一種烏托邦；「自由主義者」則堅持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問題即使再嚴重，也只能硬著頭皮向前走，並且認為中國問題的根子是沒有得到改革的壟斷性權力結構，導致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完善、不成熟，需要反對的是權力對市場的干預。

由此而引申出的，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時代、中國革命的不同歷史評價。「新左派」強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現代化意識形態；不僅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以實現現代化為目標，而且它本身就是中國現代性的主要特徵，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現代性理論——應該說，這是對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全新的闡釋，產生了很大影響。「新左派」因此對中國革命、毛澤東時代給予了更多的正面評價，也反對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自由主義者」則堅持對毛澤東專制主義的批判、對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毛澤東時代的批判、對毛澤東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以及對暴力革命的批判，因此主張「告別革命」。

關於中國未來的發展道路，「自由主義者」強調民主、自由，並且有明確的目標，就是要發展公民社會、走西方已有成熟經驗的憲政民主道路。因此，他們延續八十年代的思路，把希望寄託於中產階級身上。「新左派」則更注重社會的平等，主張借鑑中國革命和毛澤東社會主義實驗的經驗，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他們把更多的希望寄託在發展人民民主上，同時又強調民族國家的地位和作用，反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認為民族主義的復興是歷史的必然。而「自由主義者」對民族主義則始終保持警惕，擔心民族主義的非理性會被專制體制所利用。¹²⁷

可以看出，「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者」的論爭，同是對九十年代中國社會變動的反應，只是有不同的判斷和理論分析，也有不同的對應之策，這本身便有著深刻的歷史內容與現實意義，同時也可能通過論爭而達到某種共識(即所謂「最大公約數」)，同時又保留各自的意見。但問題在於，雙方都把對方視為主要危險：「新左派」認為「自由主義者」是壟斷精英的代言人，「自由主義

127 以上概括性介紹，參看楊繼繩：〈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第8章第3節，頁539-557。

者」則視「新左派」為專制體制的合謀。我曾經說過，他們彼此糾成一團，反而把專制體制放在一邊了，同時也削減了他們的影響。

這裡，想補敘一段我自己在九十年代中後期思想的發展和選擇。應該說，我在八十年代主要堅持的是啟蒙主義立場，思想上則有著自由主義色彩。我在前面談到，九十年代「新左派」出現，他們對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尖銳批判，使我注意到了改革開放帶來的負面：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因此而引起可謂刻骨銘心的自我反省，我追問自己：為什麼對底層人民權利和生活的相對貧困化視而不見？在中國的兩極分化中，我作為知識分子應負什麼責任？我在面對和批判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時，始終有魯迅所說的「我也在其中，我也未嘗沒有吃人」的感覺，因此，一切外在的批判最後都轉化為自我批判，對自己的責任的追問。我由此而反省自己八十年代那種缺乏自我警戒的精英立場，未加反思的西方現代化想像，以及對魯迅參與構建的、曾經給我以深刻影響的、強調社會平等與正義的左翼傳統、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傳統的淡化與忽視。但我同時又警惕於：再走回頭路，否定堅持民主與科學的啟蒙主義傳統，美化中國革命和毛澤東時代，回到也同樣曾經給我以深刻影響的民粹主義立場。對毛澤東時代，我有太多刻骨銘心的歷史記憶，我不可能忽視和否認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模式曾經走到反面，給民族帶來災難的歷史事實，我也不可能忘記其中深刻的歷史經驗教訓。這就使我陷入一種歷史選擇的兩難，以及在現實論爭中的尷尬境地。我發現，自己因為無法認同任何一個旗幟鮮明的立場和斬釘截鐵的觀點，而顯得猶豫不決。當然，最終我還是在魯迅的「真正知識階級」的選擇裡找到了自己的立足點：一方面，堅持基於「立人」理想的徹底的批判立場，對民主、科學、自由、平等的理念，對理想主義和啟蒙主義，都持「既堅持，又質疑」的複雜態度，始終保持對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態、烏托邦的懷疑，對任何不能自審的東西始終反感和警惕，因而永遠不滿足現狀，成為一個永遠的批判者，包括不斷地懷疑和批判自己，並因此選擇永遠的邊緣地位。另一方面，在兩極分化的現實中，我則堅持站在底層人民、弱勢群體這一邊，對一切方面、以一切形式出現的人壓迫人、人奴役人的現象和制度，進行力所能及的批判，但拒絕充當所謂「人民代言人」，在自己與底層民眾的關係中，也同樣堅守自己的獨立性。同時本著「想大問題，作小事情」的原則，做力所能及的建設性工

作，研究民間思想發展史，推動民間改革運動——我自認為這是對我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左翼立場、革命理念、社會主義理想，質疑中的堅守與發展，同時又在堅守與發展中質疑。對於我來說，就是首先要「走出毛澤東」，和毛澤東建立的一黨專政的體制決裂；同時又和毛澤東參與構建的革命傳統、社會主義傳統保持某種精神的聯繫。我不知道自己的這一最後選擇，在我的同代人，也即毛澤東培養出來的一代知識分子中間有多大的代表性，但至少也算是一種選擇吧。

這樣的選擇也影響了我在學術上的表現，從九十年代末開始，我就不斷提出要科學地研究「共和國文化」，在2002年所寫的一篇文章裡，更加明確地提出了「科學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任務，並且特意點明「孫中山、魯迅、毛澤東」的重要性：「可以說，20世紀的中國經驗，主要集中在他們的思想與著作中，不管人們對之作出怎樣的評價，他們都是研究與了解20世紀中國不可忽略、繞不過去的『世紀遺產』」。¹²⁸我這樣概括我對毛澤東的認識：「毛澤東在二十世紀中國舞台上演的正是一場歷史的大悲劇」，「他留給後人的是這樣複雜而豐富的遺產，是一個難啃而又不能捨棄的果子」——「作為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烏托邦思想家與獨裁者，在他的思想與實踐中，天才的想像與嚴重的後果是交織在一起的」，¹²⁹「毛澤東那些避免西方工業文明弊端，尋找非西方的現代化道路的天才想像與試驗，是和他所重新建立起來的專制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嚴重後果膠合在一起的，而後者至今還影響着中國社會」，「如何將其剝離，是一個極其艱難的工作」。¹³⁰因此，在我看來，對毛澤東的遺產，首先應該進行科學的批判，然後才有可能從中剝離出某些合理的因素，發掘其內在價值。這就既不是「將其理想化，有意迴避甚至否認毛澤東遺產的負面及其嚴重後果」，同時又不是將「毛澤東的遺產看作是罪惡的堆砌而將其徹底遺忘與拋棄」。¹³¹在當今一切講「站隊」、非此即彼的學術界，

128 錢理群：〈科學總結20世紀中國經驗〉，《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頁21。

129 錢理群：〈2005年小結〉（2006年1月12日-15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268。

130 錢理群：〈2005年小結〉（2006年1月12日-15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269。

131 錢理群：〈2005年小結〉（2006年1月12日-15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

我這樣的學術立場自然是十分不合時宜的¹³²——不過，這已經是題外話了。我們還是拉回來繼續討論九十年代中國階級關係的變動吧。

4. 下崗工人群體

在毛澤東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實行的是雙重用工制度：對計劃招聘的工人（主要是來自城市的工人）實行固定工制度^{iv}，工人從進入企業之日就納入了單位體制，擁有完全的就業保障，不存在失業和下崗，當時就稱為「鐵飯碗」，這其實是毛澤東時代「工人」這個職業為人們所稱羨的經濟原因，而且工人同時也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計劃外，則對主要是從農村招聘的工人實行臨時工制度^v，他們的就業是沒有完全保障的，類似於後來的農民工。這典型地表現了毛澤東時代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如我們在第十講所說，在文化大革命中，這樣的不合理的用工制度是當時工人造反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到了八十年代，國有企業實行優化勞動組合^{vi}，被「優化下來」的工人就處於待崗狀態，城市工人的鐵飯碗從此被打破。到1992年，開始實行勞動市場改革，以及九十年代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vii}，不僅導致工人大量下崗，更進一步使他們進入失業者的行列。¹³³

這裡需要特別提出的，是1992年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作為1988年〈企業法〉的實施細則，據說這樣的「轉換經營機制」是為了提高全民所有制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但在當時（「六四」之後）強調黨的絕對領導、擴張黨幹部權力的背景下，加強企業經營自主權的結果，只是企業管理層權力的擴張，而企業工人卻逐步喪失了參與企業管理和勞動報酬確定的權利。¹³⁴這是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如研究者所說，管理層權力擴張

（1999-2008）》，頁268。

132 以上分析原以〈拒絕遺忘，科學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的第一步〉為題，後以〈科學總結二十世紀中國經驗〉為題，收錄於：《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頁21-34。但以上引文，凡引自《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一書者，在《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中則全部被刪去，後又補錄於〈2005年小結〉一文，收錄於：《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267-269。

133 以上材料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03。

134 游正林：《內部分化與流動——一家國有企業的二十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馮同慶：《中國工人的命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轉引自陸學藝

的結果，給管理層幹部利用權力轉移和侵吞國有資產提供了機會，結果導致許多國有企業瀕於破產，這就是所謂企業的「空殼化」。¹³⁵據統計，1995年全國30.2萬家國有企業中有20.2%空殼化。¹³⁶空殼化導致的企業破產，就必然導致大量工人下崗。這就意味著，管理層和相關權力者對國有資產的侵吞，是以大量工人的下崗為代價的。這也表明，九十年代權貴資本階層與下崗工人群是同時產生的，是「六四體制」下企業改革的產物。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viii}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新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當中有兩條相關我們討論的問題，一是「減員增效」^{ix}，一是「抓大放小」^x。「減員增效」的直接結果是職工的大規模下崗，下崗人數到2004年已經有3,000萬人之多。儘管這些下崗人員通常都會在體制外部門求得就業機會，但他們在毛澤東時代和改革開放初期所享有的種種經濟政治待遇，則在一夜之間喪失殆盡。而「抓大放小」則意味著國有小型企業和集體企業完全變成私營企業，其原有職工或成為私營企業的雇工、或下崗回家，他們原有的福利保障、經濟政治待遇也同樣完全喪失。「這樣，對工人而言，無論是減員增效的改革還是抓大放小的改革，都同樣意味着他們的經濟社會地位的下沉」。¹³⁷

1996年至1998年又完成了鄉鎮集體企業的改制，完全轉變為私營企業。原來的職工也同樣或者成為私營企業雇工、或者下崗，並同時失去了原企業的集體福利。¹³⁸

對下崗職工問題，我也有過這樣的分析：「『下崗職工』（這種稱呼本身就是中國特色：中國人總是能夠找到一些美妙的詞語。例如『下崗職工』之類，來掩蓋被剝奪勞動權利的血的事實）」，「人們經常用經濟結構的調整來解釋

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4-95。

135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5。

136 吳敬璉等：《國有經濟的戰略性改組》（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8），頁26-27。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5。

137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6。

138 以上有關下崗職工的材料均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4-96。

這一現象的必要性與合理性。當然不能否認這一個方面」，¹³⁹無論是「減員增效」，還是「抓大放小」，以至集體企業的私營化，從提高經濟效率、調整經濟結構上都有其客觀需要，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由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必須經歷的陣痛。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必然是各個利益群體的相互博弈、協商、妥協的過程。

問題是，當時(「六四」之後)的中國政治體制是「一切由黨說了算」，而黨和政府完全站在強勢群體(企業領導層)那邊，作為企業弱勢群體的工人，則被剝奪了發言權，也處於完全無組織的狀態，「六四」之後政府對民間組織的全面取締，對新聞媒體輿論的全面控制，都使得工人不可能通過任何其他途徑來發出自己的聲音。自身無力，又無外援，工人就只能任人宰割，根本沒有參與博弈的權利與可能，當然也不可能有任何協商與妥協，更不可能有任何反抗。這樣，工人不僅在下崗時只獲取了極其低廉的補償，而且在下崗後也沒有得到(或極少得到)社會福利的保障。而我們知道，中國的工人在1949年後的國家建設中，是貢獻很大、犧牲也很大的一個階級——如我們在前面所說，毛澤東時代實行的是低消費，高積累的富國強兵的工業化路線，這就意味著工人的勞動成果絕大部分都轉化為國家和企業財富，而自身只得到了與其付出完全不相稱的低微報酬，但毛澤東時代在工廠內部實行相對公平的職工福利、保險制度，這對工人的低工資而言多少是一個補償。但到九十年代「六四體制」下的企業改革，卻把凝聚著工人數十年血汗的企業財富轉移到少數管理層幹部手裡，他們之中許多人後來都成了權貴資本階層的成員，而工人原有的福利、保險卻被剝奪殆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九十年代的國有企業改革和鄉鎮企業改革實際上是對工人的一次掠奪，據有關部門1999年對北京市1,000名下崗職工的調查顯示，職工下崗前後個人收入平均下降61.15%。¹⁴⁰這就意味著，改革的利益為權貴資本階層所掠取，而改革的風險、代價則完全轉嫁到了工人身上。¹⁴¹

139 參看錢理群：〈酷暑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41。

140 轉引自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頁67。

141 參看錢理群：〈酷暑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41。

人們注意到，九十年代的中國國有企業、鄉鎮企業改革是在空前「平靜」的狀態下完成的，而在通常的情況下，經濟結構如此巨大的轉型，是會伴隨著激烈的利益博弈，以致社會動盪，但在中國「六四」之後極大強化的專制體制高壓下，在「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就是一切」的既定方針下，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這也可以說是「中國特色」吧。這就產生了兩個方面的效應：一方面，中國在政治成本、經濟成本與社會成本都極為低廉的情況下，完成了經濟結構的轉型，提高了經濟效率，這是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這個過程卻導致了中國社會急劇的兩極分化，並且極大地損害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出現了「下崗工人」群體，使得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地位迅速邊緣化，因而從根本上威脅、動搖著共和國的根基。現在，許多所謂「中國崛起」的辯護士著意強化前者，將其稱之為「中國奇蹟」，而有意忽視、掩飾後者，用經濟的發展遮蔽政治、社會的危機，這實際上是對歷史的一種著意遮蔽。

這裡還要指出一點：下崗工人群體也是代際繼承的。社會學家的調查表明，「有生產和運輸工人父親的人，從生產和運輸崗位上下崗待崗和失業待業的比例均很高(分別為42.1%和42.4%)，就職於同類崗位者的比例也較高(26.0%)」。¹⁴²這說明，工人的利益受損，直接影響到他們的子女：他們最容易下崗，即使上崗，也很難向上流動。這和前面提及的「官二代」、「富二代」聯繫起來，就顯示出中國的兩極分化有逐漸凝固化的趨勢，這是很值得關注的。

我還注意到一點：下崗工人中有一個特殊群體，即在文革後期和改革開放初期進入工廠的下鄉知識青年。當年，特別是文革後期，進工廠當工人，是許多知青最為嚮往的(另一理想出路是當兵)。文革結束後恢復了高考，許多知青和青工(主要是在政治資本和文化資本上享有優勢家庭的子女)都進入大學，因而抓住了向上流動的機會，成為此後改革的受益者；而仍留在工廠當工人的知青(他們中有許多人都出身於工人、農民和市民階層)卻最容易下崗、成了改革的利益受損者：1977年恢復高考，就這樣決定了一代許多人的命運。

142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05。

5. 「失地農民」群體

毛澤東時代宣稱「以工農聯盟為基礎」，農民——特別是農民中所謂「貧下中農」——被賦予很高的社會地位，但在城鄉二元對立結構下，農民主要是為國家工業化作出犧牲的對象，並且終生被束縛在土地上。而「後毛澤東時代」，鄧小平的改革是從農村改革入手，首先打破人民公社制度對農民的束縛，解放了農民，於是農民在隨後的農村經濟改革和農村工業化的快速發展中，獲得了較大利益，其經濟地位較為提高，因此農民也成為鄧小平改革的基本動力。

但中國農民和鄧小平改革的「蜜月期」只有八年(1978-1986)。從1987年開始，首先，農業經濟出現了明顯滑坡趨勢。統計資料表明，農產品的產量和價格同時下降，糧食在1999-2001這三年連續減產，農民收入趨於下降；與此同時，農民的負擔卻逐漸加重。據統計，1993年以來，農民所承受的各種負擔(稅)，普遍超過10%，一些地方甚至超過25%。¹⁴³還有這樣的統計：「至2000年，農民承擔的稅費總額達1,359億元，比1990年的469億元增長1.89倍。其中，農業稅收負擔增長4.28倍，村級提留增長0.62倍，鄉級統籌增長1.29倍，其他收入增長4.70倍，農民人均負擔增長2.01倍，農民稅費負擔佔農民收入的比重大約上升到7-12%之間」。¹⁴⁴

農民負擔的加重有多方面原因，除了前面討論的農民稅收與不合理收費的大幅增長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指導思想下，為加強對農村社會的控制而強化農村基層組織，同時就造成農村機構的日趨龐大。基層權力掌握者把他們的親屬和關係人大量轉為非農業人口，使得基層權力的極度擴張，形成「紅」(政府權力)、「黑」(黑社會)、「黃」(農村高利貸者)三位一體的，錯綜複雜、尾大不掉的關係網與利益群體，而且極大地增加了農民的負擔。

就在這一時期，國家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和服務投入的比重卻逐年下

143 以上材料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3-94。

144 趙雲旗：〈中國當代農民負擔問題研究(1949-2006)〉，《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100。

降。農民能夠分享的公共資源逐年減少。例如，「國家財政用於農業的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總額的比重，從1991年的10.26%降至2001年的7.71%。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極不健全，絕大多數農民沒有醫療保障和其他社會保障」。¹⁴⁵已經陷入經濟貧困的農民卻不得不承擔高額的教育支出和醫療衛生支出。這裡有這樣一組數字：「1999年，在全國5721.57萬在校初中生中，農村學生占57.2%，而農村初中教育經費占全國初中教育總經費的比例為47.8%，相差近10個百分點」。¹⁴⁶財政預算內，城市和農村初中生人均經費的比例為1.67：1。¹⁴⁷這就意味著經濟收入遠不如城市的農民卻要承受遠高於城市居民的教育負擔。受教育機會的分配更是不平等。「有資料顯示，2001年，與甘肅相比，北京本專各科高考錄取分數線低24～72分」。¹⁴⁸2000年實行「教育產業化」，大學本科收費漲幅高達50%。¹⁴⁹其最後結果，就是限制、堵塞了農民子弟向上流動的機會，「到2001年為止，中國農村小學生能夠考上大學的機會，只有15%」，「機率大約比全國平均水平低62%」。¹⁵⁰

對農民利益損害最大的，是對農民土地利益的抽汲。據統計，1996年到2001年，五年間全國耕地減少了4,335.5萬畝，這些土地都轉化為非農用地，並由此造成了大批「失地農民」。¹⁵¹和下崗工人一樣，他們也處於完全無權維護自己的利益，任人宰割的地位。有調查表明，「失地農民所得補償占土地市場價值的比例僅為10%～15%，集體得到了25%～30%，政府及其機構得到了60%～70%」。¹⁵²而且，「這些失地農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時，除了得到有限

145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4。

146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1。

147 吳剛：〈教育與社會再轉型期的關係形態〉，載丁鋼主編：《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第2輯（上海：教育科學出版社，2002）。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1。

148 吳剛：〈教育與社會再轉型期的關係形態〉，載丁鋼主編：《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第2輯。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1。

149 吳剛：〈教育與社會再轉型期的關係形態〉，載丁鋼主編：《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第2輯。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2。

150 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2。

151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4。

152 〈農民因土地的低價徵用將損失的3萬億走向〉，<http://www.ccrs.org.cn>，2003年9月11日。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4。

補償外，在就業和社會保障方面幾乎沒有從徵地一方得到任何保證和安排，淪落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遊民』，¹⁵³而且數量達5,000萬之多。¹⁵⁴這樣，每一次土地的徵收，都成了權力對農民的掠奪，政府和相關官員、土地開發商則是受益者，這同樣加劇了兩極分化。

失地農民群體的出現，典型地表現了中國農民和鄧小平改革關係的變化：從1987年開始，農民逐漸從改革的受益者變成利益受損者，這就從另一方面抽空、動搖了改革的基礎。

6. 農民工階層

按社會學家的界定，「農民工指擁有農業戶口^{xi}、被人雇用去從事非農活動的農村人口」。¹⁵⁵我們已經說過，毛澤東對農民的基本控制手段是將其束縛在土地上。毛澤東熟讀古書，他深知農民離開土地，成為「遊民」，最容易造成社會的動亂，並直接威脅統治的安全。因此，他建立了不允許城、鄉人口流動的「戶籍制度」^{xii}，即使是人民公社時期創辦社隊企業，一些農民從事非農勞動，但他們收入的也不是工資，而是工分^{xiii}，依然要回到生產隊參與分配，而且基本上是「離土不離鄉」^{xiv}。在一些城市工廠裡也有合同工^{xv}，但真正來自農村的工人不但數量有限，而且多少有些不合法，具有短期性與臨時性。到了大饑荒年代，政府更是嚴厲地打擊「盲流」，同時又在農村不斷打擊「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嚴禁農民從事非農業活動。如此，農民工在毛澤東時代是絕沒有發展空間的。

如我們一再說明，鄧小平的改革是從「解放農民」為突破口的，這裡自然也包括將農民從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而隨著改革開放，鄉鎮企業、外資經濟、個體經濟和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客觀上產生了從農村吸收勞動力的要求，這就為農民工的出現，創造了物質和經濟的條件。因此，八十年代初，在蘇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最早在深圳，就陸續有了農民工。到1989年「第一次出現『民工潮』」。¹⁵⁶在九十年代，農民工一方面成為「農村人口在目

153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4。

154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8。

155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07-308。

156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21。

前城鄉之間、區域之間不均衡發展中尋求相對均衡的不二選擇」，成為農民在農村日益衰敗情況下，維持和改善家庭生活的最佳途徑，因而吸引了越來越多最有文化的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以致有「有文化的人去務工，沒有文化的人去務農」的說法，據調查，一半以上的農民工具有初中文化教育水平，明顯高於農村人口的平均文化程度。¹⁵⁷另一方面，城市裡的各類工廠企業，也發現這些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農村廉價勞動力是他們降低勞動成本的最佳選擇。這裡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材料：在前面說到的「減員增效」的企業改革中，「很多企業裁減了學歷較高，但體能、技能和勤力性均較低的城鎮工人，由學歷較低，但體能、外部技能和勤力性均較高的農村戶籍者〔錢註：即農民工〕替代」¹⁵⁸這樣，兩個方面的需求，都促成了農民工階層的迅速發展與成熟，「僅僅進城務工的農民工的數量，既以從80年代中後期的三四千萬人，發展到2003年的9900萬人之眾」。¹⁵⁹之後幾年又有急速的發展，據說已經高達近兩億人。¹⁶⁰他們之中許多人已經長期紮根在城市、全家生活在城市，而以非農職業為生。城市的發展，以致居民的日常生活已經須與難離農民工的勞動和工作，農民工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產業工人階層的主要組成部分，被稱為「新工人階層」。¹⁶¹「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農民工占全國工人總數的50%以上，在產業工人中占57.5%，在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占37%」。¹⁶²

從一個意義上看，「農民工」的出現，是對毛澤東時代以來長期束縛於土地的農民的解放，並因此成為提高農民生活的基本手段。這裡有一組數字：「2000年，農業對農民純收入的負貢獻高達-112%，其中種植業的負貢獻為-229%，而〔出外打工的〕勞務報酬收入的正貢獻卻為167%」（括號內文

157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1。

158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04。

159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21。

160 據李昌平：〈九十年代三農政策基本錯誤〉（2008年1月6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三農中國網：http://www.snzg.cn/article/2008/0106/article_8748.html。

161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36。

162 以上材料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09。

字為錢所加)。¹⁶³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農民工支撐了中國的農民家庭與農村社會。同時農民工也從在城市打工中獲得了「流動資本」，即積累了經驗和閱歷，開闊了眼界，學到了知識，而且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向上流動的機會。¹⁶⁴這也就是農民工可以忍受在城市打工的一切痛苦，而絕不願意回鄉從事農業勞動的原因。

但農民工向上流動的機會又是極其有限的。這是因為農民工沒有從根本上擺脫毛澤東時代的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束縛，他們依然承受著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身分歧視。如研究者所說，「跟城鎮正式工人相比，他們獲得的是『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時』、『同工不同權』的『三同三不同』的地位」。¹⁶⁵據統計，「同樣是從事非農勞動，擁有非農戶口者平均工資是擁有農業戶口者的1.78倍」。¹⁶⁶農民工是納稅人，卻基本排斥於當地政府的服務範圍之外，「不能享受城鎮『低保』〔錢註：最低生活保障〕以及社會保險(如醫療保障、養老保障)」，¹⁶⁷子女也沒有享受平等教育的權利。他們更沒有基本的公民權，沒有組織權利，對政府決策沒有發言權，也沒有和企業對話的權利。¹⁶⁸和城市下崗工人、農村失地農民一樣，在鄧小平的「六四體制」下，中國的農民工也沒有自我保護的權利和能力，只能默默忍受政治、精神歧視和超經濟的剝削。

本來，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就需要不斷從農村轉移勞動力；而對農民「既解放，又束縛」的鄧小平體制造就的農民工階層，所提供的農村勞動力，既集中了農村最有活力的人才，具有相當的文化水平，卻又在城鄉二元對立結構的束縛下，處於絕對無權、可被任意宰割的地位。這樣，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就獲得了不需要付出多少代價、絕對廉價、勤奮，而又有效率的勞動力，而且基本上民間並不存在任何有組織的博弈和反抗。正

163 白南生、何宇鵬：〈回鄉，還是進城〉，載李培林主編：《農民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22。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4。

164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2。

165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6。

166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7。

167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6。

168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316-317。

是建立在「低人權」基礎上的「低成本」，成就了中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在九十年代的迅猛發展。這就造成了「中國奇觀」：對中國工業化、城市化作出最大貢獻和犧牲的農民工，卻成了這一發展的利益受損者，得益的依然是權貴資本階層。

以上分析所談到的新階層、新群體，都是毛澤東時代所沒有的，這些階層與群體在八十年代或沒有、或還處於萌芽狀態。其所引起的社會各階層地位、關係變化，與所導致的社會結構變化，都是前所未有的，既是我們所說的「六四體制」的產物，也表現了與「五七體制」不同的特點。這一切，主要發生在1992年到2001年這將近十年的時間內。為了敘述的方便，我們把它放在九十年代的時段內，它也確實構成了九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要內容。

(二) 一黨專政體制之群眾基礎、階級基礎的變動

人們很容易就注意到，毛澤東時代的「兩大剝削階級」和「兩大勞動階級」在鄧小平的「六四體制」下，發生根本性的深刻變化：毛澤東所要消滅的「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發展成了「私營企業主階層」與「知識分子精英階層」，並擁有了越來越多的公共資源，產生了越來越大的社會影響；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打擊的「黨內資產階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則終於以「權貴資本階層」的形態形成與成熟，並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導力量。另一方面，毛澤東視為依靠力量的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中則出現了「失地農民」、「下崗工人」兩個群體和具有農民身分的新工人——「農民工階層」，這都標示著工人、農民經濟、政治地位的邊緣化。同時也意味著，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其主要受益者是權貴資本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與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工人、農民雖然從中也有獲利（主要是生活的改善和一定的流動機會），但總體上卻是利益受損者。也因此，鄧小平的改革逐漸失去了工人和農民的支持。

這樣的變動，造成了鄧小平所堅持的「一黨專政體制」和「改革開放」的合法性與群眾基礎、階級基礎產生危機，必須尋找新的合法性基礎與相應的新的群眾基礎、階級基礎。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江澤民政權於2001年提出「三個代表」理論，就是擺脫危機的自覺努力。「三個代表」理論的核心是所謂「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理論；我曾在2001年寫有一篇文章對這一理論的實

際含義作了兩個方面的分析。一是以「生產力的發展」作為一黨專政和改革開放合法性的基礎，背後的理論基礎就是「經濟決定論」、「唯生產力論」，但同時又隱含一個「潛台詞」：「生產力發展了就有了統治秩序的穩定，生產力不發展就會喪失權力」¹⁶⁹——這樣把生產力的發展直接與權力聯繫起來，不顧長遠利益的破壞性發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其二，是強調「先進生產力」的三大要素：資本，管理與技術——這本身就是對中國共產黨奉為指導思想之馬克思主義勞動價值學說的一個背離；¹⁷⁰那麼，代表著三大要素的「資本投入者」（權貴資本階層和私營企業主階層），「管理投入者」（權貴資本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知識精英階層）和「技術投入者」（知識精英階層），就理所當然地成為「先進生產力」的代表。中國共產黨既以「先進生產力代表」自任，那麼，它就必然要代表這些「精英集團」也即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欲求，這樣，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六四體制」）就找到了支持與維護自己統治合法性的新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一旦如此，中國共產黨也就徹底剝離了它「維護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下層人民利益」的外衣，變成了一個主要維護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管理精英與技術精英」的上層階級利益的黨。通俗地說，共產黨由「窮人黨」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富人黨」；也就是說，以「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為標誌，「中國共產黨終於完成了自己的質變」。¹⁷¹

但「三個代表」理論的提出者又要掩蓋此代表基礎的質變，宣布自己是「全體人民利益的代表」。這就意味著，背離了工人、農民的利益，卻又不允許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下層人民成立代表自己利益的政黨和組織（獨立工會、農會），對於一切維護工人、農民利益的社會運動，都一律嚴禁與打壓；這說明，其所要維護與強化的還是一黨專政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體制。有些人看不到這一點，認為「三個代表」理論是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由一個革命

169 錢理群：〈酷夏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52。

170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學說不是沒有問題，主要是將勞動創造價值絕對化，以致唯一化；但如果因此走向另一個極端，忽略以致否定勞動、體力勞動者創造價值的作用和地位，就會出現分配不公的問題。

171 錢理群：〈酷夏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52。

黨向社會民主黨的轉化」，這就過於一廂情願了。還有人認為，中共的這一質變，有可能為實現他們的理想——經濟私有化和政治民主化——開闢道路，這同樣是一個單相思。新的利益集團是絕不會放棄一黨專制這一命根子的——他們深知自己統治基礎的薄弱與不得人心，若離開了武力鎮壓與言論自由的剝奪，它是一天也活不下去的。

於是，我們發現了鄧小平「六四體制」和毛澤東「五七體制」的內在一致性與延續性：他們都是以「一黨專政」為其核心與本質。然而，兩者一黨專政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卻發生了變化：在毛澤東時代，儘管事實上已經多方面損害了中國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大體上還是保留了較多的「窮人黨」傳統，它的主要支持者還是中國的工人與農民；但現在以「三個代表」思想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則是以新生的權貴資本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與知識分子精英階層，即所謂政治精英、經濟精英與技術、管理精英為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此種一黨專政的階級基礎與群眾基礎的變動，顯然是九十年代新階層的出現、階級關係與社會結構變動的反映，事實在先，因此執政黨執政理念、方式的變動是必然的結果。我也因而將正式提出以「三個代表」作為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2001年，作為「六四體制」最後定型的標誌，作為我們「九十年代」歷史敘述的結束。

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們在第十講裡曾經說到，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創造了一個不同於「十七年」的新的一黨專政模式；在2001年那篇文章裡，我又進一步總結出了「1949年以來半個多世紀曾經在中國實踐過的三大統治模式」。¹⁷²

所謂「十七年模式」(1949-1966年)，就是「以階級鬥爭為中心，以工人、農民與下層人民為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的一黨專政；所謂「文革模式」(1966-1976)，就是「以不斷革命為中心，拋棄黨的官僚和知識階層，由領袖的個人獨裁與群眾專政直接結合」的一黨專政；而現在的「三個代表」模式(醞釀於1977-1991年，形成於1992-2001年)，則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權貴資本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和知識精英階層，即政治、經濟、技術精英為階

172 錢理群：〈酷暑夏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56。

級基礎、群眾基礎」的一黨專政。統治的主要理念、路線和階級基礎、群眾基礎或有變化，但一黨專政的本質則一以貫之。¹⁷³

(三)「六四體制」的意識形態

我們說過，毛澤東的「五七體制」是旗幟鮮明地以「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為其意識形態，毛澤東在意識形態上從來都是充滿自信的；但他的繼承人，從鄧小平開始就陷入了意識形態的困境。鄧小平本人是沒有理論興趣的，他奉行的是實用主義，並公開承認「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¹⁷⁴他的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一條：堅持黨的領導。也就是說，他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其實只有一個內容，就是「黨的領導」。這樣，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非常明確地指向「維護黨的絕對領導」。毛澤東時代強調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多少還能說是一種信仰，因此對黨員、黨幹部，以至民眾和知識分子，還具有某種精神吸引力；但到了鄧小平時代，就完全成了精神控制的手段，出現了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機。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自稱「先進思想的代表」，其實就是要把自己打扮成「當代活的馬克思主義的代表」，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這同樣是維護黨的新領袖對全黨、全國思想控制的一個手段，實際要實行的，就是意識形態專政。於是，就有了要將「三個代表」理論「進入課堂，進入教材，進入學生頭腦」的要求，人們很容易就聯想起毛澤東時代的「洗腦」，這確實是一脈相承，但卻越來越無效了。

因此，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實際上進入了一個沒有思想、沒有理論、也沒有信仰的時代，而且是一種從上到下(從既得利益集團到普通百姓，知識分子與青年)的全民無信仰狀態，但是同時又依然把「主義」、「理論」、「思想」、「信仰」喊得震耳欲聾。這種「無信仰」和「表演性」，就構成了九十年代意識形態的重要特點。

當局真正倡導、並從上到下實際影響九十年代思想文化的，一是實用主

173 參看錢理群：〈酷暑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56。

174 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137。

義與實利主義，二是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失去了信仰、精神的追求、道德的約束，人的行為就只剩下了利益驅動。我們說過，毛澤東時代有「為了崇高的理想，什麼事都可以做」的「革命邏輯」，因而導致了許多濫殺無辜的罪行；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又盛行著「為了自己的利益，什麼事都可以做」的「趨利邏輯」，同樣導致了不擇手段地謀害他人生命的罪行。看似兩個極端，從精神至上到物欲橫流，但實際上都是對人性惡的誘發，抑善而揚惡，形成對國民精神的極大傷害。

主流意識形態通過對傳播媒體的控制與利用，和大眾文化相結合，也成為九十年代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個特點。這在用各種形式推銷享樂主義與消費主義文化這一點上，尤為突出。鋪天蓋地的廣告，各種類型的瘋狂演出，一方面粉飾太平，一方面將全民的注意力引向超前享受，無節制的現在歡樂，完全壓抑了人們的精神追求與思考力。正是這樣的瀰漫中國的世紀末的狂歡中，淹沒了被壓迫者、被侮辱者的痛苦的呻吟聲，也扼殺了清醒、獨立的批判聲音。當局的目的也正在於此。

此種「堅持主義」為表，「實利、實用與消費」為裡的主流意識形態，就構成了「六四體制」意識形態的基本內容與特點。¹⁷⁵

(四)「六四體制」的全球化背景

毛澤東時代一方面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實行「鎖國」政策，處於和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相對隔絕的狀態，僅留有限的貿易關係；但另一方面，在「國際主義」旗幟下，先是向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在中蘇論戰之後又試圖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如我們前面所說，毛澤東離世前，於1975年親自打開了中國向西方世界開放的大門，恢復和改善了中美關係。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這一遺產，使八十年代中國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得到了迅速的恢復與發展，特別是外資與合資企業第一次獲得合法地位——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們曾經說過，毛澤東早在1965年就提過「允許日本在中國辦工廠」的設想，但像八十年代這樣首先引入華人資本、進而引進西方資本並專門設置「特區」，

175 參看錢理群：〈酷夏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47-151。

卻是鄧小平的發展與創造。在「六四」以後，最初由於西方的經濟封鎖，外資引入一度受挫，但在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外資的流入就更具規模。外資企業與合資企業在中國工業發展總體格局中的比重越來越大、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事實上成為九十年代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或許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初，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瓦解，事實上實現了以西方資本主義經濟與民主體制為主體的全球政治、經濟的一體化，隨著跨國公司向全球所有地區、國家經濟的滲透，人類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而中國的執政者也越來越自覺地以「融入世界」作為執政的基本理念與追求，特別是2001年中國參加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更是大踏步地進入了全球化的過程。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的中國，一切國內問題都是全球問題，反過來說，一切全球問題也都都會成為中國問題。這是和毛澤東時代「關起門來，無法無天，自說自話，自行其事」完全不同的。儘管鄧小平及其後繼者堅持的還是中國式極權體制，但也必須具有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甚至不同於八十年代的新特點。九十年代以後的中國事情，只有將其置於全球化的背景，才能得到科學的認識和說明。這也是「六四體制」不同於「五七體制」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首先，是中國極權體制與西方世界的相依相存。由於中國黨和政府對工人、農民的公民權利的全面剝奪，就使得中國成為國際資本投資的最好場所、最佳的「世界工廠」：不但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而且沒有工會、農會的監督以及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制約，這在全世界是罕見的，外國資本家只要賄賂了中國官員，就可以肆無忌憚地殘酷剝削中國工人和農民，他們在國內絕不敢施行的野蠻管理卻可以在中國暢行無阻。我曾經說過：這真是自稱社會主義的中國的恥辱，中國共產黨當年依靠組織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反抗中外資本家的剝削與壓迫起家，現在卻利用手中的權力嚴禁工人、農民的反抗運動，主動為國內外資本家的超經濟剝削掃清道路，這正突出地表現了中國共產黨的變質，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當代中國的權貴資本階層是具有某種買辦性的。¹⁷⁶

176 參看錢理群：〈酷夏憂思錄〉（2001年8月27日-9月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143。

這也就必然形成了中國經濟和西方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一方面，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外資爭相湧入中國，成為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新的巨大推動力，以致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經完全離不開外國資本的投資；而廉價的中國商品也大量進入西方市場，並依靠以低人權為代價獲得的低成本，贏得了可觀利潤，同時也衝擊了西方的勞動市場。另一方面，中國廣大的市場，更對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的西方世界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跨國公司大量將投資轉移到中國，也同時影響了西方的勞動市場。也就是說，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和西方的經濟關係中，真正獲利者是中國權貴資本階層和西方跨國公司的壟斷資產階級，而中國自身與西方的勞動者都是利益受損者：中國工人雖然獲得了就業機會，但卻忍受著超經濟的剝削，西方企業的工人卻因此可能失去就業機會。

經濟上的相互依存，也必然形成政治上某種程度的相互依存。中國極權體制的穩定帶來中國社會的穩定，這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所需要的：美國要維護其世界領導地位，需要一個「穩定的中國」來支撐；而中國的極權體制也需要依靠西方，特別是美國來支撐，以作為自身穩定的外部條件。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相互承諾：中國公開宣布「絕不挑戰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美國則把中國視為「利益攸關方」。這也就在實際上宣布：東方最大的極權國家與西方最大的霸權（這意味著一種世界極權）國家，成了「利益攸關者」。這就意味著，中國得到了某種程度的世界默許和認可，中國也事實上參與了美國所領導的世界新格局、新秩序構建，並成為其重要成員。

當然，也還有相互衝突、制約的一面。在蘇聯、東歐瓦解，並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民主體制之後，中國成了為數不多的極權國家中的大國，面對這樣一個在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上完全不同於己因而難以信任、有著太多不確定因素、多少有些不可捉摸，但卻在經濟、軍事上日益強大的中國，西方政府、政黨、以致民眾普遍有一種不安全感，因而把希望寄託在中國體制的改變上，這自然不為中國極權體制所接受。這正是中國與西方在國家利益衝突背後，更為實質的意識形態與體制的衝突。但它其實又是服從於前面所分析的相互依存的根本利益，因此，雙方都把衝突掌握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從而形成一種相互制約。有意思的是，雙方分別打著「人權」牌（西方對中國政府）和「主權」牌（中國政府對西方政府與輿論），但只是打牌而已，並不真正

看重人權或主權，目的是最後取得「雙贏」。一些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民族主義者」看不清這一點，或希望依靠西方的支持爭取民主，或希望依靠中國政府維護國家、民族利益，都是一廂情願。西方和中國政府兩造之間的實際關係，就是一種相互利用與制約，具有極強的功利性，意識形態的分歧，是服從於黨和國家與資本利益的。我曾經說過，中國如果再發生「六四」那樣的反抗和鎮壓，西方世界是絕不可能再對中國政府實行全面制裁的；而中國政府在拒絕西方的民主、自由理念與體制的同時，又毫無障礙地接受了西方的物質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被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腐朽的意識形態」。

當然，也要看到，國際的制約也會使中國當局在對國內思想、文化的控制上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打開國門以後，就無法禁止國際範圍的思想、文化的交流與傳播，以及其反過來對中國國內的影響。在全球化的時代，極權統治者再也不可能「無法無天」、完全無視國內外的輿論監督。要回到毛澤東閉關自守時代那樣幾乎無縫隙的密封式控制，已經不可能了。

以上幾個方面：新的階層、利益群體的形成，一黨專政階級基礎的變化，意識形態的新特點，國際背景的新特點，就構成了「六四體制」的基本內涵與特點。這是在「六四」之後所建立的「穩定壓倒一切，發展壓倒一切」新秩序的產物，是全面貫徹「權威政治加市場經濟」的鄧小平路線（這是八十年代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路線的堅持與發展）的結果，它由鄧小平所創建，又在江澤民時代得到全面實現和完善，並對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六四體制」本身的有限性與脆弱性，它的每一個特點都會引發巨大的矛盾與危機：「新的階層、利益群體的出現」所造成的兩極分化，引發了日趨劇烈的階層矛盾和衝突；「一黨專政階級基礎的變化」，必然使黨成為階層矛盾、社會衝突的焦點，並喪失了原有的合法性；「以『主義』為表，實利主義、消費主義為裡的意識形態」不但使黨失去對內對外的思想凝聚力，而且引發了嚴重的道德危機與精神危機；「國際背景的新特點」則使中國的極權統治處於複雜的國際關係之中，受到多方面的制約。所有這一切，都會極大地削弱一黨專政的統治力量，體制內部也非鐵板一塊，存在許多縫隙，民間思想與力量也就獲得了某些發展空間，「五七體制」下的「無法無天」，

為所欲為」的毛澤東時代已經很難再現，從「五七體制」到「六四體制」，其總體發展趨勢，是一個一黨專政統治逐漸弱化，制約、反抗力量逐漸增長的過程。歷史畢竟在發展與前進。

五、閃光一現：1998年的「北京之春」

這一講已經拖得很長，但我們還是要講一個發生在這段歷史後期的「閃光一現」的事件——正是因為存在著刻意遺忘和遮蔽，我們就應該將其留存於歷史敘述裡，那怕只是簡要的一筆。

人們很容易就注意到，「六四體制」構建、完善的十多年間(1989-2001)，也正是中國民間社會運動被打壓而沉寂時期，這兩者之間顯然存在內在的聯繫。但沉寂中仍有微響——如毛澤東時代經常說的那樣，「人還在，心不死」，民間社會運動之根深藏在人心、民心之中，一有機會，就會破土而出。前面提到北京大學百年校慶的民間紀念活動，雖然還構不成我們所討論的民間社會運動，但「死水微瀾」裡還是顯示了人心所向——追求民主、自由，要求憲法賦予的權利的火種隨時都可能復燃。

1997年10月，中國政府簽署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承諾將進一步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我們在前一講已有介紹的1978-1980年社會民主運動的主要骨幹、時已釋放出獄的徐文立敏銳地抓住這一時機，和另一位骨幹分子秦永敏(1953-)聯合，發表了〈告全國工人同胞書〉，號召成立自由的獨立工會(中共已簽署的前一個公約中有相應的條款)，以捍衛中國工人，尤其是下崗工人的利益，由此打破了國內民間社會民主運動近十年的沉寂，引起各方震動。

這裡，有三點頗值得注意。首先，號召成立「自由的獨立工會」，這是對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自覺承接和呼應。我曾在一篇題為〈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的文章裡指出，「爭取言論、出版、結社自由，是貫穿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的一根紅線，是運動的基本訴求，被認為是迫在眉睫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關鍵性環節和突破口」，特別是繼「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之後，北京知識分子、工人也成立了「自治聯合會籌備委員會」，運動後期還成立了「首都各屆聯合會」，「群眾自治組織的出現，是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中必

須邁出的關鍵性的一步」。¹⁷⁷而這也正是當局所最害怕的：「六四」最後的大屠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擔心中國出現波蘭團結工會那樣的各階層群眾自由、獨立的組織。十年之後，「成立自由的獨立工會」任務被再次提出，正是表明，這是中國社會民主化進程中繞不過去的歷史課題，不管阻力多大，它總會不斷地提出。其二，1997年重提成立獨立工會，又是新的時代要求：它是我們前面所討論的，九十年代出現大批下崗工人，這一階級關係的新變動的直接反應，這是工人階級在「六四體制」中被全面邊緣化的情勢下，組織起來維護自己利益的自覺努力，意義自然十分重大。其三，時機選擇在中國政府簽署〈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這也是我們前面討論到的「九十年代中國問題成為國際問題一部分」這一時代新特點的反映。

1997年末，徐文立和秦永敏又進一步採取行動，分別以《人權觀察》和《公民論壇》的名義，向當局要求註冊為合法工會。在要求未果的情況下，於1998年初，由秦永敏出面編發非正式的《人權觀察》，不定期地向國內外報導中國大陸最新人權和民間社會民主運動的信息。與此同時，徐文立還利用在大陸剛剛興起的互聯網新技術，開闢了「空中民主牆」——這是以後在二十一世紀得到進一步發展的網絡民主運動的先聲，是一個偉大的開創。正是「網絡民主牆」，使長期僵滯的大陸民間社會民主運動得以激活，各自分散的資源得以重組，並日趨轉向活躍。北京、四川、貴州、河南、湖北、湖南、黑龍江、吉林、遼寧、山東、上海、浙江等12個省、市紛紛成立各種民間組織、開展不同形式的活動。徐文立又因勢利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提出了「公開，理性，和平即非理性」的鬥爭方略，以半公開的方式，極力推動大陸民間社會民主運動的統合與發展——這就是1998年中國大陸悄然升溫的民主之春，又稱為「北京之春」。¹⁷⁸

1998年6月，徐文立被國內55名民間社會民主運動參與者推舉為國內政治反動派代表，要求與準備來華訪問的美國克林頓(Bill Clinton，又譯柯林頓，1946-，美國)總統會面。7月，浙江發生了震動國內外的「七一〇」組黨

177 錢理群：〈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2009年在大陸知識分子紀念「六四」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宣讀，未公開發表。

178 參看金楓：〈1998：北京之春——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被鎮壓紀實〉，《北京之春》1999年第4期。

案，王有才(1966-，北京大學畢業生，天安門運動的積極參加者)等民間社會民主運動骨幹，因申請組織中國民主黨浙江省分部籌委會而悉數被捕，一時輿論譁然，科學史家許良英(1920-)、胡耀邦祕書林牧(1927-2006)等著名知識分子和黨內民主派代表發表了〈呼籲釋放王有才的公開信〉。10月，徐文立與京津地區的民間民主運動骨幹又發起組織中國民主黨京津分部，並出任分部主席。前述12個省、市也紛紛成立民主黨分部——此種全國範圍的公開「組黨運動」，是1949年建國以來第一次，也是對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體制的正面衝擊和公開挑戰。

中共當局自然絕對不能容忍。11月29日，徐文立再次被捕；11月30日，秦永敏也遭逮捕。12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李鵬(1928-)文章，公開表示「絕不允許出現反對黨」，「旨在導向多黨制，而且動搖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是不允許的」。¹⁷⁹12月18日，江澤民在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週年大會^{xvi}上，宣布要「始終警惕國際國內敵對勢力的滲透、顛覆和分裂活動」，「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加以反對，並堅決把它們消滅在萌芽狀態」。¹⁸⁰

但反抗並沒有因此停息。1998年12月27日上午，在杭州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王有才時，數百名群眾圍觀抗議，包括浙江大學、寧波大學學生，杭州工人、市民、下崗人員、全國各地的民主黨成員。一位名叫任兵(生平不詳)的下崗女工還舉著「抗議」的橫標。¹⁸¹事實上，在1998年對民主黨公開彈壓之後，民間組黨建社的努力，始終沒有停息過，只是總是很快就遭秘密逮捕，難於為外界所知罷了。

這都是歷史，是中國民間民主運動中不可抹殺的一頁。

江澤民政權因此而如驚弓之鳥，又於1999年發動了對「法輪功」的鎮壓。

179 轉引自金楓：〈1998：北京之春——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被鎮壓紀實〉，《北京之春》1999年第4期。

180 江澤民：〈二十年來我們黨的主要歷史經驗〉(1998年12月18日)，《江澤明文選》第2卷，頁260。

181 以上關於「北京之春」與「組黨運動」的敘述均轉引自杜應國自傳《奔突的地火——一個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以及金楓：〈1998：北京之春——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被鎮壓紀實〉。

法輪功本來並不是民間反抗運動，而是半宗教性質的民間組織¹⁸²。它的引人注目之處在於對底層民眾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在我看來，主要有三個方面，而且都與前述九十年代社會結構的大變動直接相關。首先是大批城市下崗工人組成了龐大的城市貧困市民群，他們因下崗而失去了單位的保護，不享受任何社會福利，看病困難成了一個有關基本生存的大問題。正是在這一點上，法輪功的健身功能，對於醫藥無門的底層民眾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其二，法輪功還為其信徒提供了相互往來、交流的機會，這正是被排斥在單位、社會之外的下崗職工與無人過問的老年人所渴望的。其三，法輪功提倡的「真、善、忍」三大理念，更是為陷入極度的物質貧困與精神貧困的底層民眾提供了精神的支撐：「真」與「善」堅守了人性的基本底線，對前面講到的物欲橫流的世風是一個有力的抵制；而「忍」字則道盡了人世的艱辛，最容易引起無權無勢的普通民眾的共鳴。我曾經說過，我們這些自稱的啟蒙知識分子實際上並沒有為我們眼中的啟蒙對象提供任何精神的力量，倒是法輪功的「三字訣」以老百姓最能接受的方式讓他們獲得了精神的庇護。因此，法輪功及類似的各種氣功組織，在九十年代盛行於中國民間社會，並有逐漸向中、上層社會滲透的趨勢，絕不是偶然的，它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反映了我們所說的「六四體制」所造成的底層民眾的生存、精神困境與掙扎，是九十年代典型的民間思想、文化現象。它和同時期以及以後不斷發展的民間宗教，都很值得我們注意。

法輪功從眾多的氣功組織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是它的組織性。有意思的是，後來在所謂「清查法輪功」運動中，人們才發現，法輪功的各級領導層的成員和骨幹，有許多是中共的黨幹部和黨員，他們是按照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方式來組織法輪功的，結果如江澤民所描述：「人不知、鬼不曉，突然在黨和國家權力中心的大門口聚集了一萬多人，圍了整整一天。其組織紀律之嚴密，信息傳遞之迅速，實屬罕見」。¹⁸³而江澤民尤感震驚的是，「對這種已形成為全國性組織，涉及相當多黨員、幹部、知識分子、軍人和工人、農民的

182 對法輪功組織的評價，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我個人對其氣功理念與某些行為方式，都持保留態度。這裡僅是將其作為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政治、思想、文化現象來作討論。

183 江澤民：〈一個新的信號〉（1999年4月25日），《江澤明文選》第2卷，頁319。

社會群體，卻遲遲沒有引起我們的警覺」。¹⁸⁴ 這樣具有巨大組織力、而黨又不能控制的民間組織，使得江澤民政權要視為心腹之患而必欲滅之，是其堅持一黨專政邏輯的必然結果。1999年夏天所發動的大規模、不擇手段的對法輪功的血腥鎮壓，是「六四體制」本質的大暴露：它表明，一黨專政的體制，為了使黨成為「唯一者」，是隨時準備對民眾行使「鎮壓之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四」之後，1989-1999年這十年苦心經營而形成的新既得利益群體，特別是權貴資本階層，依附於他們的各級官僚，以及為數並不少的知識分子精英階層，都積極地參與「清查法輪功」這場實際上將矛頭指向以底層民眾（特別是下崗職工）為主體的城鄉貧民群體的大鎮壓。

歷史的辯證法在於，江澤民政權鎮壓法輪功，對底層民眾如此下手，不僅使其民心喪盡，更將法輪功成員及其同情者「逼上梁山」：本來並不具有政治色彩的法輪功組織，從此走上了政治抗爭的道路，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民間反抗運動，這大概是鎮壓者所未曾料及的。

本來，在一個世紀就要結束、新的世紀即將到來的時候，是實行民族和解的大好時機。但1998年對組織獨立工會、政黨運動的鎮壓，1999年對法輪功的大清洗，卻使得九十年代的中國歷史、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結束在一片殺伐之聲中，這大概也是一切善良的人們料所未及的。

編註

- i 南巡講話：指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鄧小平視察武昌、深圳、珠海、廣州、上海時發表的重要談話，當時稱「南巡講話」，後官方改稱「視察南方談話」。
- ii 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從1953年開始，毛澤東宣布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即開始對農業、手工業的個體經濟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將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私營經濟改造為公私合營經濟或國有經濟，1956年宣布改造基本完成。
- iii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於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第一次會議中通過，該會議1988年3月25日-4月13日於北京召開。
- iv 固定工制度：固定工指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全民所有制和城鎮集體所有制單位，在國家勞動計劃之內，經由各級勞動人事部門正式分配、安排和吸收錄用的職工。固定工不規定

184 江澤民：〈一個新的信號〉（1999年4月25日），《江澤民文選》第2卷，頁320。

- 工作年限，一般不得辭退，一分配即定終身，並享有國家法令所給的福利待遇。
- v 臨時工制度：「臨時工」是和「固定工」相對的，大多來自農村，沒有終身就業的保障，也不能享受國家規定的福利待遇。
 - vi 優化勞動組合：此優化勞動理論講求勞動力的配置合理化，以便提高勞動效率。其實行的結果，導致大量工人「下崗」。
 - vii 全員勞動合同制：1986年7月公布〈國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規定〉，其中招用的職工稱為「合同制工人」，亦是在國家勞動工資計劃指標內招用的常年性工人，他們與固定工享受同等的勞動、工作、學習、社會福利等待遇。但自九十年代實行了全員勞動合同制後，固定工和勞動合同制工人一樣，都必須與受雇企業簽定勞動合約。
 - viii 中共十四屆五中全會：中國共產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1995年9月25日-28日於北京召開。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建議1996年起展開「九五」計劃及2010年遠景目標。
 - ix 減員增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的有關研究表明，大型國有企業的虧損額最大，但其虧損面最小，虧損率最低；反之，中小型企業的虧損額較小，但虧損面大，虧損率高，於是政府進行「放大抓小」的改革，意即「搞好大型企業，放活小型企業」。搞好大型企業的措施就包括「增員減效」，「增員減效」最後造成大規模的下崗。所謂放活小型企業則是要「採取改組、聯合、兼併、股份合作制、租賃、承包經營和出售等形式」，意即改革小型企業的產權結構和經營機制，使其產生新的活力。
 - x 抓大放小：指公有產權的轉讓，把原來的國有小型企業以及集體企業改變成非公有制企業，於九十年代啟動。被改制企業的職工，或被買主接收成為私營企業雇員，或下崗成為失業人口。
 - xi 農業戶口：起源於計劃經濟時期，當時將戶口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戶口。農業戶口指靠自己生產口糧的農業人口。
 - xii 戶籍制度：其特點為根據地域和家庭成員關係，將戶籍屬性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1958年1月9日，經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一套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當中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大類。個人試圖從農村遷移到城鎮地區從事非農業工作，皆必須向相關部門申請，而至省外工作則需有六種許可證。離開本人戶口所在地的人，沒有糧食配額、單位住房、公費醫療。
 - xiii 工分：工分起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農村建立的農業生產互助組，普遍採用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和農村人民公社中。人民公社時期，農業生產一般由生產隊組織，社員以生產隊為勞動單位進行勞動並取得報酬。「工分制」以潛在勞動能力為依據，根據性別、年齡為每一個社員指定一個工分標準，按工作天數記錄工分數，年底根據每個人的工分數進行分配。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漸廢止農村的評工記分。
 - xiv 離土不離鄉：為因應農民無法伴隨工業化的過程進入城市的困難，改由鼓勵農民在農田上發展工業，提出「離土不離鄉」的模式。
 - xv 合同工：自1956年來出現於中國的一種類似臨時工的用工形式，人們普遍把季節工、臨時工統稱為「合同工」。其身分多半為外來農村戶口，稱為「農民合同工」，而非「農民合同制

工人」。外地農民合同工雖享有所簽合同中的工資待遇，但其身為農村戶口，沒有用工檔案，不適用於離退休待遇規定，而他們在都市工作時用的是「暫住證」而不是常住戶口，因此不能享有失業保險、退休養老保險、住房基金等待遇福利，雇用企業也無義務為合同工繳納失業保險費、退休養老保險費和住房基金。在台灣語境中指「契約工」。

xvi 紀念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二十週年大會：2008年11月7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第十四講

後毛澤東時代(下)

2000-2009

| 2010年8月補寫 |

我們的敘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的最初十年，這是剛剛發生的事，也是正在發生的事情，因缺乏時間的距離，為歷史考察帶來一定的困難。因此，我們的討論也將更加簡略，只能大體提出幾個問題。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正、負面效應

如前所說，鄧小平的改革起始於1978年，1992年以後則進入一個全面實施的新階段，到了2000年以後，就逐漸顯示出其全部後果，無論是正面效應、還是負面效應，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時其內在矛盾與危機也都暴露無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也是完成了一個歷史過程。

於是，我們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數字，表明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

首先是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1978-2008年中國GDP平均增速超過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為3.0%。中國這一時期的增速不僅明顯高於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韓國經濟起飛階段平均增速（分別為9.2%和8.5%）還高一些。2008年中國GDP總量達到30.07萬億元人民幣，升至世界第三。內部產業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所占比例分別為11.3%、48.6%、40.1%，數據反映出中國已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¹

經濟的發展，導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國城鎮居民平

1 參見趙德馨：〈新中國六十年經濟發展的路徑、成就與經驗〉，《百年潮》2009年第10期，頁19-20。

均收入從400元(人民幣)上升到10,000餘元(人民幣),增加了25倍;中國農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幣)提高到2800元(人民幣),增長近20倍。²1979-2003年,全國居民消費水平平均增長7%;按現行匯率計算,2003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會」目標邁出了決定性的一步。³農村的極端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億5,000萬人減少到2003年底的2,900萬人,25年裡,農村貧困人口減少了88.4%,貧困發生率下降到3%左右,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基本解決。⁴

經濟的發展,也引發了社會、文化、教育、衛生……事業的全面發展。據溫家寶(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全國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此外,覆蓋城鄉、功能比較完善的疾病預防控制體系,以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醫療救治體系,已經基本建成。⁵

同樣不可否認的是思想壟斷與社會控制的鬆動,社會流動機制的初步形成,給人們帶來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斷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會的基本穩定。⁶

由此而形成了所謂「中國的崛起」。在2008年前後發生世界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的迅速復甦,更是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可以說,中國已經完全獨立於世界之林,成為世界正在發展中的多元化結構的主要成員。

1997年香港、1999年澳門的相繼回歸,此後十年的穩定發展,以及2008年國民黨恢復台灣的執政地位以後,兩岸關係的改善與和平發展的前景,都可以視為中國統一大業的重大進展。

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曾經說過,歷史賦予毛澤東及其後繼者的歷史使命,是實現國家的統一、獨立,解決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應該說,直到2009年共和國成立60年,這樣的三大歷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這60年,是上

2 轉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頁742。

3 據溫家寶2004年5月26日在世界銀行全球扶貧大會上的講話。轉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頁742。

4 據國家財政部提供的資料。轉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頁744。

5 溫家寶2007年政府工作報告，轉引自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頁744。

6 據統計，1949-1979年，從前職到現職，實現向上升遷的流動率只有7.4%；1980-1989年，向上升遷的流動率提高到18.2%；1990-2001年，進一步提高到30.5%。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導言頁13。

接100年努力奮鬥的結果，最後30年的改革、開放更是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這都是必須肯定的歷史進步。

同樣必須正視的是，這樣的進步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而取得的，更同時帶來了巨大的問題和矛盾，並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危機。

首先是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社會不公。這是我們前一講所討論的「六四體制」必然帶來的後果。據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報告，中國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數據「基尼係數」¹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為0.458；⁷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⁸——所謂「基尼係數」，是義大利經濟學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數據之數值介於0到1之間。如果基尼係數在0，表示財富在全社會平均分配；如果基尼係數在1，則表示全社會財富被一個人占有。按照國際經驗，基尼係數小於0.3屬於相對平均，在0.3與0.4之間屬於中度不平等，超過0.4，則不平等程度偏大。

據財政部2009年公布的數據，全國10%的家庭的財產占城市居民全部財產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財產總額，僅是全部居民財產的1.4%。⁹七個壟斷行業職工不到全國當年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占當年職工工資總額的55%。¹⁰

根據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專家的調查統計研究，目前全國城鎮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約31倍，城鄉合計，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約55倍。¹¹

還有這樣的統計數據：「最低工資人均GTP的比值，世界平均為58%（國際勞工組織《世界工資報告08 / 09》的數據是60%，見該報告第35

7 轉引自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頁22。

8 轉引自馬慶鈺：〈市場經濟呼喚政治改革〉，《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15。

9 人民網北京2009年12月9日電。轉引自馬慶鈺：〈市場經濟呼喚政治改革〉，《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15。

10 何偉：〈「國進民退」五定位〉，《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11月25日。轉引自馬慶鈺：〈市場經濟呼喚政治改革〉，《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15。

11 見王小魯：〈我國的灰色收入與居民收入差距〉，《比較》總31期，2007年7月。轉引自馬慶鈺：〈市場經濟呼喚政治改革〉，《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15。

頁)，〔……〕中國是25%」；¹²「經合組織24國最低工資與平均工資的比值平均50%，中國平均工資按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21%」；¹³「中國最低年收入為6,120元，不到世界平均值的15%，排在158位」。¹⁴這說明，中國經濟發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這兩個「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經濟大發展、社會財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卻存在著這樣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們的精神承受力，而且還有逐漸擴大的趨勢。

如研究者所說，「更重要的是因壟斷和特權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沒有說得過去的理由」（括號內文字為錢所加），實際上是一種仰仗權力的掠奪，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這就使「大眾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係數的國家更高」。¹⁵我還要補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會不公，發生在自稱「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上高唱「社會平等，公平和正義」的中國，而實際生活中卻高度貧富不均，兩者之間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會的不公還表現在公共品供給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澤東時代就存在著這樣的問題：黨的幹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眾，特別是農民，則享受較少的或基本上沒有社會福利，這就是過去我們通常說的「特權」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但在毛澤東時代，這樣的特權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澤東的辦法是不斷發動群眾運動，打破能享受特權的幹部隊伍的穩定性），而且毛澤東時代所實行的單位所有制，對普通幹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儘管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但至少會造成相對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說，鄧小平的單一經濟改革所造成的失地農民群、下崗工人群，大

12 劉植榮：〈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與借鑑〉（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劉植榮博客——飛翔的鐵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0gufv.html。

13 劉植榮：〈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與借鑑〉（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劉植榮博客——飛翔的鐵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0gufv.html。

14 劉植榮：〈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與借鑑〉（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劉植榮博客——飛翔的鐵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0gufv.html。

15 秦暉：〈「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本文原刊載於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電子報第1254期。但該網站上目前本文刊載不全，故轉引學術批評網，2011年7月27日取自，學術批評網：<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12&ctype=1002>。

約有7,000萬人，還有近億的農民工階層，不僅經濟收入極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會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務部門放棄服務責任，利用公共資源大肆『創收』，同時並憑借壟斷權力排除來自民間的競爭」，這樣，「『二次分配』不是緩解了，而是加劇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¹⁶於是，又有了這樣的統計數據：中國公務員的工資是最低工資的6倍，世界平均為2倍；中國國企高管工資是最低工資的98倍，世界平均為5倍。¹⁷這些為經濟高速發展曾經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貢獻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農民工，恰恰不能享受社會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這不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對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極大的損傷。

與此相聯繫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據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政策動向課題組」2006年公布的數據，該年全國各級國家機關的公款招待費、公務用車費、公款出國考察費超過一萬億元人民幣，占年度財政支出的30%。而這個比例在日本僅是2.4%，英國為4.1%，印度為6.1%，俄羅斯為8.2%，美國為9.9%。¹⁸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與公共服務支出的匱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僅滋長了政府的官僚化與腐敗，也彰顯了社會的不公。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城鄉之間、東部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距。1990-2003年，城鄉居民收入的絕對額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也擴大了三倍以上；據2002年統計，全國總體收入差距的2/5以上來自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貢獻率從7.5%提升到8.7%。此外，還有城鎮中行業壟斷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業間職工平均工資的基尼係數比1990年高出86%。¹⁹據統計，

16 參看秦暉：〈「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本文原刊載於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電子報第1254期。但該網站上目前本文刊載不全，故轉引學術批評網，2011年7月27日取自，學術批評網：<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12&type=1002>。

17 劉植榮：〈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與借鑑〉（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劉植榮博客——飛翔的鐵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0gufv.html。

18 轉引自馬慶鈺：〈市場經濟呼喚政治改革〉，《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16。

19 參見李實、岳希明：〈中國個人收入的最新變化〉，熊景明、關信基編：《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香港：香港中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頁382、386-387、389。

中國行業之間的工資差高達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²⁰——此種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確實已經到了臨界的水準上，無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機。

其次，在「發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導下，經濟的高速發展又是以資源的大浪費、生態的大破壞和環境的大污染為代價的。這又是一組驚心動魄的數字：「全國三分之一的地區存在嚴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十個城市中至少有七個在中國」；母親河黃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國自己制定的品質標準」；「60%人口的飲用水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²¹

這就意味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以犧牲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利益與子孫後代的長遠利益為代價的，是一種既吃老祖宗又遺患後人的暴發戶、敗家子的發展經濟的方式，它在本質上，和我們說過的毛澤東時代一樣，都是一種破壞性的發展，這本身也同樣構成了對改革合理性的極大損傷。

其三，如前所說，支持鄧小平經濟改革的意識形態，實質上是一種實利主義、實用主義與消費主義。因此，經濟的高速發展，帶來的是物欲橫流、道德底線突破、權貴資本階層腐敗，腐蝕了整個社會，形成精神的糜爛和社會風氣的敗壞。

而教育市場化，即所謂「教育產業化」的結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敗，這樣的腐敗又直接、間接地腐蝕了受教育者的心靈，這是真正的貽害子孫後代；同時又進一步擴大了社會的不公，2000年實行教育產業化以後，大學本科²²收費比1999年漲幅高達50%左右，一些重點學校的收費在6,000元(人民幣)以上。²³而當年官方統計的農村人均純收入僅為2,210元(人民幣)。²⁴「到

20 「根據2009年5月5日《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中國行業之間工資差達到了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劉植榮：〈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與借鑑〉(2010年3月3日)，2011年7月27日取自，劉植榮博客——飛翔的鐵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0gufv.html。

21 轉引自陳智宏：〈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責任和遵守行為：一個分析框架〉，熊景明、關信基編：《中外名學者論21世紀初的中國》，頁331。

22 即台灣的大學部。

23 吳剛：〈教育與社會在轉型期的關係形態〉，載丁綱主編：《中國教育：研究與評論》第2輯。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2。

24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2。

2001年為止，中國農村小學生能夠考上大學的機會，只有15%，²⁵ 據研究者估算，此機率比全國平均水平低62%。²⁶

同時發生的，還有醫藥衛生的全面市場化，導致「上學難，看病難，住房難」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民眾的三大困境，被稱為「三座大山」。²⁷ 其背後原因是中央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權力和利益的極度擴張，使本來應該是公共服務的社會領域(如教育、醫療、社會保障和住房)，現在都紛紛市場化，成為權力資本獲取暴富的領域。這就意味著，當社會改革的主導權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團手裡，所謂「社會改革」就必然成為對底層民眾利益的新的損害，導致老百姓不堪重負，怨聲載道，同樣對改革的合理性構成了極大損傷。

這可以說是「中國奇蹟」的另一面：儘管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識卻迅速喪失，如一位社會學家所說，連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都在急劇流失。²⁸ 改革的獲利者早已喪失了改革的動力，更確切地說，他們已經把改革變成是新的獲利機會，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著什麼旗號，都會是對民眾利益新的損害。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說的「無改革，高發展和不穩定」的局面：「改革停滯不前，發展速度加快，社會則變得越來越不穩定」。²⁹

這同時意味著，改革的受損者(更準確地說，是「受損大於所得」者)越來越意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隨著改革開放，必然帶來民主權利意識的覺醒，這是不以執政者的意志為轉移的；而且隨著官方一再失信於民，民眾最終意識到：必須自己起來爭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說，在「六四體制」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新的階層與利益群體形成的時期，到了二十一世紀，社會各階

25 〈警惕農村輟學率上升〉，《中國教育報》2001年6月6日。轉引自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2。

26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頁92。

27 「三座大山」一詞，來源於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當時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推翻這三座大山就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充足的理由。現在，將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出現的新的社會不平等造成的民眾生活的三大困境，稱為「三座大山」顯然含有諷刺的意味。

28 參看孫立平：〈中國正在加速走向社會潰敗〉(2010年4月1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中華網：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2713/17/51/6_1.html。

29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路徑及其走向〉，《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3。

層，各個利益群體就更為自覺地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於是，就形成了紛繁複雜的各種社會思潮與社會運動，執政者也對其作出了自己的回應與調整。下面，我們將作四個方面的討論。

二、維權運動、網上監督、非政府組織：三大民間力量的興起

前一講最後談到，1998年「北京之春」組建獨立工會和組黨的努力，遭到了鎮壓，這也就意味著在中國大陸現行專制體制下，民間抵抗運動很難有發展的空間；隨後對法輪功的鎮壓，也表明一切獨立於黨之外的組織，那怕是法輪功這樣的半宗教組織，也都不允許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說，隨著改革共識的喪失，底層民眾表達自身利益訴求和維護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強烈，也就是說，在上層既得利益階層逐漸喪失了改革動力的時候，底層民眾參與改革的熱情卻在增長，這也就必然要突破鄧小平自上而下的、黨所控制且以維護一黨專政為指歸的改革，轉而推動自下而上、民眾參與且以維護民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利益為指歸的改革運動。但這樣的民間改革運動不可能採取傳統的公開、有組織的反抗形式，而必須尋找新的組織方式、行動方式，以至新的思維、新的理念。也就是說，我們一直關注的中國現代民間思潮、社會運動在二十一世紀必然具有一種新的形態。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短短十年間，就有三大民間力量興起。

首先是以下崗工人、失地農民、城市貧民、農民工為主體的民間維權運動ⁱⁱ。這可以說是「六四體制」自身產生的對立物。其主要表現形式，是這些年人們經常提及的所謂「群體性事件」ⁱⁱⁱ。據統計，2007年全國群體性事件已經超過了八萬起，平均每六分鐘發生一起，比14年前的1993年增加了十倍。2008年、2009年，這樣的上升的趨勢還在繼續。³⁰群體性事件主要有以下特點：（1）大都是不同階層與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弱勢群體自身利益受到傷害而奮起的反抗，因此，我們以「維權運動」命名。其中有：國有企業下崗工人的維權，國有企業私營化過程中工人利益受損引發的反抗，農民工因

30 于建嶸：〈中國騷亂事件和管治危機〉（2007年11月5日發布），2011年5月23日。取自，大道網：http://www.methodfirst.cn/cl_in.html?id=129。

拖欠工資等原因引發的維權，農民和農村強勢群體（鄉村幹部、私營企業主、糧食收購站、工商稅務部門、派出所）的直接對抗，強制拆遷、徵地、環境污染、公共衛生事件等引發的維權……等。（2）這樣的維權抗爭，最初是利益受損者的自發反抗，以後就逐漸有知識分子支持與參與，發展到後來，有些突發事件聚集參與者往往是「無直接利益衝突者」，成為發洩社會不滿的渠道與方式。（3）維權抗爭主要發生在利益衝突的不同階層與群體之間，但由於地方政府往往站在強勢群體一邊，並為維護穩定而不惜動用武力，這就使維權的群體事件越來越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成為官與民的衝突。（4）由於地方政府濫用警力，維權群體性事件最後往往導致暴力反抗，造成嚴重後果。（5）民間維權運動儘管已經具有、且可能還要繼續增強其政治色彩，但就總體而言，其主要訴求，還是集中在經濟利益範圍，比較少涉及政治體制的問題，並且仍處於分散的、偶發突發的自發狀態，暫時還不可能形成自覺的、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對執政者而言，尚處在可控制的範圍內，因此也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時也使得維權運動尚有一定的發展空間。當局最要警惕與嚴處的是知識分子的介入，特別是法律介入，這些年連續發生對維權律師的迫害事件，就是一個信號。

在維權運動中，還有兩個特殊的群體。一是1957年的「右派」，一是以「天安門母親」^{iv}為代表的1989年「六四」受難者的家屬。這些年他們奮起抗爭，贏得了廣泛的社會同情；其主要訴求有二：為1957年和1989年的民主運動平反、恢復歷史的真實面目，同時維護自身的政治、經濟權利。他們都是風燭殘年的老人，為了對歷史和子孫後代負責，寫下了大量的血淚回憶，其「拒絕遺忘」、「維護歷史與自我尊嚴」的鬥爭精神是一筆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

參與維權的還有一個龐大的「上訪者」^v群體。和集體性的反抗相比，他們具有更大的個人性與自發性，但卻更為持久，其糾纏不休，此起彼落，讓權勢和官僚頭痛不已。他們為此付出了慘烈的代價，也因此獲得廣泛的社會同情。人們也把上訪群體人數的急遽上升，看作是社會不穩的重要標誌。

其次，網絡技術的出現，給民間表達訴求、凝聚力量，提供了新的空間與可能性。前一講提到的1997-1998年間，民間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徐文立開闢的「空中民主牆」，就是推動「網絡民主運動」的第一個嘗試。二十一世紀以來迅速興起的網民群體，是以年輕人為主體、以青年知識分子為骨幹的，他

們沒有徐文立這一代人的民間反抗運動經歷，也沒有那樣強烈的政治意識，但他們具有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也就能夠成為民間改革運動的推動力量。大體上他們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參與改革事務：(1)利用網絡的搜尋技術，對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官員，進行有效的民間監督，發展「網絡民主」；(2)在網絡上，就國內外重大問題，改革的重大問題，以及當下發生的各種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學術事件，發表意見、提出訴求，以形成「網絡輿論」；(3)利用網絡發布信息的便捷、較難控制的特點，對維權運動進行輿論支持，或直接組織維權活動；(4)利用建立網站的方式，彼此交流信息與思想，逐漸形成某種「意見群體」，進行志同道合者之間，不受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力量的聚集、合作，形成沒有明確組織形態的民間組織，並開展形式多樣的民間活動，如志願者活動、各種興趣活動等等。這些活動一般不具有鮮明的政治色彩，但其中的骨幹力量大多具有自覺的社會參與意識，或是人們通常說的「公民意識」，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網民參與的是一種公民運動。

其三，非政府組織，即所謂「NGO」組織，又稱為「志願者」、「義工」組織，是二十一世紀以來發展最快，也是目前中國唯一合法存在的民間組織。據民政部門發布的統計報告，2006年全國各類公益性民間組織，已達35萬4,000個，³¹因為有許多未註冊的組織，所以實際數字可能還要更多。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計算：「如果每一個組織參加者有三十人，就有近一千萬人；如果每個組織的活動受益者也是三十人（當然這是大大保守的估算），那麼，也有一千萬」，³²這兩個「一千萬」意味著什麼，給我們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間。³³

實際上，志願者公益組織的發展，有一個從不合法到合法的長期博弈過程。我在2000年最初接觸的一個志願者組織，其領導人就因此而被捕入獄（當然用的是別的「理由」），經過可以說是艱苦卓絕的鬥爭，最後得到了政府有限度的承認。特別是2008年汶川地震和奧運會裡，中國志願者，特別是青年志願者的出色表現，為舉國、舉世所矚目，更得到了社會廣泛的認可。

31 轉引自黨國英、于莫：〈中國改革的現代性解析〉，《讀書》2010年第8期，頁20。

32 錢理群：〈「我們」是誰〉（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願者論壇上的演講），《致青年朋友》（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8），頁77。

33 參看錢理群：〈「我們」是誰〉（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願者論壇上的演講），《致青年朋友》，頁77-85。

順便說一點，2008年末，中國大陸很有影響的《南風窗》，在評選「2008：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時，破例評選了「三大群體」：「網民，志願者，集體維權者」。我因此說過：「2008年是中國民間三大群體登上中國歷史舞台的一年」。³⁴

有人將志願者組織稱之為是「非政府性」與「非營利性」的「第三部門」，由此決定了它的最大特點與作用，在於「它對政府機制和市場機制形成必要的補充與制約，是所謂『第三種力量』」。³⁵我自己還把它稱作是「理想主義者聚合」，也就是說，它是以某種信念、理念為支撐的志願的聚合。這樣的理念可以是「追求社會公正，平等，社會正義」，因此以救護、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為主要宗旨與服務對象；可以是「認定農村的發展是中國發展的關鍵」，因而關注「三農（農民、農業、農村）問題」，積極參與「支農」^{vi}、「支教」^{vii}活動；也可以是「追求人和社會與大自然的和諧發展」，進行各種環境保護的實驗；還可以是「以傳統文化的復興為己任」，開展經典閱讀與普及活動等等。可以看出，志願者的這些信念、理念，都是針對改革開放所產生的某些弊端，有著隱含的批判性，但卻又採取了積極補救的建設性態度，就其本質而言，正是用民間參與的形式，對政府主導的改革的一種糾偏與制約。

另一方面，志願者組織的非營利性，則表明了它所信仰與堅守的，是和實利主義、實用主義、消費主義等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不同的新的價值理念。我曾在「志願者論壇」上的一篇題為〈「我們」是誰〉的演講裡，作了這樣的表述：

當許多人奉行個人中心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拒絕任何社會責任和承擔，我們卻嘗試「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倫理。[……]當許多人沉湎於個人的無止境的物質享受、感官刺激、奢侈消費，我們卻相信人不僅有物質的欲望，更有精神的追求，我們嘗試着一種「物質簡單，精神豐裕」的新的生活方式。我們更關注大多數人的生存狀態，以及我們生活的生態環境，希望在共同富裕，共同發展，公正、平等的社會和諧中，在

34 參看錢理群：〈2008總結〉（2009年2月7日-2月16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446。

35 參看錢理群：〈「我們」是誰〉（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願者論壇上的演講），《致青年朋友》，頁79。

人和自然的和諧中，獲得自己生命的愉悅和意義：我們正在嘗試着建立一種新的幸福觀。〔……〕當許多人奉行將他人視為敵人的叢林規則，進行殘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時，我們嘗試着視他人為兄弟，在志願者和服務對象之間，在志願者之間，建立起人與人的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合作、互助的新關係。〔……〕當許多人陷於所想與所說、所做的分離，將真實的自我掩蓋、保護起來，被迫或主動生活在謊言之中，我們卻嘗試着通過志願者活動將「想、說、行」統一起來，努力生活在真實之中。³⁶

所有這一切都表明，志願者的「追求和嘗試顯然是對現實中國社會實際起着支配作用的生活邏輯，對當下相當多的人的選擇的一個挑戰」。³⁷在某種程度上，它是現行體制下的「另一個存在」，具有內在的批判性與否定性；同時，它又是通向未來的，可以說是理想公民社會的雛形：這都是其真正價值所在。

在志願者隊伍中，有兩個群體特別值得注意。一是「青年志願者」，其主力是在校大學生、研究生和畢業不久的各行各業青年，這是一批年輕一代中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中的骨幹，是出於對現行教育體制和體制下的自我生活方式不滿，而走上志願者道路的，因此，對他們來說，參加志願者運動的主要意義是在尋找自我人生道路，我因此把青年志願者運動看作是「當代大學生自己聯合起來，在參與社會變革的實踐中，尋找新的價值理想，確立新的人生目標的自我教育運動」。³⁸在汶川地震中同時引起關注的，還有民營企業家組織的志願救助活動，而許多志願者組織也越來越多地得到了民營企業家的資助，這是中國民營企業主階層非常值得注意的動向，這不僅是他們對社會的回報，同時也是一種參與民間運動的方式。民營企業家與民間運動的結合，會對中國未來社會的發展產生怎樣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這裡需要對我自己從2001年以來的思想、活動作一個簡要的介紹——這

36 錢理群：〈「我們」是誰〉（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願者論壇上的演講），《致青年朋友》，頁81。

37 錢理群：〈「我們」是誰〉（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願者論壇上的演講），《致青年朋友》，頁81。

38 錢理群：〈「我們」是誰〉（2007年5月26日在「公益2007」志願者論壇上的演講），《致青年朋友》，頁78。

也是本書結構所要求的話題。我在2002年退休以後，不僅把自己的研究興趣轉向對共和國歷史中長期被遮蔽的另一面——民間思潮與運動史的研究，本書即是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而且把自己的社會活動轉向對自下而上的民間改革運動的參與和推動。這是我的一個基本信念：可以說是從文革開始，特別是文革後期的民間思考，形成了我的根深柢固的底層情結。因此在八、九十年代我儘管主要生活與活動在上層的學院裡，但關注的中心，還是民間的社會運動和民間思想文化運動，並自覺充當民間社會運動的觀察者和參與者（從八十年代的民間學術，到九十年代的北大百週年的民間紀念）。在退休以後，遠離了學術體制的中心，自覺地邊緣化，因此，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擺脫了體制的束縛，我覺得自己就應該「走向民間」，以更積極的態度，參與新世紀的民間運動。由於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我沒有參與維權運動和網上監督，而主要集中精力於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和青年志願者運動的推動。我給自己規定的任務，則是為這兩個運動作鼓吹和經驗總結，以提供理論資源，提倡一種「志願者文化」和「新教育理想」。這樣的理論建設，是民間運動健康發展所需要，卻往往被忽略，又是我能夠做的。為此，我作了很多演講，也寫了許多文章，積有《我的教師夢——錢理群教育演講錄》³⁹、《做教師真難，真好》⁴⁰、《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⁴¹、《致青年朋友》等書，還計劃寫一本《論志願者文化》，並在《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裡有詳盡的說明，這裡就不多說了。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講二十一世紀的三大民間運動——其實，更全面地說，二十一世紀還存在著迅速發展的民間宗教運動，由於情況比較複雜，我自身又沒有任何研究，本書的敘述只有闕如，同學們如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這三大民間運動，從精神譜系來說，和本書詳盡討論的民間思潮、社會運動——從1957年的民主運動，到1978-1980年的社會民主運動，及1980年的校園競選運動，以至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是一脈相承的，都以民間的力量推動中國社會的民主和進步為指歸。但如前面所說，現在的民間運

39 錢理群：《我的教師夢——錢理群教育演講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40 錢理群：《作教師真難，真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41 錢理群：《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動又確實具有新的形態，這不僅是因為有新的時代條件，比如像網絡民主運動就顯然與新的科學技術有關，為以前的時代所不可能有；而且更與中國特殊的政治環境有關：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在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都受到極大限制的情況下，公開的政治反抗空間極小。民間運動就出現了一種特殊形態：儘管就其發展背景、實質內容而言，具有顯然的政治性，但表現出來的形態卻是一種「非政治性」：維權限於經濟範圍，志願者主要從事社會服務，網民監督也只限於地方個別政府部門與官員。在這個意義上，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民間社會運動尚處於不成熟的「初級階段」，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其超越了單一的政治性，也未嘗不是一種豐富與發展。

此類民間運動和執政者的關係，則十分微妙與複雜。一方面，無論是維權、網絡監督，還是志願者，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黨和政府也予公開承認；但另一方面，各級當權者又都將其視為「不穩定因素」，因而對之交互使用了「限制與打壓，控制與利用」的政策，這就使得這些民間組織與運動，既面臨活動空間逼仄、不得不在狹縫中求生存的困境，又隨時有被收編、利用而變質的危險。

最後，還想談談毛澤東對這三大民間運動的影響，這也是頗有意思的。人們注意到，底層的維權運動，特別是在其初期，往往都打著毛澤東的旗號，這不僅是出於懷舊，參與維權的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被強迫搬遷的城市貧民，他們要懷念毛澤東時代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思想中的反體制方面，對官僚主義者階級特權的批判，對底層人民利益的維護，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投訴無門的底層民眾又產生了新的吸引力。儘管毛澤東在其統治期間實際上又損害著底層人民的利益，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方面比較容易被忽略，反而是把毛澤東為底層說話的言論放大，使之成為新的反抗運動的資源。同樣引人注目的是網民中最為激進的部分，所謂「憤青」中出現了新的「青年毛澤東主義者」，他們和文革前夕與文革中出現的青年毛澤東主義者，既有某種精神聯繫，又有更鮮明的新時代的特色，因而顯示出很大不同。他們建立以傳播毛澤東思想為己任的網站，也吸引著為數不少的青年網民。這與這些年民粹主義思潮的興起直接相關。我們說過，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有極強的民粹主義色彩，在當今中國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一部分知識精英自身特權化，成為特權階層的辯護士和代言人的情況下，可以想像，毛

澤東反精英的極端平民主義和絕對平均主義的思想，自然會引起本身就充滿非理性的反抗激情的年輕網民的共鳴。在志願者運動中，則集中了一批有著底層情懷、實踐精神，懷有浪漫激情的新的理想主義者，他們也同樣很容易和毛澤東，特別是青年毛澤東產生共鳴，尤其是毛澤東「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號召，更成為許多志願者組織的指導思想。⁴²這一切都顯示了毛澤東在當下中國民間社會的影響。據2008年一個居民宗教信仰調查，中國人在家中供奉毛澤東塑像的達11.5%，僅次於祖宗牌位(12.1%)，高於佛教塑像(9.9%)、財神(9.3%)和土地爺(8.8%)。⁴³於是，就提出了一個中國民間「毛澤東信仰」的問題，這裡既有保平安、求安定的祈福，也有對社會、生活不滿的傾訴。如一位研究者所說，毛澤東「再次成為社會輿論中象徵着正義、公平、貧富均等的精神符號」。⁴⁴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在講文革時曾經提到，當年(1966、1967年)的造反派將毛澤東視為「永生不背叛民眾的革命家領袖，反抗特權階層壓迫的正義帶頭人」，⁴⁵到了二十一世紀，毛澤東又在中國民間社會重獲這樣的形象，這是耐人尋味的。而我所關注的是「這樣的懷念毛澤東的民眾情緒對當下中國政治的影響」。「在我看來，這樣的影響，有兩個發展趨向。或者以毛澤東思想、觀念、體制作為批判和否定現行體制的資源，或者以毛澤東思想、體制、統治經驗作為維護現行體制的資源。後者正在得到最高當局的鼓勵和支持」。⁴⁶

三、知識分子的不同走向

2001年以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對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直

42 在一份〈青年中國(志願者)行動宣言〉(2009年4月)裡，就明確宣傳：「知識分子唯有主動與工農結合，支持執政黨中央打破腐敗特權階層的特權，中國的改革才會有大的新的質的突破」。〈青年中國(志願者)行動宣言〉(內部交流本，2009)。

43 據北京零點研究諮詢集團研究調查。轉引自李向平：〈「毛澤東信仰」的現象解讀〉，《南風窗》2009年第6期，頁90。

44 李向平：〈「毛澤東信仰」的現象解讀〉，《南風窗》2009年第6期，頁91。

45 尤西林：〈文革境況片斷〉，徐友漁主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頁8。

46 參看錢理群：〈2009年總結〉，未刊稿。

接影響包括：國家和地方政府資金投入大幅度增加，中上層知識分子收入急劇提高，這一方面確實為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發展提供了越來越充足的物質條件，促進了科學、文化、教育及相應事業的發展；同時，在中國集權體制下，又極大地強化了掌握巨大財力的行政權力對思想、文化、教育、科學事業的控制與干預，加速思想、文化、教育、學術權力向資本的轉化，出現越來越嚴重，並且遏制不住的思想、文化、教育、學術之商業化、行政化、官僚化、體制化傾向，其結果就造成了思想、文化、教育、學術的全面腐敗和對知識分子的整體收編。

伴隨著全球經濟危機下的「中國的崛起」，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思潮也同時「崛起」，在執政者的強力支持與引導下，迅速成為主流意識形態。

正是以上兩個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知識分子向現行國家體制靠攏的趨勢，並且越來越成為主導性的傾向，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創造力和批判性被削弱以至喪失，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我在很多場合，都一再引述魯迅的警告，他說，統治者對知識分子的要求，一是「同意」，在今天來說，就是支持、擁護他們的「偉大思想」、「英明決策」；二是「解釋」，即從知識層面、從理論上闡明這些思想、決策的「科學性」，「合道德性」，以至「偉大的歷史意義」；三是「宣傳」，也就是「說謊」；最後就是「做戲」。⁴⁷可以看出，到二十一世紀，就有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自覺、半自覺地履行這「同意和解釋」、「宣傳與做戲」四大職能，開始時還有些心虛，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後來，就習以為常，理直氣壯，並以此炫耀於世了。

首先是民族主義的極端發展，變成新的中華中心主義。本來民族主義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是對在中國頗有市場、同樣具有危險性的「西方中心主義」的一個反撥。我們在前面說過，在八十年代曾經有過以未加反思的西方，特別是美國式的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化目標的強大思潮，此後也一直有知識分子堅持「中國的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的立場。這樣的極端立場，到二十一世紀就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別是美國在蘇聯、東歐瓦解以後，進一步推行

47 魯迅：《准風月談·同意和解釋》（1933年9月3日），《魯迅全集》第5卷，頁303-304；《二心集·宣傳與做戲》（1931年11月20日），《魯迅全集》第4卷，頁345-346。可參看錢理群：〈2002回顧〉（2003年1月1日-8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211。

國際霸權主義，西方右翼勢力將經濟崛起的中國視為威脅、對中國進行圍堵時，中國國內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是有一定社會與群眾基礎的。但這樣的民族主義思潮，本身又存在著兩個陷阱。其一就是將民族主義膨脹為「中華中心主義」。比如有論者提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⁴⁸鼓吹「大中華經濟文化圈」，⁴⁹揚言「世界上的一切解放運動，無一不沐浴着中國思想的陽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進步，無一不得惠於中國的功德」，⁵⁰「中國思想、中國經營能力的當量將深刻影響世界，並將成為領導未來人類思潮的唯一動力」。⁵¹還有人預言：「中國下一步的現代化進程，決定了中國必然要與西方進行一種以軍戰支撐的商戰」，⁵²主張要確立「第一是要在這個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現在中國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資源，給世界人民帶來福祉」，⁵³「重新站到領導這個世界的位置上」的「大目標」，⁵⁴於是，順理成章地就有了「我們要準備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的呼喚，⁵⁵而且還有這樣的豪言壯語：即使「造成我們國家前進的一度滯遲」，但「這種代價與未來的永恆的代價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們將因我們的某些犧牲換來更多的補償，世界將為之重著編年史。有道是——『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⁵⁶論者引人注目地引用了毛澤東詩詞，當然不是偶然，因為這樣的豪言在毛澤東時代曾經響徹雲霄。現在，這些話語在「後毛澤東時代」重新響起，正說明在所謂「中國崛起」背景下出現的新中華中心主義，和毛澤東時代在文革中推到極致

48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頁24。

49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頁30。

50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頁49。

51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頁51。

52 宋曉軍：〈中國無法不顯其大〉，宋曉軍等著：《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96。

53 王小東：〈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宋曉軍等著：《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頁98。

54 王小東：〈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宋曉軍等著：《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頁99。

55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頁41。

56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頁42。

的「中國應成為世界革命中心」、「用革命戰爭拯救世界」的論調，是一脈相承的。民族主義發展到這樣的極端，就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並且具有極大的危險。

民族主義的另一個陷阱，就是發展到國家主義，用「一致對外，反對美國霸權」來掩蓋日趨嚴重的國內問題與危機，甚至為現行的專制體制辯護。⁵⁷於是，就有了為「中國崛起」作出種種「解釋」的高論。據說「人類在解決收入貧困、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生態貧困四類貧困中沒有什麼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國在其特定的國情條件和體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這裡不僅存在對中國發展成就的誇大，更存在有意的遮蔽，甚至把中國單一經濟發展導致的生態危機以及隱含的生存危機，都說成巨大成就，完全顛倒了事實。同時，這又暗示著全人類都沒有擺脫四大貧困，唯有中國獲得了「成功」，這就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全世界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等待中國去解救」的囈語，這已經成為歷史的笑話，而今又以新的理論形態出現了。

要害是要證明現行「體制」的優越性。於是就有了對「中國經驗」也即「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的如下概括：中國發展的「奧祕」就在「中國六十年不變的強政府」，「有效的政府」，「與其他國家相比獨一無二的中央集權」。而且據說這個「中央集權」的「強政府」具有特殊的優越性：這是「中性無偏私的政府」，「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不是任何一個利益集團的代表，而是全中國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是一個先進、無私、團結的執政集團」，並且具有「分工制衡糾錯機制」等等——這裡所說的一切，和真實地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普通人的實際感受大相徑庭。但他們卻偏要強調自己高度認可的國家與政府（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都是代表「人民大眾」的：「我們的政治制度、政治體制改革，或者叫中國特色政治體制建設，也就是給社會、給人民以很大的權利的保障和自由發展的空間」，「不管是政治模式、社會模式還是經濟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發展模式的人民性問題」。最後概括出來的「中國模式」、

57 也有些民族主義的鼓吹者看到了這樣的危險，因此提出了「內修人權，外爭族權」的口號，力圖調和「政治民主化目標和民族主義目標」。王小東：〈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宋曉軍等著：《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頁100。

「中國道路」，也就是所謂「集權為民」四個字。⁵⁸應該客觀的說，「集權為民」倒是概括了毛澤東所開創、鄧小平及其後繼者所堅持的「一黨專政」體制的特點：「集權」是實，「為民」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實際就是「開明專制」。因此，這些知識分子所做的，無非是用所謂「中國經濟發展」來論證「毛澤東時代」及「後毛澤東時代」一以貫之的一黨專政體制的合理性、優越性。而且還有充當「中國智庫」的自我角色定位，據說「中國現在所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是在『言』和『行』之間存在着明顯的落差，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表現卓越，但卻往往表述不出來。這就需要提升中國智庫和國際對話的能力，能夠把自己的行動轉化成科學語言和外交語言，並通過學者宣講出去，就會取得更好的效果，也會提升中國的軟實力」。⁵⁹本來充當智庫也不失為知識分子的一種選擇，問題是在中國現行體制下，智庫所實際擔負的只能是「宣講」，也即魯迅說的四大職能，缺乏獨立自主性、本質上的依附性，就成了這些知識分子先天的致命問題。

應該指出，這樣的「新開明專制」論，看起來似乎是八十年代的新權威主義的重現，但卻具有鮮明的為現行權威體制辯護的色彩。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八十年代新權威主義的倡導者所說，「當今中國的權威體制的結構特點〔……〕脫胎於全能主義或全控主義體制的新權威主義，是一種『極強國家』與『極弱社會』相結合的權威統治」，這樣的「社會制約力度極低的『極強勢政府型』的權威政治」，可能因為強大的國家行政優勢，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取得一定成績，但也必然越來越為既得利益集團所綁架、越來越損害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⁶⁰有意無意忽略這些基本事實，將這樣的權威體制美化為「集權為民」，倒是和自己選定的當局「智庫」的身分相一致。

引人注目的，還有文化保守主義的凸顯。這既是九十年代初便已「悄悄興起」的「國學熱」的延續，但也有新的時代背景。如論者所分析，大體有三。

58 以上關於「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討論意見，見支振鋒、臧勸：〈「中國模式」與「中國學派」——「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學術研討會綜述〉，《開放時代》2009年第4期。

59 見鐘舒民：〈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國外交面臨新挑戰，中國智庫要提升國際對話能力〉，《文匯報》2010年8月16日，第7版。

60 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頁62。

一是「全球化與市場經濟引發的價值觀的世俗化，引起全民的尋根意識與文化認同感的覺醒」。二是中國的經濟崛起，激發起「遭受百年屈辱後的揚眉吐氣感」，「強化了國人的民族意識」——這一點和民族主義的興起，是具有同一背景的。第三，「回歸傳統的思潮也與新中產階級的發展有關，這一思潮體現了這一新階級在文化上的更精緻的趣味與追求」。⁶¹ 但和所有的社會思潮一樣，文化保守主義既是勢所必然，也存在著自己的陷阱。在我看來，主要有二，一是商業化、娛樂化，成為消費文化的新品種，就又陷入了原本要對抗的世俗化。其二是政治化，這恐怕也正是許多文化保守主義的鼓吹者所自覺追求的，即要使儒學重歸廟堂、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新核心。但在中國現實體制下，這樣的訴求卻會走向願望的反面：成為現行專制體制的新裝飾，政治化的另一端，則是通向國家主義和新中華中心主義。這也是當局所需要的。

在一部分知識分子向體制靠攏的同時，另外一部分知識分子則主動走向民間。我們在前述的三大民間運動中，都看到了越來越活躍的知識分子身影。特別是維權律師的法律救助，使維權運動納入現代法制的軌道，並注入現代民主意識、權利意識，其影響將是深遠的。知識分子成為各種非政府組織的骨幹，從事各種公益活動，進行相應的社會調查與研究，不僅取得了許多實際成效，而且越來越發揮了對政府的監督與制約作用，同時也是一種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思想啟蒙運動，特別是通過青年志願者的組織與培育，也會對未來中國的發展產生影響。網民監督本身就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體，它把分散的、本來處於社會生活邊緣地位的年輕人吸引到國家公共事務上，並行使公民權利，其影響同樣深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書齋裡的知識分子終於在這三大民間運動中找到了自己介入社會的方式。但同時所受到的限制，由此帶來的侷限性，也是十分明顯的。而且，像網絡這樣的新技術本身就是一把雙刃劍，在發展網絡民主的同時，也會出現網民多數專政——對民間運動和民間知識分子，也應持分析的態度，切不可將其理想化，成為新的烏托邦。

當然，更多的知識分子還是堅守在自己的專業崗位上，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社會服務，並盡可能地保持思想與行動的獨立，這明顯地具有積極意

61 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頁74。

義。更有知識分子堅守獨立批判立場，對國內外重大問題及時給予回應，並試圖創造新的批判理論，為社會提供新的價值理想，這樣的努力，其意義不可低估。

在2008年，一部分知識分子發表了〈零八憲章〉(底下簡稱為〈憲章〉)。
 〈憲章〉一開頭就特意點明：「今年是中國立憲百年，〈世界人權宣言〉公布60周年，『民主牆』誕生30周年，中國政府簽署〈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0周年」。這就表明，他們所要推動的2008年「憲章運動」，是百年立憲運動的繼續，是以「西單民主牆」為標誌、1978-1980年的民間社會民主運動的繼續，而且要和推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的國際運動相聯結。〈憲章〉明確宣布自己的價值理念：「自由、平等、人權是人類共同的普世價值；民主、共和、憲政是現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構」，並從這樣的價值理念出發，對毛澤東時代作出了尖銳的批判：「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名義上是『人民共和國』，實質上是『黨天下』。執政黨壟斷了所有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製造了反右、大躍進、文革、六四、打壓民間宗教活動與維權運動等一系列人權災難，致使數千萬人失去生命，國民和國家都付出了極為慘重的代價」。對「二十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在肯定其「使中國擺脫了毛澤東時代的普遍貧困和絕對極權，民間財富和民眾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個人的經濟自由和社會權利得到部分恢復」等歷史進步的同時，特意強調：「抽離了〔自由、平等、人權、民主、共和、憲政〕這些普世價值和基本制度架構的『現代化』，是剝奪人的權利、腐蝕人性、摧毀人的尊嚴的災難過程」(括號內文字為錢所加)，隱含著對鄧小平改革路線的實質性的批判。對當下中國的現狀，〈憲章〉則作了這樣的批判性的論斷：「有法律而無法治，有憲法而無憲政」。〈憲章〉由此而提出了二十一世紀中國發展道路的新抉擇：拋棄「威權統治下的『現代化』」，而走上「認同普世價值、融入主流文明、建立民主政體」的道路，並具體提出了：「修改憲法」、「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分權制衡」、「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人權保障」、「結社、集會、言論、宗教自由」、「財產保障」、「城鄉平等」、「聯邦共和」、「政治平反，查清歷史事件真相，尋求社會和解」等要求⁶²——可以看出，〈憲章〉力圖將歷史與現實的民間反抗運動之主要訴

62 〈零八憲章〉(2008年12月10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零八憲章：<http://www.2008xianzhang.com>

求，用「憲章」的形式明晰化，形成一個以推動「憲政民主」為主要旗幟的新的政治體制改革運動，同時，提倡一種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精神。有人認為，〈零八憲章〉運動的出現，標誌著「持不同政見運動基本結束，中國社會已經轉進到非暴力公民權利實現的階段」。⁶³這其實是顯示了自由主義走向溫和化的傾向和趨勢，他們力圖緩解自由派知識分子與執政者的緊張關係，希望形成一種可以和當局進行談判的政治力量，以達到和解與合作。但他們始終得不到當局的認可，卻遭到越來越嚴厲的打壓，就更顯得一廂情願。

〈零八憲章〉運動採取了在網上徵求署名的方式，簽署人最初有303人，後來發展到了數千人。除了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之外，還有許多普通網民。也有的知識分子基本上認同其理念，但又認為〈憲章〉的自由主義色彩過濃，不利於吸引更多民間改革力量（例如持社會民主主義觀點的左翼知識分子）加入，而未參加連署。⁶⁴還有人認為〈憲章〉沒有提出維護勞動者權利的訴求、沒有高舉社會公平和正義的旗幟，以「融入主流文明」為目標，對西方文明價值觀缺乏反省，僅是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運動，而持保留態度。顯然，這樣的不同意見的討論都是正常、有益的。

但〈零八憲章〉卻遭到了來自「左」、「右」兩方面的圍剿。極左的毛澤東派把〈零八憲章〉視為「徹底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綱領」，「企圖顛覆我國社會政治制度的反革命行動綱領」，「使中國重新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宣布憲章的發起於簽署人是「漢奸」、「賣國賊」、「外國資產階級代理人」。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則指責零八憲章旨在「為共產極權思想留一條生路」，「讓中共苟延殘喘」，甚至是「掩蓋中共罪行，欺騙民眾」，「與虎謀皮」。⁶⁵

最後是權力出場：執政當局宣布〈零八憲章〉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

info/chinese.htm。

63 歐陽懿：〈《零八憲章》：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2009年11月25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零八憲章：<http://www.2008xianzhang.info/Reviews/20091204%20ouyang%20yi.html>。

64 參看秦暉：〈中國更需要民主辯論與重新啟蒙〉（2009年3月8日），《亞洲週刊》第23卷第9期，2011年7月27日取自，亞洲週刊：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tt&Path=3104908231/09tt1.cfm。

65 轉引自杜光：〈零八憲章：和解的宣言，合作的宣言〉，《杜光文存·紀念特輯》，內部交流稿。

宣言」，對部分簽署者採取傳訊、監控、跟蹤等違反憲法的措施，嚴禁〈零八憲章〉傳播。最後，以「配合敵對勢力」、「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對憲章的主要發起人劉曉波(1955-)判以重刑。我曾在一篇文章裡指出，這是執政者要「向世人傳遞出明白無誤的三大信息：一，在當今黨的核心領導下，中國是不允許任何反對派，不同政見者存在的，哪怕是最溫和的反對派；二，中國的現行政治體制是不允許討論的；三，中國的民間民主運動是沒有任何合法性的，哪怕是最理性的民主運動。這就從根本上拒絕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相應的司法改革和社會改革」。我曾談到「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三起三落」：「1980年鄧小平提出國家體制改革，到1981年宣佈取締民間組織和報刊而自動中止；1986年鄧小平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又因1989年鎮壓學生運動而終止；近年又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現在恐怕要以對劉曉波的重判為標誌而終止」。⁶⁶在2010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後，當局對所有劉曉波和〈零八憲章〉的支持者，都加強了控制。這更是表明，中國的執政者不但完全無意於對一黨專政的體制進行任何改變，而且還要加強其思想、社會控制。他們似乎因為中國經濟的崛起，在鎮壓國內不同意見者時更加有恃無恐，這樣，就再一次失去歷史的機會進行改革，其後果將是極為嚴重的。

四、中國共產黨的分化：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

2004年，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離世之前，作出了一個嚴峻的判斷：「這個體制實際上是腐爛了」。⁶⁷在此之前，他已經斷言：「鄧小平的路線已走到盡頭」，⁶⁸鄧小平的「兩手都要硬」^{viii}，他的「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

66 錢理群：〈2009年總結〉，未刊稿。如果聯繫毛澤東時代，就應該說是「五起五落」。毛澤東也曾兩度試圖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一次是1956年提出「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和「互相監督，長期共存」的「放」的方針，如前所分析，這是一次「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政治改革」，後來以發動反右運動而結束。第二次是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提出要以「巴黎公社民主原則」進行國家體制的改革，但又以毛澤東的退縮而夭折。

67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373。

68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296。

的市場經濟是矛盾的」，⁶⁹「經濟上的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此路是行不通的」。⁷⁰這其實是所有正視中國現實的人(包括社會上與黨內)的一個共識，人們普遍感覺到「再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可以說各階層的人，都要求突破鄧小平的「兩手都要硬」，作出新的選擇。這樣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執政黨內部。事實上，正如毛澤東當年所說：「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中國共產黨內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總是存在著不同意見，但在毛澤東時代基本上沒有形成派別，無論是劉少奇、周恩來，還是彭德懷，他們儘管和毛澤東有各種矛盾，但基本上是忠於毛澤東的，都是「毛派」。只有在八十年代，開始出現了所謂「凡是派」與「改革派」之爭，後來又有陳雲派與鄧小平派之爭，但總體來說，在維護黨的一黨專政這一基本點上，還是一致的。應該說，直到天安門事件，在是否要鎮壓學生、知識分子、市民民主運動問題上，才發生了根本性的分歧與衝突，但即使這樣，趙紫陽還是避免了公開的分裂。但到了九十年代，當新的社會階層、新的利益群體形成，兩級分化日趨嚴重，各階層都更加自覺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時，黨內的分化才真正有了階級、階層的基礎。到2001年以後，黨的性質發生質變，一黨專政的階級基礎發生變化，「改革共識」的喪失，意味著趙紫陽所說的「鄧小平路線已走到盡頭」，黨內的分化的公開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於是，就有了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與對峙。

黨內的「極左派」，在「六四」之後，曾經團結在陳雲的旗幟下活躍一時；但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以後，他們就基本上退出了權力中心，但仍不斷通過上〈萬言書〉的方式，對江澤民的黨中央施加壓力。而且隨著社會兩極分化的發展，普通民眾、青年和部分知識分子中，出現了懷念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的情緒，這就使得「極左派」開始有了群眾基礎。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ix}召開前夕，黨內「極左派」發表了題為〈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決捍衛四項基本原則，開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的〈對黨的十七大的獻言書〉(底下簡稱爲〈獻言書〉)，上書者包括170名黨、政、軍中、高級幹部。如〈獻言書〉的標題所示，他們的主要訴求有二：一是

69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192。

70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296。

「堅決捍衛四項基本原則」，二是「高舉毛澤東旗幟」，這也就意味著公開亮出了「毛澤東派」的旗幟。

首先是要放棄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稱其為「資本主義的改革開放」，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要堅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核心是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即黨的絕對權力，不允許任何分權。這裡包括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即黨的既得利益集團打著「代表國家、工人階級最高利益」的旗幟，實行對經濟所有權、分配權的絕對控制，並獲取最大利益；「全力恢復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即鞏固黨對思想、文化、學術的壟斷地位和絕對控制；堅持作為「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的具體形式」的「人民民主專政」，其中的關鍵是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控制，拒絕「軍隊國家化」；堅持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資產階級的個人自由」的旗號下，剝奪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實行黨在思想、文化、學術上的「專政」。

在這些毛澤東派看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鍵，就是要「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絕不能丟掉它的核心和靈魂。否則，就是假高舉，而不是真高舉」。那麼，他們要真高舉的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和靈魂」是什麼呢？回答也很明確：「近年來我國所有制結構和階級關係的空前大變化，不是證明階級鬥爭『長期存在』，『誰勝誰負』問題尚未解決，『繼續革命』不可避免嗎？」這就是說，他們要重新恢復和推行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的治黨治國路線，其具體的實踐步驟，就是重新發動一場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派」（其中又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知識分子中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兩部分）為打擊對象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就等於逕直地呼喚一場新的文化大革命了。他們所要「回到」的，就是1957年反右運動以後進一步建立和發展、到文化大革命走到極端的極權體制，也即我們一再提到的「五七體制」。這也就同時表明，所謂黨內「毛澤東派」，所代表的就是「五七體制」下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⁷¹

71 以上引文見〈170名黨員、幹部對黨的十七大的獻言書〉，2011年7月27日取自，《批判與再造》（復刊版）：<http://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07/10/02/170%E5%90%8D%E9%BB%A8%E5%93%A1%E3%80%81%E5%B9%B9%E9%83%A8%E5%B0%8D%E9%BB%A8%E7%9A%84%E5%8D%81%E4%B8%83%E5%A4%A7%E7%9A%84%E7%8D%>

值得注意的是，〈獻言書〉已經指明：「鄧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錯誤的東西更多些，這些錯誤思想為中國復辟資本主義開闢了道路」，同時嚴厲指責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思想對「黨的性質」的「改變」。到了2008年和2009年，黨內毛澤東派的一部分人就公開成立「毛澤東主義共產黨」^x、「中國工人(共產)黨」^{xi}，實行組織上的分裂，同時更加明確地提出要反對鄧小平、江澤民的「修正主義」，並旗幟鮮明地提出要「重塑毛澤東思想權威」，而且重點是毛澤東的後期思想，宣稱「毛澤東時代、特別是毛澤東時代的後期，是世界發展史上人類社會最輝煌、最美好的歷史時期，是通向共產主義的必經之路」。⁷²他們同時提出要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的「最大歷史意義和經驗教訓」，認為「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亂，後七年基本天下大治——億萬人民意氣風發，各行各業碩果纍纍，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層出不窮，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確立」，是一個理想的社會，⁷³進而重新拾起文化大革命的口號，號召「高舉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戰無不勝的毛澤東主義萬歲」，「重建無產階級專政，堅決消滅私有制」，⁷⁴這就意味著要全面回到毛澤東時代——同學們可能會聯想起我曾經向大家介紹過的，毛澤東文革初期在給江青的信中提出的期待與預言：在他死了以後，會有「左派」高舉起他的旗幟來反對「右派」。對毛澤東派興起的影響，自然不可低估；當局對此的曖昧態度，與對〈零八憲章〉的嚴厲打擊形成鮮明對比，或許更值得注意。

與毛澤東派同時興起的，還有黨內民主派。

應該說，黨內民主派的形成與出現，是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複雜過程的。黨內民主派的主要構成是黨內的知識分子，他們的特點就是所謂「兩頭真」。曾任張聞天的祕書的何方這樣談到他們艱難的思想歷程：「當年參加革命時懷抱的崇高理想就是為自由民主而奮鬥，喊的口號中有『不自由毋寧死』，唱的

bb%e8%a8%80%e6%9b%b8/。

72 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關於時局的聲明〉(2008年5月4日)，轉引自杜光：〈從史學危機透視政治危機〉(2010年3月27日)，《杜光文存》第23期，內部交流稿。

73 中國工人(共產)黨主席齊志平：〈致胡錦濤建言獻策書〉(2009年8月15日)，轉引自杜光：〈從史學危機透視政治危機〉(2010年3月27日)，《杜光文存》第23期，內部交流稿。

74 毛澤東主義共產黨：〈關於時局的聲明〉(2008年5月4日)，轉引自杜光：〈從史學危機透視政治危機〉(2010年3月27日)，《杜光文存》第23期，內部交流稿。

歌也是『我們為了博愛，平等，自由，不惜任何代價，甚至我們的頭顱』，可是後來不知怎麼搞的，這個理想竟然漸漸地淡忘了。而且回頭一想，反而是越奮鬥，離民主、自由、博愛、平等越遠，甚至走到了它們的對立面。是當年選的理想錯了(因為那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東西，是反動的)，還是後來背叛了原來的理想(因為自由、民主、博愛、平等這些東西屬於人類共同理想，不分什麼資產階級的還是無產階級的)?難道這些問題不值得認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後可就連想的時間都沒有了。⁷⁵應該說，這樣的反思在文革後期，特別是文革以後就已經開始了。因此，這些黨內知識分子，在「改革派」與「凡是派」的鬥爭中，堅決地站在鄧小平這一邊；在胡耀邦、趙紫陽與鄧小平產生分歧以後，又都團結在胡耀邦、趙紫陽周圍，這都不是偶然的。但在八十年代，他們都不可能和現行體制決裂，這一點連胡耀邦與趙紫陽都做不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何方所分析的，「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是一直受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黨的領導等這些重大原則的指導、規範和約束的。〔……〕雖然有許多行為是被迫的和隨大流的，但整個說來，還是基於對這些重大原則自覺自願地皈依和遵守」，⁷⁶對這些老共產黨員來說，「黨的領導」幾乎成了不可逾越的「底線」，要從中擺脫出來，是極其艱難的，這不僅有意識形態的束縛，而且說到底，也有一個既得利益的問題：他們自身的利益也和黨的執政利益聯繫在一起。應該說，正是「六四」大屠殺震醒了這些真誠的革命者，使他們看清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核心是維護黨的絕對權力)和他們所期待的「改革開放」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從而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線產生了懷疑。隨後十年中，改革成果為新的權貴資本階層所奪取，廣大工人、農民卻陷入物質與權利的貧困，黨自身也蛻變為權貴的「代表」，這就迫使這些老共產黨員作出新的抉擇：要堅持自己原初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的革命理想，就必然要維護社會弱勢群體(下崗工人、失地農民、農民工等)的利益，並和造成兩極分化的根源——一黨專政的現行體制——決裂。這樣，他們自身也回到了原初的「真」，堅守了對真理的追求，而真理是高於黨和主義，更高於集團和一己的利益的。

75 何方：〈前言〉，《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頁 x-xi。

76 何方：〈前言〉，《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頁 xi。

黨內民主派在二十一世紀以來，就以《炎黃春秋》雜誌為中心，逐漸醞釀、形成，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斷通過個人或聯合的發言，對黨內和社會產生影響。到2007年，就以兩個標誌性的事件，而為全國和世界所矚目。

首先是《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發表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1921-2010)的〈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高舉起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旗幟。文章明確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並且具體說明：「構成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的是民主憲政，混合私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同時強調：「民主社會主義的核心是民主，沒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項都會異化和變質」。⁷⁷我們首先注意到，和黨內毛澤東派要求放棄改革相反，黨內民主派要求深化改革，這就要改變單一的經濟改革模式，深入到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核心又是實行「民主憲政」，突破一黨專政的政治格局，這恰恰又是黨內毛澤東派所要死守不放的。

其次，黨內毛澤東派要高舉「毛澤東主義」旗幟，黨內民主派則要高揚「民主社會主義」。對這些忠誠的老革命黨人而言，完全放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這是他們的基本信念。因此，在他們拋棄了毛澤東主義(在他們看來，毛澤東主義依然沒有擺脫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斯大林模式」)，就要從馬克思主義內部去尋找新的理論資源，他們找到的，是長期被視為修正主義的第二國際的民主社會主義(又稱「社會民主主義」)。在他們看來，民主社會主義正是將他們的追求民主、自由、博愛的理想和為勞動者謀福利、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理想有機地統一起來，並且有了北歐等社會福利國家的成功經驗作為借鑑，在已經有社會主義傳統的中國推行民主社會主義，可能是能使中國共產黨比較容易轉彎，而且具有一定民意基礎的選擇。

這樣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現代中國是由來已久，自有傳統的。這也是我們的講課一再強調的，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其實是更接近社會民主黨人的；而從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到六十年代的《星火》，到七十年代的民間思想村落，再到1978-1980年的社會民主運動，都始終貫穿著民主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線索，並且出現了顧準這樣的理論家——他早在1956年就作出了

77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選擇與預言：「民主社會主義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實現，要以高度發達的經濟為前提，它的逐步實現，要在二三十年之後」。⁷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在中國經濟獲得了大發展的二十一世紀，民主社會主義終於從一種理想而成為具有現實可能性的選擇，這應該是民主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民間思想運動裡長期孕育和發展的一個結果。歷史就這樣完成了一個過程。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於2007年公開出版，這也是一個重要標誌。我曾經說過，「這本『宗鳳鳴記述，李銳、鮑彤序』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是一個集體智慧的結晶——特別是考慮到此書的『記述』性質，畢竟不是趙紫陽親筆所寫，因此將其視為以趙紫陽命名的中共『老共產黨人的集體思想的結晶』可能是更準確的。從另一面說，經過二、三十年的思想積累，出現這樣的總結性著作，也是水到渠成，勢所必然」。⁷⁹黨內民主派也因此有了一位標誌性的人物，更具有凝聚力與召喚力。

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這些民主派共產黨人的態度也同樣鮮明：「目前社會上出現的一切弊端，皆淵源於鄧小平雖主張經濟上改革開放，卻又堅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權，是由這條政治路線造成的」，⁸⁰「中國的問題，關鍵就在於一黨專政」，⁸¹因此，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只能是、也應當是政治改革」，⁸²而「所謂政治改革，就是要放棄黨壟斷一切的權力」。⁸³

作為具有一定理論性的著作，《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對造成這樣的現狀，形成這樣的「中國問題」的原因，作了歷史的追溯和理論的追問，討論了一系列的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諸如，「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如何看待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如何認識和估計近三十年的中國的『改革開放』」、「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如何認識『無產階級專政』、

78 顧準：〈我的反動世界觀和反動政治思想、經濟思想的初步清算〉（1969年3月14日），《顧準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頁327。

79 錢理群：〈中國改革向何處去——2007年的觀察與思考之一〉（2007年1月20日-2月14日），《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頁316-317。

80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313

81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328。

82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28。

83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378。

「什麼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是什麼」等等。我寫有專門的研究文章〈中國改革向何處去〉，文收《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同學們有興趣，可以去參考，這裡就不多說了。

需要略說一點，也是本書結構所要求著重討論的，是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這也是黨內民主派和毛澤東派分歧的焦點之一。趙紫陽及他所代表的老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實踐」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點：「在落後的國家，在發展中國家，取得革命勝利後，不能馬上建立社會主義，必須補資本主義這一課」，⁸⁴而毛澤東的問題正是在於，「過早地結束了新民主主義階段，超越階段地實行社會主義」，⁸⁵就必然「畸形發展，使社會主義變形」。⁸⁶「不是馬克思原來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即建立在大工業基礎上的以工業為主體的社會主義；而是要建立由『農民坐天下』的社會主義，即農業社會主義的理想天國」本來是一個具有濃厚的民粹主義色彩的烏托邦理想，毛澤東卻要用群眾暴力的方式來強制推行，也就必然導致了專制主義。⁸⁷此種對「新民主主義時代的毛澤東」基本上持肯定態度，而對「社會主義時代的毛澤東」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的傾向，在黨內民主派中是有相當代表性的，這背後正隱含著一個基本信念，即堅守他們當初參加革命時的「新民主主義」理想。因此，這一部分黨內民主派更願意高舉「新民主主義」的旗幟。當然，在他們的理解裡，「新民主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是相通的，但因為是來自中國革命歷史自身，也就更具合法性。這也使我們聯想起六十年代的那位農民思想家，他當年提出的「退到新民主主義」主張，在二十一世紀又得到某種回響，當然其背景與意義都已經大不相同，但仍是很有意思的。

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民主派，對毛澤東「富國強兵」的現代化路線也提出了批評，趙紫陽特地指出了「不惜犧牲農民利益，甚至剝奪農民來發展軍事工業」所造成的嚴重後果。⁸⁸這其實也是毛澤東的「農業社會主義」試驗的根本矛盾：既以農民為基本動力，卻不斷損害農民的基本利益。這正是這些

84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86。

85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45。

86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86。

87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123-124。

88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123。

始終與農民保持血肉聯繫的老中國共產黨人，在反思歷史時最感困惑與痛苦的，而且此種對農民的剝奪，在現實生活中還在繼續，這也是他們最終要和毛澤東及其體制決裂的一個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毛澤東派的對峙中，特別是感覺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現實威脅，使得近年來黨內民主派加強了對毛澤東的批判力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上、下兩卷)，此書於2007年在香港出版，2008年、2009年都連續重新增訂註釋出版。其最引人注目之處，在於明確作出「毛澤東過大於功，倒三七開，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的評價。作者提出，在歷史發展的「機遇期內必須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是重新評毛。尊毛的意識形態，反毛的經濟政策，這種『打左燈向右拐』的機會主義組合可以苟安於一時，但早晚要翻車」，「當務之急是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向人民群眾特別是年輕一代說清楚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的來龍去脈，回頭看看那個『左』禍肆虐，生靈塗炭的時代，揭穿毛澤東的假馬克思主義，奪回話語權，使毛澤東的空想社會主義在中國徹底失去號召力」。⁸⁹這大概也是許多黨內民主派的一個共識。他們顯然對於他們所認為的「美化毛澤東時代」的傾向，充滿焦慮與警惕。

再回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來，該書提出了超越「主義」的「社會進步新指標」，⁹⁰這或許是更值得注意的。可以說，這正是對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之歷史經驗的總結。按照預設的「理想社會模式」來強行計劃社會的發展，按照未加檢驗、未加反思，因而成為先驗的理論觀念、邏輯來指導社會發展，並且以是否符合「主義」作為衡量社會實踐的標準，此種烏托邦的、強制性的「社會主義實驗」，是曾經帶來災難的，這正是毛澤東時代最大的教訓。趙紫陽還指出：「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什麼理想的社會模式，也沒有固定的模式」，「今後社會的發展，不應從什麼模式出發，也不宜以什麼主義來劃分」，⁹¹而要「根據實踐發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更根據民意一步步向前發展」。正是從「實踐」和「民意」(趙紫陽說，「民意就是人們內心裡真正追

89 辛子陵：〈導言：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頁 xlv-xlvi。

90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 30。

91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 177。

求」)⁹²這兩個「根據」出發，趙紫陽提出了他的「社會進步新指標」，即「以生態環境即生活品質，文化水準即人的素質，生活水準即富裕程度，以及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差別、城鄉差別、勞動生產率、經濟效應、人均收入、社會公平等為指標，不以社會制度如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為界線來作為先進與否的指標」。⁹³這樣的新指標，顯然是以人自身的健康、全面發展為中心的，注重人的生活環境、人的素質、人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人的社會地位、人際關係的良性、優化發展。它超越「主義」，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種「融合」，這也使我們想起了顧準當年提出的「東西方滲透」理想。它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在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再度提出，是很有意思的。我把它稱為「中國改革新思維」，或許可以為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選擇，提供一個思路。

五、調整與堅持：執政者的回應和選擇

人們不難發現，黨內的毛澤東派和民主派，都是針對鄧小平的改革路線所帶來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危機所作出的不同回應，分別從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提出了修正，並給出不同的發展路徑。

問題是，黨的最高執政者對客觀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危機帶來的執政危機，以及黨內針鋒相對的兩種意見，又作出怎樣的回應與選擇。

在我看來，最高當局的回應，集中在三句話上。

第一句話是保證「黨的執政地位」；⁹⁴這在2009年又有一個新的說法：「黨的事業至上」。⁹⁵這就是趙紫陽所說的，「當政者目前一切是保衛維護一黨專政，這一點，在他們看來絕對不能動，這是一切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其他都

92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327。

93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30。

94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95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司法體制改革成效〉，《人民日報》2010年2月22日，第1版。

是虛的」。⁹⁶ 同學們可能還記得，我曾經談到兩個俄國人對中國幾代領導人的影響：赫魯曉夫是毛澤東、鄧小平揮不去的夢魘，而當今中國最高領導怎樣也擺脫不了戈爾巴喬夫的陰影——絕不能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權在自己手裡失落，這是胡錦濤的底線，也是對他年輕時候的誓言：「絕不能把先輩們流血犧牲得來的革命果實從我們手中丟掉」⁹⁷的一個兌現方式吧。

第二句話是：「牢牢地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繼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⁹⁸ 這是對毛澤東派要恢復「以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毛澤東路線的一種拒絕，也顯示了這一代領導人務實的一面：他們深知，真要搞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繼續革命，必然天下大亂，黨的統治也將毀於一旦。

第三句話是：「絕不走改旗易幟的斜路」，⁹⁹ 這是對民主派的民主社會主義的拒絕，他們還是要高舉毛澤東的旗幟，特別是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這是黨的「核心利益」，是絕不能放棄的。

三句話合成一句話，就是「不折騰」。¹⁰⁰ 既不回頭搞階級鬥爭，也不往前真正推進社會民主、結束一黨專政，依然在鄧小平改革路線的框架內，在維護「六四體制」的前提下，來應對越來越嚴重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危機。

於是，又有了「調整」與「堅持」這軟、硬兩手。

首先是「調整」。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面對「發展就是一切」的發展觀所帶來的經濟發展失衡，資源、生態大破壞等危機，作出經濟改革與發展方向、方式的調整，提出「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國策」。¹⁰¹

96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頁349。

97 胡錦濤：〈生動的一課——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座談音樂史詩《東方紅》〉，《人民日報》1964年11月6日。

98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99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100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101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

其二，面對日趨嚴重的兩極分化和民眾日趨激烈的反抗，作出各階層利益關係的調整，提出「以人為本」、「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提高效率與促進社會公平結合起來」等理念，對長期奉行的「富國強兵，剝奪農民」的發展路線有所修正，並採取「城市反饋農村」、「廢除農業稅，減輕農民負擔」、「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相應措施，要求權貴資本階層作出某種讓步，以緩和社會、階層矛盾。¹⁰²

其三，面對鄧小平單一的經濟改革所帶來的政治、社會、思想文化、道德危機，迫於強大的社會壓力，提出了全面推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體制改革的目標，並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¹⁰³

對以上三個方面的調整，我想作三個方面的評價。一方面，不可否認其積極意義，應該說，這樣的調整符合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像廢除農業稅、城市反饋農村，都是帶有歷史性的，也給民眾帶來了一定的實際利益，因此得到老百姓支持，從而不同程度上加強了黨的執政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六四體制」不變的情況下，這樣的調整必然受到極大限制，並不可避免地會發生變形、變質。而我要強調的是，這些調整，並非執政者的恩賜。首先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勢之所至，那樣一種依靠所謂「低人權優勢」和「資源、生態大破壞」的高速發展是不可能持續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必然受到底層民眾、普通工人、農民、農民工越來越強烈的反抗和抵制，這就迫使既得利益集團不能不作出某種讓步，對執政者來說，這也是保證其執政地位必須作出的讓步。也就是說，所謂「調整」，實際上是各階層、各利益群體之間，民眾與執政者之間相互博弈的過程和結果，而且也只有依靠利益受損一方的長期反抗、鬥爭，不斷對執政者施加壓力，才有可能堅持調整，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02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103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並保證調整向有利於普通民眾、弱勢群體的方向發展。

執政者還有「堅持」的一面，在我看來，有三個「絕不讓步」。第一，絕不給民眾以實質性的言論、出版、結社、集會、遊行的自由，尤其是絕不允許反對黨的存在。第二，黨必須對軍隊實行絕對的控制、領導和指揮，這是防止內亂(黨內之亂與社會之亂)的根本，也是制止內亂的最後手段，絕不允許軍隊的國家化。第三，黨必須管幹部，即堅持等級授權制：一切幹部的權力都由上級黨組織授予，並可隨時撤換，這樣的逐層依附關係，是「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維護黨中央的絕對權威的基本保證。以上三條「堅持」，都是毛澤東的「五七體制」和鄧小平的「六四體制」的核心，目的是要保證黨成為「唯一者」：輿論的唯一控制者、軍隊的唯一控制者、權力的唯一控制者，而且是唯一具有實際意義的組織，也就成為唯一的可選擇者。這五個「唯一」正顯示了一黨專政的極權體制的實質，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所標榜，亦被一些知識分子極力美化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質性內涵。這是中共的命根子，是執政者不允許有任何鬆動的底線。

人們還注意到最近幾年執政思路的變化。2008年舉辦奧運會前後，中國的經濟崛起，特別是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都大大加強了執政者在意識形態和體制上的自信心。於是，在總結所謂奧運會的經驗基礎上，便提出了建立和強化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制」之發展、治國路線。這其實就是毛澤東「大權獨攬」的極權體制的發展，毛澤東就是依靠此獨攬大權的體制，集中力量辦了大躍進、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這一系列大事。其所造成的災難，早已被強迫遺忘，今天在一些知識分子的幫助下，又作為新的神靈重被祭起。這樣的舉國體制，在指導思想上強調黨國至上，在意識形態上強調服從國家整體利益，在組織領導上強調絕對服從，在組織和動員方式上強調軍事化，在社會管理上強調全面控制，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戰備體制，這在毛澤東所創建的依靠戰爭贏得權力、又用戰爭的方式治理國家的體制裡，是自有傳統的。因此，舉國體制的重新強調本身，就顯示了向毛澤東時代靠攏的趨向。

可以看出，最近幾年，無論是2008年的汶川救災、舉辦奧運會，2008年以來處理經濟危機，2009年舉辦國慶盛典，2010年舉辦世博會、亞運會、抗洪救災、舟曲救災等，都無一不是自覺地發揮舉國體制的威力。應該說，

在處理危機事件時，包括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公共衛生危機、自然災害，因為都是非常時期，國家處於「類戰爭狀態」，此種戰備性的舉國體制，可以取得短時期的高效率，似乎很有優越性；但如果以此作為治國路線、發展模式，並要將其常態化與制度化，則是十分危險、貽害無窮的。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教訓，無論怎樣遮蔽，都仍是客觀存在，足以警示今人。

而且我們發現，在自覺推行舉國體制的努力中，出現了三個特別值得警惕的傾向。一是重新強化最高領袖的絕對權威，試圖重新恢復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的強人政治（儘管限於主客觀條件很難做到），奧運會、國慶大閱兵等場合，都成了突出領導者個人、獻忠心的大好時機。這正是意味著向毛澤東時代的第一書記專政靠攏。其二，是強化黨的思想、輿論控制，特別是網絡的控制，而且越來越自覺地用立法的方式來實行合法的控制。同時進行的是重建意識形態的努力，其特點有三，（1）以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國家主義作為核心價值。（2）提倡復興傳統，從傳統中獲取統治合法性的資源。（3）是鼓吹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將所謂「中國模式」理論化與普世化。在這三個方面都得到一些知識分子自覺、不自覺的配合。可以看出，這些年當局在意識形態宣傳上，是越來越具有主動性地進行強勢出擊，一面猛批普世價值，一面又向世界輸出中國軟實力，這其實也是向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輸出靠攏。其三，強化社會控制，即所謂建立「打防結合，預防為主，專群結合，依靠群眾」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這實際上就是要恢復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專政。以上三個方面，都表明了執政者有限度地向毛澤東時代回歸的意向。

這樣的意向，其實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全球經濟危機導致國際多元化格局出現，本來是提供了一個進一步實現前面所提到的東西文化相互吸取、融合的歷史機遇，但我們這裡卻陷入民族狂熱，在「走自己的路」的旗號下，猛批普世價值，拒絕向西方學習，並在對自己的發展道路（包括毛澤東時代）缺乏反思的情況下，強化舉國體制，把即使可能有的某些長處，也推向極端而走向反面，以為這是發揮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但其實預伏著更大的危機。

問題是，此種有限度地向毛澤東時代回歸的趨向，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前面提到部分民眾中對毛澤東時代的懷念、民粹主義思潮的復興、黨內毛澤東派的興起，以及部分知識分子對毛澤東式的中國道路的推崇，青年毛

澤東主義者的出現，都是必須正視的現實，這裡糾纏著許多複雜的理論、歷史、現實問題，不可以簡單對待。或許正因為如此，如何科學地評價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就成為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術界爭論的一個焦點，是一個不可回避的理論的、歷史的、現實的課題。或許也是我們要開設這門課的一個主要動因和意義吧。

最後，我們還是要回到中國當下的現實問題來。如前所說，中國今天的執政者採取「既調整又堅持」的對策，這本身就存在著不可克服的矛盾：調整，就要一定程度限制既得利益集團，首先是權貴資本階層的利益；堅持，就是要強化已經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的各級黨和政府的權力。今天的執政者面臨著政令不通、任何改革在推行過程中都會變形、變質等一系列的困境，都是根源於這樣的內在矛盾，也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學者所說的「尺蠖效應」的原因所在：「就像那一放一縮卻只朝著一個方向移動的尺蠖，我們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減少，但福利卻難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縮，但自由卻難以擴大。一講『小政府』，官員就推卸了責任，但權力依然難以限制；一講『大政府』，官員就擴大權力，但責任仍然難以追問。『右手』大動，公共資產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產並無多少保障；換上『左手』，老百姓的私產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財產仍然看守不住」¹⁰⁴無論怎樣改革，採取什麼政策，獲利者永遠是權力的掌握者，權力的資本化越來越體制性的、不可逆轉的。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於研究者所說的「作為改革主體的執政黨已經對改革缺乏集體共識」。如論者所描述：「領導層現在就好像一個『救火隊』，被動地被社會或者社會問題推著走，哪裡著火就出現在哪裡。這種被動性必然出現更多的問題，使得改革面臨更大的困難。執政黨作為一個集體往往對重大改革問題失聲或者保持沉默。人們所聽到的只是個別領導人的微弱聲音」，而且彼此矛盾。¹⁰⁵在我看來，這樣的矛盾與失聲，其實就是當政者在鄧小平路線已

104 秦暉：〈「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本文原刊載於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電子報第1254期。但該網站上目前本文刊載不全，故轉引學術批評網，2011年7月27日取自，學術批評網：<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12&ctype=1002>。

105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路徑及其走向〉，《炎黃春秋》2010年11期，頁5。

經走不下去的情況下，還想採取「既堅持又調整」路線所必然遇到的尷尬與困境。

於是，就出現了社會學家所說的「中國正在加速走向社會潰敗」的危機。社會潰敗的核心，就是「權力的失控」，「權力成為不但外部無法約束而且內部也無法約束的力量」，「地方性權力、部門性權力已經成為既無上面約束，又無下面監督，同時還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這就意味著「強勢利益集團已經肆無忌憚」，「腐敗已經處於失控和『不可治理狀態』」。由此導致的是整個社會的潰敗：「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社會的信息系統已經高度失真」，「社會失去進行長遠思維的能力」，「眼前的權力與利益分配就是一切」，最後就造成了「社會認同和社會向心力在急劇流失」。¹⁰⁶ 全社會——社會和政府、資本之間，社會上、中、下層之間，各階層內部彼此之間——都陷入了深度的不信任，充斥著不滿和怨恨。這種結構性的社會危機，才真正致命。與此同時，民族問題逐漸突現，這幾年連續發生的西藏、新疆地區的騷亂，都為全國、全球所矚目。民族問題比較複雜，我對此沒有專門研究，只能把問題提出，無法展開論述。

這就是當下的中國：一面在快速發展，一面卻危機重重——誇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國的真實。

我在很多場合都談到這樣一個看法：當今的中國，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在經過建國後60年的努力，基本上實現了國家的獨立、統一，基本上解決了13億人口的溫飽問題，並在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以後，將「向何處去」？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問題，也同時是世界的問題；「中國走向何方」，不僅影響中國的未來，也關係著世界和人類的未來。

這事實上已經成為一切關心中國與世界發展的人們正在思考的中心，也是人們爭論的焦點。在我看來，前面所討論的，無論是毛澤東派主張「回到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為中心的繼續革命的路線」，部分知識分子所鼓吹「集權為民」的「中國模式」、「中國發展道路」，還是〈零八憲章〉運動倡導的「憲政民主」，黨內民主派高揚的「民主社會主義」，趙紫陽等老共產黨人提出的「超越」主

106 孫立平：〈中國正在加速走向社會潰敗〉（2010年4月1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中華網：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2713/17/51/6_1.html。

義』的社會進步新指標」，都是對「中國何處去」問題的回應。在理論旗幟的背後，是各種利益群體的博弈；¹⁰⁷而更多的民眾，則以行動作出自己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當下的中國，正處於空前活躍的狀態，未來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這讓許多人感到焦慮，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又具有多種發展的可能性。這或許是一種混亂，又未嘗不可視為一種發展的生機。

越來越多不同階層的人們，越來越不滿意於現狀，於是，開始思考，爭論，聚集，行動——或許這就是中國的希望所在。歷史畢竟是人創造，由人民，也是由我們每一個人書寫的。

2010年8月13日寫畢，2010年12月30日修訂，2011年7月16日定稿

編註

- i 基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或譯堅尼係數、吉尼係數，是20世紀初由吉尼(Corrado Gini, 1884-1965, 義大利)，根據經濟學家馬克思·勞倫茨(Max Lorenz, 1876-1959)所提出的收入分配曲線——勞倫茨曲線(Lorenz curve)所定義的，一種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此係數以比例數值表示，介於0和1之間。
- ii 維權運動：又稱「中國維權運動」或「中國人權運動」，是指中國大陸人民維護基本權益的自發運動，主要訴求是在中國現行法律下，要求法定權利得到保障和反抗權利受侵犯的事件。維權運動約於2000年後開始出現，在2003年逐漸成形，民眾透過遊行、法律控訴及媒體曝光等，挑戰政府或大企業的權限，以維護自身權益。運動最初多維護消費者權益、業主權益，後來已觸及公民政治權利等政治禁區。
- iii 群體性事件：指社會群體與統治當局的衝突與對立，多為社會底層為爭取自身權益，而與統治階層進行對抗，或因統治階層不當行為觸怒民眾，引發與統治階層衝突與對立。
- iv 「天安門母親」運動：由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六四事件」死難者家屬丁子霖(1936-)等人發起，連同一群在六四天安門事件中遇害者的母親組成。主張要求中共平反

107 有研究者指出當代各種社會思潮與社會階層的對應關係：「大體上看，追求自由與個體權利的自由主義思潮，確實在中產階級中有相當多的支持者。強調秩序與穩定的新權威主義，在官員與大企業家中有更多的贊同人。呼喚平等與社會公正的新左派則在青年一代而不是中老年人中，有許多支持者。[……]新左派中的激進派或民粹主義派，在中西部地區的底層弱勢群體與『憤青』中有許多支持者。在70後的知識型白領、中產階層、企業家中，文化保守主義有比較大的影響。民主社會主義在飽經政治風霜的老幹部中有相當多的支持者」。這樣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火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頁75。

- 八九民運，呼籲徹查及公布「六四」事件，並向死傷者家屬和公開道歉。
- v 上訪：或稱「信訪」(即「來信來訪」的簡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有的政治表達及申訴方式。按照官方定義，信訪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採用書信、電子郵件、傳真、電話、走訪等形式，向各級政府、或者縣級以上政府工作部門反映冤情、民意，或官方(警方)的不足之處，提出建議、意見或者投訴請求等等。為處理信訪事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辦公廳專門設立有國家信訪局，各級政府、人大及政協也設有信訪辦公室。
 - vi 支農：指城市裡的志願者通過各種方式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公益性活動。
 - vii 支教：指支援落後地區鄉鎮中小學校的教育和教學管理工作。
 - viii 兩手都要硬：「兩手」指中共宣布的「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側面，即「改革開放」和「堅持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黨的領導、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社會主義道路與無產階級專政)；「兩手都要硬」指在這兩方面都要嚴格徹底執行。
 - ix 中共十七大：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007年10月15日-21日於北京召開。大會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大會確定了「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並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為重要指導思想。
 - x 毛澤東主義共產黨：2008年5月宣告成立，其綱領是要反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的「修正主義路線」，要求全面回到毛澤東時代，目前只見於網上活動。
 - xi 中國工人(共產)黨：2009年8月宣告成立，提出「無產階級兩黨制」，目前只見於網上活動。

後記

本書是我2009年9月至11月在台灣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給研究生上課的講稿：課前我自己寫了詳細的文字稿，講完後，又由學生整理出錄音稿，我再修訂成初稿。三個月下來，居然積有近30萬字。2010年，我又集中了一年的時間，除了將當時來不及講的最後三講補寫出來以外，還把多年積累在手頭上的毛澤東著作和相關的研究論著重讀一遍。在原有的框架、結構內，作了大量的補充，力圖展現毛澤東的方方面面，使論述更加複雜，內容更為豐富，同時盡可能地吸取海內外相關的研究成果，以增加論述的深度與厚度。為此，加添了大量的註釋，也增大了篇幅，最後達到現在超過70萬字的篇幅。儘管仍有未盡意之處，但已經到了年底，無論如何也要交稿了。就寫此「後記」，藉機「打住」吧。

按理說，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就寫出了這麼一本厚厚的書，速度是夠快的了，我自己也有些吃驚，這完全是意外的收穫。但細想起來，其實為了寫這本書，我已經醞釀了25年，也準備了15年。這裡，就不妨說說這本書的寫作經歷、過程吧。

1994年，我寫過一篇研究筆記，題目就叫〈我為什麼要研究毛澤東，打算怎樣研究毛澤東〉，文章一開頭就這樣談到研究的緣起：「在決定一生道路的青年時代，我的精神導師有二，其一為魯迅，其二即是毛澤東。因此，在我寫完了《心靈的探尋》，對『我』和『魯迅』進行了基本的清理以後，我的心就轉向了毛澤東，渴望著對『我』和『毛澤東』這個更為基本的自我人生命題進行一次清理。也就是說，寫作本書的最初衝動是產生於1985年。¹但那時，我

1 1985年這一年，我在連續為北大中文系1981、1982、1983、1984級學生開設「我之魯迅

自覺還沒有足夠的精神力量來作這一工作，或者說，自覺這樣的工作，對於我，以及對於思想文化界的意義特別重大，而當時主客觀條件似乎都還不夠成熟。這樣，內心的衝動，一壓就是十年」。²記得當時因為覺得獨自一人難當此重任，曾邀約安順的老友杜應國君合作，他也作了一些準備。但最終還是擱下了。

再次引發研究衝動，已經是1989年：「那個難忘的夏天的一個晚上，中國和我自己都仍處於血腥鎮壓之後的恐怖中。我的面前，放著兩個歷史時期的兩份文件：七十年代毛澤東和蒙哥馬利元帥的講話與八十年代末(1989)鄧小平和中央軍委的談話。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我當時怎麼會把這兩個文件放在一起的；但我記得很清楚的是，同時閱讀這兩個文件所產生的震動：我發現，儘管人們已經千百次地宣布『毛澤東時代』的結束，但兩個時代，兩個領袖人物——毛澤東和鄧小平，其觀念，思維方式，行為方式，以至語言，却是驚人的相似。我當時順手寫下了所感覺到的這種內在與外在的一致，但現在却找不到了這張紙條，或者在某一個恐怖的瞬間將其燒毀，或者隱藏在不知何處，但結論却始終沒有忘記：並不存在所謂『新時期』，我們仍然生活在『毛澤東時代』，「今天的中國領導人所執行的，仍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路線，所謂『中學』就是『毛澤東文化』，包括毛澤東所建立的以黨為核心的一體化的社會組織結構，和被稱為『毛澤東思想』的統一的意識形態；而『西學』不過是西方的技術，現在又加上的西方的管理經驗」，「事實上，在八九政治風波以後，所謂『後毛澤東時代』已經呼之欲出」，「1978年以後的中國思想解放運動的一個最大失誤，就是沒有明確提出並進行對於毛澤東思想、文化的科學批判，而這一歷史任務不能完成，則將長期地禁錮中國思想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我們遲早要補上歷史的這一課」。³這樣一來，研究毛澤東，就不僅是我個人生命的需要，更是對時代所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

但也只有在1994年，當我有機會到韓國外國語大學任教一年，有了時間

觀」選修課的基礎上，整理出了《心靈的探尋》。

- 2 參看錢理群：〈我為什麼要研究毛澤東，打算怎樣研究毛澤東〉(1994年12月10日-12日)，未刊稿。
- 3 參看錢理群：〈我為什麼要研究毛澤東，打算怎樣研究毛澤東〉(1994年12月10日-12日)，未刊稿。

與空間的距離，以及現實與心理的距離，才有可能正面地來處理這一歷史研究課題。在這個意義上，我是在韓國開始進行毛澤東研究的，我因此對當年邀請我講學的朴宰雨教授等韓國朋友，懷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但我選擇毛澤東作為研究課題，還是有一些心理負擔，也有朋友善意提醒我，要考慮這一研究在政治與學術上的風險。早在1993年，我54歲生日時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我知道我的選擇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我是在為未來研究，寫作。這幾乎同時決定了我的命運。我不僅因此選擇了寂寞和孤獨，而且選擇了局限性。正如一位朋友所指出的，我不僅要受到材料的局限，我將在大量事實材料被封鎖與歪曲的情況下從事我的研究；而且要受到自身眼光和方法的局限。因此，儘管我竭盡全力去研究，我的研究成果在後人眼裏，其科學性是極其有限的。但我仍然堅信，即使是這樣，我仍然有僅屬於我自己的價值，就像唐人選唐詩，同代人的某種感受、體驗、觀察與理解，是後人不可能重複的。因此，我應該自信，自尊，自重，堅持自己的選擇，不為外界的種種干擾而動搖。同時，我也應該有自知之明，絕不將自己的選擇絕對化。仍然是馬克思說的那句話：走自己的路！⁴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選擇毛澤東研究，是明知其失敗，或明知其侷限性，但仍然要硬做：這可說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也是一種「反抗絕望」吧。

這樣，1994-1995年間，我在韓國外國語大學的專家公寓裡，開始了毛澤東研究。我的第一步工作是閱讀毛澤東的原作，以及已經出版的有關毛澤東的研究著作，我記得大約有1,000餘萬字，並作了相應的筆記。最後，「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又考慮到研究課題的尖銳性，預計未來公開出版時，不可能暢所欲言；更懷著發生突然事故，寫作計劃不能開始或完成的隱憂」，我還寫了前面提到的〈我為什麼要研究毛澤東，打算怎樣研究毛澤東〉的長文。這篇文章寫到我當時思考所達到的某些結論，在本書〈導言〉與相關部分多有涉及，這裡不再重複。

4 此日記也為〈我為什麼要研究毛澤東，打算怎樣研究毛澤東〉一文所摘錄。

我著重要說的，也是當時考慮最多的，是對研究方法的設想。文章這樣寫道：「從一開始，我便確認，要用我的方法，也即從《心靈的探尋》就已經開始的方法，抓住毛澤東的『基本單位概念』來進行研究。最初開列出來的，計有：1，黨；2，軍隊，戰爭；3，人民(卑賤者，農民，痞子)；4，民族；5，烏托邦，理想；6，群眾，群眾運動，群眾路線；7，鬥爭，革命，專政；8，實踐(知與行，知識，理論)；9，改造；10，精神，意志；11，浪漫主義；12，歷史」。並作了如下說明：「以上都是毛澤東時代最大限度地普及了的觀念、觀念，它支配、規定著歷史的發展，決定著國家、民族、人民的命運，並且已經深入幾代人的心靈深處，習以為常。今天應該拉開距離，作歷史的反思，揭示其內在的真實意義與作用」，「不僅注重毛澤東本人的論述，而且注重毛澤東本人的實踐，以及在他思想指導下中國的實際生活，即他的理論的群眾實踐活動，也即理論命題的對象化過程，從思想命題的展開與現實化中來反觀原始思想命題中內蘊的多重因素」，「而且要揭示毛文化的這些基本概念、理念，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各自在毛思想文化體系、總體結構中所處的地位」。⁵

從韓國回到北京後，我又作出了整體設計：書名定為《毛澤東：世紀中國遺產》，共分二部。「第一部：中心詞的轉移——講述毛澤東(我們的時代，以及我自己)的故事」，其寫作要求與設想是：「1，歷史的，與心理的描述，歷史的細節的感性呈現；2，毛的故事為主，也講一點時代故事，以及我的故事：彼此的互動——敘事的隱與顯，主與次，主體與客體，現實語境和歷史語境；3，一邊講述，一邊質疑。如實地留下空白，揭示矛盾和袒露困惑，建立『坦誠』的新規範——敘述的顛覆性；4，平靜而從容的敘述調子，內蘊著歷史的激情與蒼涼感。——回憶式的」。接著，「第二部：中心詞透視——解析毛澤東(我們的時代，以及我自己)」，具體寫作要求與設想是：「1，詞語的政治學、哲學、倫理學、心理學、語言學、文學……綜合分析；2，理論意義和實踐後果的雙向考察與揭示；3，縝密的解剖(層層剝繭式)與冷靜而犀利的剖析(正視後果，不回避一切)；4，對毛話語的批判，也就是對我們時代話語的批

5 見錢理群：〈我為什麼要研究毛澤東，打算怎樣研究毛澤東〉(1994年12月10日-12日)，未刊稿。

判，對我自己的批判(以前者為主)——自省式的」。還有「總體風格」的要求與設想：「自由無羈的，不受規範與約束的。——既是思想的，又是文體的，更是心態的，是終於找到的主體與客體的一種契合。曾有『童言無忌』之說，如今兩鬢斑白卻要追求『無忌』。同時又要質疑：真的能『言無忌』嗎？——相對而已！」⁶

以上設計寫在1995年10月，正要著手進行，但11月8日，一個偶然的約稿，使我改變了計劃，轉過頭來寫《1948：天地玄黃》一書。儘管那本書的寫作，我也準備了很久，但突然擱置毛澤東研究與寫作，也是出乎意外。但細想起來仍是事出有因。

原因大概有四。首先還是研究方法的困惑，儘管已經有了以上設想，但真正要落筆，卻感到很困難，有點無從下手的感覺。其二，是我擺脫不了其他研究課題的誘惑。事實上在1994年去韓國之前，我同時關注兩個課題，毛澤東研究之外，還有四十年代的文學與知識分子選擇的研究。因此，當我的毛澤東研究因為研究方法的困惑而難以動筆時，轉而來寫1948年歷史轉折點上知識分子的選擇，也順理成章了。其三，我更無以擺脫對現實的強烈關懷。因此，在1996年寫完了《1948：天地玄黃》以後，我並沒有回到毛澤東研究。從1997年開始，我直接介入了當下的思想、文化、教育的民間運動，而研究的興趣，也轉入更具有現實迫切性的課題，逐漸集中到對毛澤東時代的民間思想和民間反抗運動的研究、毛澤東時代的知識分子命運的研究，以及對當下社會(也即「後毛澤東時代」)的觀察、評論、研究。現在看來，我的這些研究，表面上似乎遠離了對毛澤東個人及其思想的研究，但卻極大地擴展了研究視野，實際上是對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進行了更具體、深入的考察，這當然也就加深了我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理解與把握：原來，我始終沒有離開毛澤東，他一直是我的關注的中心。

其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紀初，將毛澤東研究擱置，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當我從韓國回到國內，就不能不面對中國的現實：一方面是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正是毛澤東所嚮往、追求的；另一面卻是兩極分化

6 見錢理群：〈毛澤東：世紀中國遺產〉(總體設計)(1995年10月草擬，1996年9月定稿)，未刊稿。

日趨嚴重，這又是毛澤東當年曾經想竭力避免的。然而，以損害勞動者的利益為代價的「富國強兵」路線，又恰恰是從毛澤東那裡繼承、發展而來的。這樣一來，我所面對的當下中國社會(我稱之為「後毛澤東時代」)與「毛澤東時代」的關係，就遠比我當初的認識、理解要複雜得多，不僅有繼承、發展(這是主要的)，同時也有背離。如此，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時代的評價，以及對其當下意義的認識，也必然要複雜化，並且至少要跳出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模式；這也就意味著，我必須要從更高的角度，重新審視我自己與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與此同時，如何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及毛澤東時代，以至後毛澤東時代，也越來越成為九十年代末以來，中國政治、思想、文化、學術界關注與爭論的焦點，並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分歧。當我意識到，這樣的爭論與分歧，實際上和每個人在中國現實生活中的選擇，以及每個人對現行體制的認識、態度、相互關係，直接聯繫在一起的時候，我又產生了重新研究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衝動，而這樣的研究又必須是和後毛澤東時代的研究聯成一體的——更準確地說，這已經不是衝動，而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責任。

但我面對這樣的責任時，又不能不多有猶豫。這也有兩方面。最主要的，自然是我對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認識與評價的猶豫不決，我在本書〈導言〉裡已經說過，這裡不再重複。另一方面，是我始終找不到適合的結構方式與敘述方式，而我對寫作形式問題又極為重視，若形式問題不解決，即使材料準備好了，也無法動筆。我也曾經試圖做過一些嘗試。大概在2004年左右，我重拾1995年寫的那份設計書，想在其基礎上作一點變動：不全面鋪開，而只集中在1956-1966這十年，因為我認為這是建國以後毛澤東獨特思想形成的時期，我曾對有關的材料作逐年梳理，但這也只作了兩年就沒有繼續下去。這樣斷斷續續的寫，我卻越弄越沒有信心，後來就死了心，準備完全放棄毛澤東研究，以為這將會是我學術生涯，以至人生的最大遺憾。

沒料到，經過台灣友人陳光興先生的努力，我突然有了一個到台灣講學的機會，我這十數年來的夢想就又死灰復燃了。當陳光興先生專門到我家來討論講學內容時，我立刻想到，如果要讓台灣青年了解大陸的歷史與思想文化，最佳切入口無疑是魯迅與毛澤東。於是我決定同時開設兩門課：在清華大學給大學生講魯迅，在交通大學給研究生講毛澤東。但這也把我自己「逼上

梁山」了：在倉促間，我只能把這15年所積累的全部材料都帶到台灣，在臨行前又逼出了一個「講課提綱」。這樣一逼，卻逼出了靈感：長期困擾我的結構與敘述方式，突然有了一個可操作的方案，或者說，我終於找到了最適合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歷史書寫方式，這正可說是「眾裡尋它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關於終於成型的這本書的結構、敘述方式，我在〈導言〉裡曾有過交代：「我試圖建立一個三維講述空間：上層的毛澤東空間，中層的知識分子空間，底層的我和民間思想者、普通民眾的空間，從他們三者的互動中來講述這段歷史」，⁷「我想把毛澤東的故事，知識分子的故事，民間思想者的故事，普通民眾的故事，以及我的故事，放在同一時空中來講述」，⁸「不僅敘述歷史過程，而且盡可能地揭示歷史當事人的心靈世界，講毛澤東的內心矛盾，更講毛澤東極權體制下人的心靈傷害，思想迷誤，精神掙扎，以及背後隱含的人文問題」。⁹這裡，再作一點解說與發揮。

迄今為止，幾乎所有關於這一段共和國歷史的敘述與展開，可以說都圍繞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活動，這自然有充分的理由，尤其是中國這種高度集權的國家，毛澤東和黨的意志、思想、政策，在歷史發展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但若僅將中心放在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因此而完全忽略或抹煞普通民眾的意志、思想、活動，卻會造成歷史的遮蔽。尤其是毛澤東治國的最大特點是注重群眾的動員，以及強調群眾運動的作用，儘管毛澤東時代的群眾基本上是處於「被動員」狀態、是高度組織化的，但普通民眾依然用各種方式，頑強地表達自己的獨立意志，對高層決策發揮著自己的制約作用。因此，講述毛澤東時代，就不能只講毛澤東這樣的歷史「大人物」的故事，還要講述普通民眾，尤其是中國農民這些歷史「小人物」的故事。但由於「沉默的大多數」話語權的缺失，留下來的材料極少，我也只能利用有限的史料竭力恢復他們的歷史地位。比如，在講述大饑荒時代的歷史，就以「底層農民的聲音」作為敘述的起點，然後再依次講到「黨的中層、上層的反應」，

7 參看本書〈導言〉，頁22。

8 參看本書〈導言〉，頁22-23。

9 參看本書〈導言〉，頁23。

最後寫到「毛澤東的決策」，雖然這僅是一個嘗試，但卻反映了我的歷史觀。

民間的異端思想與活動，在歷來的歷史敘述中都常常被忽略，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奉行「強迫遺忘」的思想、文化政策，就更是將民間思想強制抹煞。但恰恰是毛澤東時代，由於毛澤東所採取的群眾運動的動員方式，就把許多完全邊緣化的普通民眾也捲入到歷史進程中，並且形成全民的政治關懷，儘管這也是被動參與、並受到嚴格控制，但一旦人們參與其中，一部分人就有可能會產生獨立思想，再加上毛澤東思想中本身就存在著某種異端成分，他在動員群眾時，也有意無意地培育了異端思想者。通常的情況是，這些民間異端最初被毛澤東所喚醒，最後發展到對毛澤東產生根本性的懷疑，就為毛澤東所不容、遭到殘酷鎮壓，從而激發出他們對毛澤東及其所建立與維護的體制的自覺反抗：這樣的「互動」，貫穿了毛澤東時代全段過程，卻在當下關於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述中，完全被遮蔽、抹殺了。我要做的，就是要將「民間異端思想和民間反抗運動史」作為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將其寫進歷史，恢復民間思想者應有的歷史地位。因此，我以極大的篇幅，敘述歷史各階段的民間思想與運動，並將其傑出代表，如民間思想者中的顧準、張中曉、楊偉名、李一哲、陳爾晉、王申酉，民間反抗者中的林昭、林希翎、張志新、張春元、陸文秀……等寫入歷史。

這不僅是盡一個歷史學者的責任，而且也會對毛澤東時代、後毛澤東時代形成新的認識。所謂「民間異端」，就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對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提出與毛澤東和執政黨不同意見和思路。比如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後，當歷史提出「如何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時，毛澤東和民間思想者（顧準、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的參與者）都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毛澤東主張進行有限的改革以鞏固黨的專政，而民間思想者則提出要走一條民主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也因此必須對一黨專政體制要有所突破。最後，毛澤東將民間思想者通通打成「右派」。這段歷史說明，毛澤東的選擇，並非中國社會發展的唯一選擇，也就是說，並非「存在就是合理」，歷史原本存在著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儘管這樣的可能性被毛澤東的強力鎮壓所扼殺，由於種種歷史條件而未能實現，但我們絕不能按照「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否認民間思想者的另一種選擇的歷史合理性。我們在這裡看到的

是，事實上存在著兩個中國、兩條不同的發展路線：一個是毛澤東領導的、占主流地位的中國，另一個則是儘管被鎮壓、被抹殺，卻始終頑強存在的「地下中國」；一條是在現實上實現的毛澤東的發展路線，另一條是與之相對立，儘管沒有現實化，卻存在著合理性的發展路線。而所謂「毛澤東時代」，就是兩個中國、兩條發展路線，相互搏鬥，反抗、鎮壓、再反抗、再鎮壓的歷史過程。即使是我們講的「社會主義中國」，也存在這兩種社會主義思潮——不僅有毛澤東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主義（民間思想者把它命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史前期社會主義」），也還有一個以民主社會主義為主導的民間社會主義。因此，將民間思想者引入我們的研究視野，進入歷史敘述，將會改變並豐富對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之歷史圖景的認識、描述與想像。更重要的是，當我們走出了「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歷史觀陷阱，我們就能發現民間思想者及其思想成果的意義和價值，它能夠成為我們今天重建批判性理論的重要思想資源。

本書也引入了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的故事。而且我的敘述是想強調知識分子在毛澤東時代中，不僅是一群被動的受害者（這當然有事實根據，卻往往被現在許多悲情敘述所誇大），他們同時也是歷史的積極參與者（所謂的參與，包括有所貢獻、反抗，更有許多的依附與屈辱）。由於篇幅的限制，本書關於知識分子的敘述相對比較簡略，以後我會有專著來展開。在每一個歷史時期，我都提到一些知識分子，他們是作為一種思想傾向的代表而進入我的敘述，並不是對其作全面的歷史評價，這也是需要說明的。

或許最引人注目的，是本書所講的「我的故事」，其實我在台灣交通大學上課的講題就是《我和毛澤東、共和國六十年》。研究主體的介入，這本是歷史研究和敘述的大忌，據說這會影響研究的客觀性，而客觀性正是歷史研究最高，甚至是唯一的法則、標準。我並不是在一般意義上否認這樣的法則及其合理性，但如果將此法則推向極端，就會有問題，這正是我在本書寫作中想要自覺地挑戰的，我所追求的是主客體交融的歷史敘述。這首先受研究的性質、特點所決定：如前所說，本書是一個歷史在場者對自己親歷的歷史所做的觀察、研究與敘述，這段歷史對我而言，並不是一個純粹客觀的對象，而是和自己的生命糾纏在一起。我要傳達給讀者的，不僅是客觀的歷史事實，還有特定的歷史情境，以及身處其中的、個人生命的、情感的感受與體

驗。這樣的歷史敘述，就不能沒有「我的故事」。由於「我」在毛澤東時代所處的位置——出身在國民黨高級官員的家庭裡，一開始是個普通的中學生、大學生，之後是邊遠地區的普通的中學教師，後30年又成了北京大學的教授與學者——這就使得我的故事，具有某種典型意義和價值。從這樣一個特定的角度描述毛澤東時代，就會將一般歷史敘述所難以進入、卻並非沒有意義的歷史內容包容進去。比如，在毛澤東領導的革命取得全國性勝利的時候，作為這場革命對象的家庭與相關的個人將會作出怎樣的反應，幾乎是無人關注，甚至被認為是必須忽略不計的；但我卻從這裡開始我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敘述，這至少是別開生面的，而且恰恰是這一點，讓聽我講述的對象——台灣青年深受感動，這段對他們來說本是完全陌生的歷史，就突然和他們的父輩的歷史記憶有了某種關聯。而以後，「我」的日記和原始筆記裡所反映的，作為一個大學生在大躍進年代的態度、心理，以及作為身處底層的中學教師在大饑荒年代、文革前夕以及文革中的種種經歷、觀察、體驗、思考，也引起了台灣學生強烈興趣：他們從中感受到了歷史的個別性、具體性與可觸性，而這些都是為今天許多宏大敘事所忽略，甚至鄙視的。

這裡已經談到了本書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式。我深知自己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來寫歷史研究著作的危險性，因此，我以極大的努力作史料的收集、發掘、鑒別、整理工作，力圖做到獨立的史料準備，不僅大量利用其他學者在史料上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有自己發掘、蒐集的「獨家史料」，這樣就能做到每一個分析、論斷都有詳實的史料作為支撐。我特別堅持一條原則：「面對一切事實」，一旦發現那些「不利於」我的某些判斷、主觀傾向的材料，也絕不回避，或者修正、完善我的論述，或者在註釋裡如實記下，以形成一種張力。這些努力，都是為了保證我的研究的「歷史性品格」。但另一方面，我也試圖適當地發揮文學研究的優勢，以保持某種「文學性品格」——這可能又觸犯了大忌，但我仍想嘗試一番。所謂「文學性」，主要有二：一是注意歷史細節的感性呈現，二是注意對歷史人物（首先是毛澤東）的內心世界（情感、心理、內在矛盾）的揭示和剖析，也就是說，對歷史的關注，首先是對人的關注，個體的人的關注，人的心靈的關注。我以為這都是文學關照世界的方式，現在，我想嘗試將此方式運用到歷史的關照中。其實這樣的歷史性和文學性的結合，本來就是司馬遷的《史記》所開創的中國史學傳統。在這個意義

上，也可以說，本書的寫作，是繼承中國史學傳統的一次自覺嘗試。

這也涉及到敘述語言的問題。總體來說，本書自然要追求嚴謹、準確的學術語言，但同時我也嘗試運用某種隨筆式的語言，保留課堂教學的語言風格——有節制地插入偶發的感觸與感想，隨意拉開又隨時收回的議論，歷史語境與現實語境的交匯……等，這其實是回到當年（1995年）的研究設想：「平靜而從容的敘述調子，內蘊著歷史的激情與蒼涼」。

此外，還有「坦誠」的風格，堅持研究的「自省式」與「顛覆性」：不回避自己面對歷史複雜性的猶豫不決，「揭示矛盾與袒露困惑」。¹⁰比如書中多次談到我評價毛澤東時代所面臨的「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矛盾與困惑等等。也就是說，我寫本書，並不以為自己已經有了對毛澤東時代、後毛澤東時代明確而正確的認識和結論，因而急於向讀者展示、灌輸自以為是的「真理」；而只是向讀者展示我觀察、掌握到的歷史材料，以及我的若干思考，希望和讀者一起來探討、研究這段我認為不可回避的歷史。

最後要說的是，我自己對這本書的估價與期待。前面已經說過，本書，以及我們這一代人，在當下中國的現實和歷史條件下，對毛澤東、毛澤東時代、後毛澤東時代的研究，是一種先天不足的研究。因此，我對本書的分析、判斷，是信心不足的，儘管我也認為它自有價值，比如「五七體制」與「六四體制」概念的提出、概括與貫穿性分析，或許可以為研究毛澤東時代和當下中國社會提供某些思路。我更為看重的，是本書在毛澤東、毛澤東時代、後毛澤東時代研究上所作的研究方法與結構、敘述方式的試驗。因此，在書名中自稱「另一種歷史書寫」，我心嚮往之的始終是「自由無羈的、不受規範與約束」的研究。¹¹當然，我不是要藉此否定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的歷史研究方法和敘述方式，但我確實希望能夠嘗試探討另一種可能性。

在終於可以為本書劃上最後一個句號的時候，我又想起了這些年一直激勵著自己的座右銘：「我存在著，我努力著，我們又彼此攙扶著——這就夠了」。真的，在這一年半的講學與寫作過程中，我是怎樣地「努力」，又得到了多少朋友的「攙扶」啊。我應該感謝我自己，更要感謝所有的攙扶者，特別是

10 見錢理群：〈毛澤東：世紀中國遺產〉（總體設計），未刊稿。

11 見錢理群：〈毛澤東：世紀中國遺產〉（總體設計），未刊稿。

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的劉紀蕙所長，陳光興教授，蘇淑芬、林家瑄、胡清雅、宋玉雯、劉雅芳、翁建鍾、阮芸妍、胡瓊文、詹亞訓、張瑜珊等年輕朋友，聯經出版社的林載爵先生。我要特別致意的，是本書的責任編輯芸妍和清雅，她們的細心與認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一個比較粗心的人，又寫得匆忙，在原稿裡，就有不少疏漏。正是兩位責編的辛勤勞動，嚴格把關，糾正了許多錯誤，讓我既慚愧又感動。不可不提及的，還有海內外毛澤東研究的先行者，我從他們的出色研究成果裡所受到的教益和啟示，使我對這些學術前輩和同行永懷感激和敬意。我還要感謝所有聽課的台灣學生——這樣的特定對象，對我的歷史敘述的內容與方式的影響是非常明顯的；在某種程度上，台灣學生也參與了本書的寫作，這本身就是別有意義的。最後要感謝的是一直在關心、支持我的毛澤東研究的大陸和台灣的朋友們，以及我的老伴——我現在可以向你們交差了。而我自己，完成了毛澤東研究，這一生，就真的沒有什麼遺憾了。

2010年12月23日

（附記）本書完稿後，曾電傳給一些朋友，反饋回來的許多寶貴意見，對我都有很大的啟發。特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幾位年輕的朋友——賀照田、何浩、何吉賢、薩支山、程凱、陶慶梅，他們不但仔細地通讀了全書，進行了多次討論，還和我座談了一天。他們的嚴肅、認真，讓我深受感動：我的書本來就是為中國的年輕一代寫的，現在能夠引發他們的思考和回應，我為之付出的一切，都得到了最好的報償。在回應中，這些年輕朋友也坦誠地提出了他們的不同意見，甚至某種不滿，這也是我所期待的。他們的批評，更讓我看清了自身的不足。我認真地思考了他們的意見，感到本書的寫作上，主要存在兩方面的問題，或者說是存在著兩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是由於本書是一個過程性的寫作，開始只有一個大致的輪廓，對許多問題都採取猶豫不決的態度；但在講課與寫作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某些比較明確的觀點，看法，並逐漸建立起了一個結構，這對於講課與寫作，都是必要的，必須如此的。但將複雜的歷史納入日見明晰的觀念指向與敘述結構裡，這本身又會形成某種自覺、不自覺的遮蔽，把複雜、豐富的歷史簡單化了。我在寫作後期，試圖進行某種彌補，在重新閱讀史料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補充了許多論

述和大量註釋，以便和原來的論述形成某種張力。但由於行文的匆忙，沒有經過更充分的醞釀，更成熟的思考，就留下了許多的疏漏，遺憾，給人以「夾生」的感覺——急於求成，不夠從容，一直就是我治學的致命傷。這樣重大的選題，竟然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完成，這本身就顯得有些孟浪。但正像我多次說過的那樣，對此我也無可奈何，因為有太多太多的研究設想、目標在前方誘惑著我，我只能拼命趕路。因此，我的研究，包括這本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後毛澤東時代的研究，只能是粗線條的，談不上精細，雖有啟發性，也有一定的開創性，卻多有可斟酌和有待深入研究之處，因而只具有「有缺憾的價值」。我承認，這是我的學術的宿命。

最根本的，還是我的學術追求本身帶來的遺憾與問題。這些年輕朋友注意到，我的研究有兩個自覺追求，同時，也就有了兩個陷阱。一是追求「主客體的融合」，用朋友們的話來說，就是試圖「通過歷史的研究，達到自我確認」，而「在自我確認過程中，就有可能模糊歷史形象」。他們因此提醒說，我的「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知識分子」的堅定立場，固然使我的論述，具有相當的力量，以至魅力，但如果將這樣的立場絕對化、靜態化與固定化，會不會帶來一些問題？比如說，因為這樣的批判立場，就將一黨專政的體制及其具體體現的我所說的「五七體制」和「六四體制」作為毛澤東時代、後毛澤東時代的歷史的終極性的解釋，會不會將歷史簡單化？這就涉及我的另一個追求：歷史研究的「歷史感」與「當代性」的結合，這就會帶來的歷史書寫與現實介入的矛盾。最容易落入的陷阱，就是將歷史的事實、材料，納入現實的批判框架內，把「歷時態」變成「現時態」，從而妨礙進入歷史情境，形成某種遮蔽——當然，這只是「可能的陷阱」，而非「必然」，承認與正視這樣的危險，並非否認追求本身的意義與價值，只是提醒我，要注意掌握主體介入與現實批判的「度」，在客體與主體，歷史與現實之間保持恰當的張力，留有必要的餘地，切忌把話說得太滿。因此，在本書最後定稿時，我也就根據朋友們的提醒，對全書的論述作了認真、反覆的推敲，力求掌握好分寸。

在討論中，我也發現，在如何認識這段歷史（包括具體的歷史事件、現象）上，我和年輕朋友之間，還是存在著不同程度的分歧。這也屬正常，是我預計中的。而且在本書公開出版以後，在讀者中可能還會引發更大的論爭。其實，面對歷史，人們總是會有不同的看法與態度，而且又總是和個人的現

實立場相聯繫。不僅研究和書寫歷史的作者如此，閱讀歷史著作的讀者，也都同樣存在著歷史與現實，客體與主體的糾結。這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這就要求，無論作者還是讀者，在討論中都要既堅持各自的基本觀點和立場，又同時認真聽取他人的批評，進行自我調整和修正。我在最後定稿時，也就根據這樣的原則，沒有變動本書的基本論斷與結構，但又作了局部調整和補充，並且期待更多的讀者更嚴厲的評判。

這一切，都應該感謝我的這些年輕朋友，並向本書的讀者與批評者預致我的謝意。在這個意義上，我期待本書是一個開放性的文本，是引發思考和爭論的「靶子」。我們共同的討論對象：毛澤東和毛澤東時代、後毛澤東時代，無論其複雜性，還是豐富性，在中國歷史以至世界歷史上都幾乎「絕無僅有」、「空前絕後」。它絕不是一個人、一本書，能夠一次性把握的，它必然是由歷史的親歷者和後來者，學者和讀者廣泛參與，不斷探討、爭論的一個漫長的，永無終結的認識過程。而且，在和年輕朋友的座談中，我還談到，作為一個中國的學者，我們還有一個歷史責任或雄心壯志：我們要通過對這段內含著最深刻的「中國經驗和中國教訓」的歷史研究與敘述，進一步提升到理論的高度，創造出具有歷史與現實闡釋力的中國批判理論。這對我來說，是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的；而且只有寄希望於年輕一代了。

2011年7月13日補寫

參考書目

一、歷史文本

(一)專書

- 《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毛澤東思想萬歲(1961-1968)》(文革流傳本)。
- 《廣場》(1957年北京大學的學生刊物)(複印件)。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1卷-第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1)。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註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在七大的報告和講話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詩詞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56級13班：《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56級13班班史》(集體編寫，1960)(油印本)。
-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下冊)(北京：內部刊行，1988)。
-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編：《農村·經濟·社會》(北京：知識出版社，1985)。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軍事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 巴金：《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 毛澤東：《毛澤東論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1998)。
- 毛澤東：《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9)。
- 毛澤東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稿》組編：《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
- 牛漢、鄧九平主編：《原上草：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 王民三：《三年困難時期的糧食工作：王民三日記摘錄(1959-1961)》，《貴州糧食》(增刊)(2010年3月)(內部刊行)。
- 王申西：《王申西文集》(香港：香港高文出版社，2002)。
- 王建軍主編：《五八劫：1958年四川省中學生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記實》(自印本)。
- 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委員會編：《北京大學右派分子反動言論彙集》(1957年10月)(內部參考)。
- 北京大學經濟系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編：《校內外右派言論彙集》(1957)。
- 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
- 朱光潛著、朱光潛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朱光潛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 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竹內實編：《毛澤東集補卷》(第1卷-第10卷)(日本：蒼蒼社，1985)。
-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文化大革命」上書集》(香港：泰德時代出版有限公司，2006)。[錢註：本書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於1989年出版大陸版，大陸版和香港版基本內容一致，個別選文有些許不同。]
- 余習廣主編：《位卑未敢忘憂國：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香港：時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2005)。
- 宋永毅、孫大進編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異端思潮》(香港：田園書屋，1997)。
- 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電子光盤(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2002)。
-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 周揚、郭沫若編：《紅旗歌謠》(北京：紅旗出版社，1959)。
- 林希翎：《林希翎自選集》(香港：景順書局，1985)。
- 林昭、張春元、向承鑒等著：《星火》(第一期全文，第二期稿件)，譚蟬雪編著：《求索——蘭州大學「右派反革命集團案」紀實》(香港：天馬出版公司，2010)。
- 胡平、王軍濤等著：《開拓——北大學運文獻》(香港：田園書屋，1990)。
- 胡杰編：《林昭詩集》(打印稿)。
- 徐曉、丁東、徐友漁主編：《遇羅克遺作與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
- 徐曉主編：《民間書信(1966-1977)》(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
- 國家科技部、國家計委和國家經貿委災害綜合研究組編：《中國重大自然災害與社會圖集》(廣東：科技出版社，2004)。
- 張中曉：《無夢樓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6)。
- 張志新：《張志新遺文》(自印稿)。
- 張新蠶：《紅色少女日記：一個女紅衛兵的心靈軌跡(1966-1977)》(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 陸文秀：《陸文秀遺文》（打印稿）。
- 傅雷：《傅雷家書》（增補本）（北京：三聯書店，1994）。
- 童懷周編：《天安門詩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
- 賀雄飛主編：《邊緣記錄：《天涯》民間語文精品》（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
-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 楊偉名：《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趙紫陽：《改革歷程》（香港：新世紀出版社，2009）。
- 劉少奇：《劉少奇選集》（上、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鄧力群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清樣本）（北京：中國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1998）。
-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4）。
- 魯迅：《魯迅全集》（第1卷-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 盧叔寧：《劫灰殘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0）。
- 錢理群：《下鄉日記》（未刊稿，1960）。
- 羅瑞卿：《我國肅反鬥爭的成就和今後的任務》（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8）。
- 譚天榮：《我所理解的馬克思主義》（手稿）。
- 譚放、趙無眠選輯：《文革大字報精選》（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
- 蘇曉康、王魯湘：《河殤》（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金楓出版公司聯合出版發行，1988）。
- 顧準：《顧準文集》（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
- 顧準：《顧準日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 顧準：《顧準自述》（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 顧準：《顧準筆記》（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2）。

（二）單篇文章

- 〈一月革命勝利萬歲——上海人民公社宣言〉（1967年2月5日）。
-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過），《人民日報》（1966年8月9日）第1版。
- 〈人民首都不容麻雀生存——三百萬人總動員第一天殲滅八萬三〉，《人民日報》（1958年4月20日），第1版。
- 〈毛主席到了徐水〉，《人民日報》（1958年8月11日）。
-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人民日報》（1981年8月1日），第1版。
- 〈陸文秀代遺書〉（1970年3月16日）（鉛印稿）。
- 〈革命少數贊〉，見井岡山紅衛兵臨時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臨時總部、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八八總部聯合主辦《井岡山》報選編之《徹底革命，徹底造反——批判資產階級

- 反動路線(二)》(據文革鉛印傳單)。
-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第1版。
-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人民日報》(1967年11月6日)，第1版。
- 《人民日報》本報評論員：〈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人民日報》(1966年6月2日)，第1版。
- 《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人民日報》(1957年6月8日)，第1版。
- 《人民日報》社論：〈今年夏季大豐收說明了什麼？〉，《人民日報》(1958年7月23日)，第6版。
- 《人民日報》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人民日報》(1966年8月20日)，第1版。
- 《人民日報》編輯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人民日報》(1956年4月5日)。
- 《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讓人民群眾切實感受到司法體制改革成效〉，《人民日報》(2010年2月22日)，第1版。
- 《紅旗》社論：〈無產階級專政下進行革命的理論武器——紀念〈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發表十週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編：《紅旗》，1967年第10期。
-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4年2月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誌編輯部：〈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1964年7月14日)(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劉惠明：〈巴黎公社的全面選舉制〉，《紅旗》1966年第11期(1966年8月21日)。
- 劉西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人民日報》(1958年8月27日)專欄「壽張來信」，第3版。
- 吳傳啟：〈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中國青年》1957年13期。
- 周揚：〈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人民日報》(1983年3月16日)，第4版。
- 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人民日報》(1967年9月8日)，第1版。
- 姚文元：〈論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社會基礎〉，《紅旗》1975年第3期(1975年3月1日)。
- 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紅旗》1975年第4期(1975年4月1日)。
- 林彪：〈在接見全國各地來京革命師生大會上林彪同志的講話〉，《人民日報》(1966年11月4日)，第2版。
- 林昭：〈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抄件複印件)。
-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三版)的筆記〉(文革流傳本)。
- 江楓等：〈我們的歌〉，《紅樓》第4期。
- 疾風：〈反對黨的某一個組織就不是反黨嗎？〉，《中國青年》1957年18期。
- 社論：〈全國都應該成為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紀念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三十九周

- 年)，《人民日報》(1966年8月1日)，第1版。
- 胡錦濤：〈生動的一課——工人、農民、戰士、學生座談音樂史詩《東方紅》〉，《人民日報》(1964年11月6日)。
-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 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2月19日)，第1版。
- 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9月23日)，第1版。
- 錢學森：〈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
- 錢理群：〈2009年總結〉(未刊稿)。
- 陳一諮：〈給胡耀邦的信〉(1963年寒假)(油印本)。
- 陳一諮：〈給楊秀峰的信〉(1964年寒假)(油印本)。
- 陳一諮：〈給許立群的信〉(1964年9月)(油印本)。
- 陳一諮：〈給校系工作提幾點意見〉(1965年2月)(油印本)。
- 陳一諮：〈給毛主席的信〉(1965年2月)(油印本)。
- 陳一諮：〈給黨和政府工作提的一點意見〉(1965年2月)(油印本)。
- 陳一諮：〈關於我的一些情況〉(1965年2月)(油印本)。
- 陳一諮：〈讓事實說話——和黃某的關係〉(1965年)(油印本)。
- 陳一諮：〈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和陸平黑幫作不調和的鬥爭〉(1966年8月)(油印本)。
- 陳一諮：〈革命何罪——給首都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第二封信〉(1968年10月)(油印本)。
- 陳伯達：〈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紅旗》1958年第4期(1958年7月16日)。
- 陸文秀：〈關於什麼是毛澤東思想的問題〉(1969年11月17日)(鉛印稿)。
- 陸文秀：〈關於現階段文化大革命形勢的認識〉(1969年11月17日)(鉛印稿)。
- 陸文秀：〈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問題給革命家長和各級領導的一封信〉(1969年11月22日)(鉛印稿)。
- 陸文秀：〈再告全國人民書〉(1969年11月29日)(鉛印稿)。
- 陸文秀：〈多思〉(1969年12月26日)(鉛印稿)。
- 陸文秀：〈被正式逮捕前的提審筆錄〉(1970年3月15日)，〈被正式逮捕後的第一次審訊記錄〉(1970年3月25日)，〈被正式逮捕後的第二次審訊記錄〉(1970年4月21日)(鉛印稿)。
- 陸文秀：〈思想彙報〉(日期不詳)(鉛印稿)。
- 馬寅初：〈附帶聲明·一，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1959)。
- 黃克誠：〈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人民日報》(1981年4月11日)，第1版。

二、回憶、傳記、年譜

《往事微痕》第5期和15期(自印交流本)。

「毛澤東與我」徵文活動組委會編：《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澤東與我」徵文活動組委會編：《毛主席的光輝》(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澤東與我」徵文活動組委會編：《毛澤東人際交往側記》(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澤東與我」徵文活動組委會編：《在毛澤東身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澤東與我」徵文活動組委會編：《我見到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毛澤東與我」徵文活動組委會編：《我與毛澤東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

「緬懷毛澤東」編輯組編：《緬懷毛澤東》(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56級13班編：《那時我們多年輕(1956-1960)》(內部自印，2004)。

牛漢、鄧九平主編：《六月雪：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第一版)(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力：《王力反思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王希哲自傳：《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學出版社，1996)。

北島、李陀主編：《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卡羅爾(K.S. Karol)著，劉立仁、賀季生譯：《毛澤東的中國》(中譯本)(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

布衣依舊、畢飛宇等著：《生於六十年代》(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

灰娃：《我額頭青枝綠葉：灰娃自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吳江：《政治滄桑六十年——冷石齋憶舊》(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05)。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上、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吳祖光等：《荊棘路：記憶中的反右派運動》(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

吳德口述，朱元石等訪談、整理：《十年風雨紀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經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李海文主編：《中共重大歷史事件親歷記(1949-1980)》(第一、二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李敏：《我的父親毛澤東》(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

- 李新：《流逝的歲月：李新回憶錄》（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下冊）（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北京：春秋出版社、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
- 李銀橋：《走向神壇的毛澤東》（北京：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
- 李蘊暉（鄒世敏）：《追尋》（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
- 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中國農村體制改革重大決策紀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 杜應國（籃子）：《奔突的地火——一個思想漂泊者的精神旅程》（未刊稿）。
- 杜應國（籃子）：《絕地困守（自選集）》（未刊稿）。
- 沈澤宜：《北大，五一九——學生右派們是「怎樣煉成的」》（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
- 和鳳鳴：《經歷：我的1957年》（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6）。
- 周國平：《歲月與性情：我的心靈自傳》（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 孟胡翁編：《夢縈未名湖：北京大學四代校友挑戰應戰懷舊文集》（上、下冊）（香港：香港文藝出版社，2009）。
- 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香港：開放出版社，2007）。
- 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上、下冊）（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
- 者永平主編：《那個年代中的我們》（上、下冊）（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1998）。
- 金觀濤：《我的哲學探討》（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凌耿著，丁廣馨、劉昆生譯：《天籟：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香港：新境傳播公司，1972）。
- 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 徐友漁主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 徐景賢：《十年一夢》（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 馬識途：《滄桑十年》（北京：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
-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
-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 張元勳：《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2004）。
- 張先癡：《格拉古軼事》（[美]加州：溪流出版社，2007）。
- 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
- 張戎著，張樸譯：《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台灣：中華書局，1992）。
- 許覺民編：《走近林昭》（香港：明報出版社，2006）。

- 郭宇寬：《王佩英評傳》(自印本)。
- 陳伯達著，陳曉農編注：《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 陳奉孝、譚天榮：《沒有情節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
- 陳明洋編：《當年事：《南方周末》解密檔案》(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
- 陳曉農編著：《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05)。
- 喬曉陽主編：《生於70年代》(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
- 馮亦代：《悔餘日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楊天石主編，姚鴻本卷主編：《毛澤東剪影》(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 楊勝群、陳晉主編：《五十年的回望——中共八大紀實》(北京：三聯書店，2006)。
- 楊勳：《心路：良知的命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
- 楊澤泉：《回眸一笑：我在太陽不落的日子裡》(香港：五七學社出版公司，2009)。
- 楊曦光：《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 葉匡政主編：《大往事：縱橫歷史解密檔案》(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 葉劍英、劉伯承等：《回憶毛主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
- 董邊等編：《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 廖亦武編：《沉淪的聖殿》(烏魯木齊：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 熊向暉：《我的情報和外交生涯》(北京：中央黨史出版社，1999)。
- 赫魯曉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著、斯特羅勃·塔爾伯特編、上海《國際問題資料》編輯組譯：《最後的遺言——赫魯曉夫回憶錄續集》(北京：三聯出版社，1975)。
- 赫魯曉夫(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著、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
- 趙蘅：《下一班火車幾點開》(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6)。
- 劉仰東：《紅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5)。
- 劉海軍著：《東星北檔案：一個天才物理學家的命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 劉景榮、袁喜生：《毛澤東文藝年譜》(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
- 劉賓雁：《劉賓雁自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
-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1)。
- 鄧力群：《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
- 蕭克、李銳、龔育之等著：《我親歷過的政治運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錢理群主編：《附中：永遠的精神家園》(南京師大附中1956屆校友分會自印)。
-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歷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993)。
- 謝冕、費振剛編：《開花或不開花的年代——北京大學中文系55級紀事》(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2001)。

聶元梓：《聶元梓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羅斯·特里爾(Ross Terill)：《毛澤東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籃子：《山崖上的守望》(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黨史編委會編：《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1994年11月)(傳抄件)。

權延赤：《領袖淚》(北京：求實出版社，1990)。

權延赤：《紅牆內外》(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

三、研究論著

《青年中國(志願者)行動宣言》(內部交流本)。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丁抒：《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台北：九十年代雜誌社，1993)。

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2007)。

丁凱文主編：《重審林彪罪案》(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4)。

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動亂與浩劫(1966-1968)》，《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6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于光遠著、韓鋼詮註：《「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歷史命運——讀史筆記》(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

孔慶東、王嵐、葉文曦編：《我們的詩文》(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王凡西：《毛澤東思想論稿》(桃園：連結雜誌社、香港：新苗出版社聯合出版，2003)。

王友琴：《文革受難者——關於迫害、監禁和殺戮的尋訪實錄》(香港：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2004)。

王年一：《1949-1989年的中國：大動亂的年代》(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王若水：《新發現的毛澤東——僕人眼中的偉人》(香港：明報出版社，2002)。

王紹光：《理性與瘋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眾》(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學泰：《多夢樓隨筆》(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

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從批林到批鄧(1972-1976)》，《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8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布拉莫爾(Chris Bramall)著，李小川等譯：《毛時代經濟再評價——四川：1930-1980》(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布蘭特利·沃馬克(Brantly Womack)、霍偉岸、劉晨譯：《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sadore Schwartz)著、陳璋譯：《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印紅標：《失蹤者的足跡：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青年思潮》(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09)。

- 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 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上、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1989)。
- 朱學勤：《思想史上的失蹤者》(廣州：花城出版社，1999)。
- 米鶴都：《紅衛兵這一代》(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3)。
- 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何方自述》(上、下冊)(香港：明報出版社，2007)。
-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香港：利文出版社，2008)。
- 何明、羅鋒編著：《中蘇關係重大事件述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 吳戈：《紅與黑——牟其中為什麼毀滅》(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1999)。
- 宋永毅主編：《文革大屠殺》(香港：開放雜誌社，2002)。
- 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上、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
- 宋強、張藏藏、喬邊等著：《中國可以說不——冷戰後時代的政治與情感抉擇》(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6)。
- 宋曉軍等著：《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 李洪林：《中國思想運動史(1949-1989)》(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1999)。
-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雅瑪達·伯納(Amanda Bennett)著、林瑞唐譯：《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台北：智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4)。
- 李銳：《毛澤東同志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修訂本改名為《毛澤東同志早期革命活動》(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 杜光：《杜光文存》第23期(內部交流稿)。
- 杜光：《杜光文存·紀念特輯》(內部交流稿)。
-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3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沈展雲：《灰皮書，黃皮書》(廣州：花城出版社，2007)。
- 汪澍白：《毛澤東的來蹤去跡》(自印本)。
- 辛子陵：《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增訂註釋本)(上、下冊)(香港：書作坊，2009)。
- 阮銘：《鄧小平帝國》(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2)。
- 阮銘：《鄧小平帝國三十年》(台北：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
- 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裡沉思——1966-1976年記實》(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
- 定宜莊：《中國知青史——初瀾(1953-195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4

- 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林蘊暉:《國史札記——事件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8)。
- 林蘊暉:《國史札記——史論篇》(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
-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3)。
- 金觀濤、劉青峰:《毛澤東思想和儒學》(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
- 阿尼達·陳(陳佩華)著,史繼平、田曉菲、穆建新譯:《毛主席的孩子們:紅衛兵一代的成長和經歷》(天津:渤海灣出版公司,1998)。
- 洛朗·若弗蘭(Laurent Joffrin)著,萬家星譯:《1968年5月法國的「文化大革命」》(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4)。
- 紀希晨:《史無前例的時代——一位人民日報老記者的筆記》(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1)。
- 約翰·布萊恩·斯塔爾(John Bryan Starr)著,曹志為、王晴波譯:《毛澤東的政治哲學》(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胡平:《禪機:1957苦難的祭壇》(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2004)。
- 胡喬木:《胡喬木文集》(第1卷-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胡鞍綱:《毛澤東與文革》(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 迪克·威爾遜(Dick Wilson)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譯組編譯:《歷史巨人——毛澤東》(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 韋政通:《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
- 韋政通:《無限風光在險峰——毛澤東的性格與命運》(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 唐少傑:《一葉知秋——清華大學1968年「百日大武鬥」》(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
- 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 徐友漁:《形形色色的造反:紅衛兵精神素質的形成和演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9)。
- 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 馬畏安:《高崗饒漱石事件始末》(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 高舉、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 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出版社,2005)。
- 張占斌、宋一夫:《中國:毛澤東熱》(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
- 張良編著:《中國「六四」真相》(上、下冊)(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 張素華著：《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 張鞅東：《毛澤東最後二十年》（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
-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外研究毛澤東思想資料選輯》編輯組編輯：《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
- 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陳一諮：《中國：十年改革與八九民運——北京六四屠殺的背後》（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
- 陳小雅主編：《沉重的回音：1989年天安門運動十五周年紀念文集》（香港：開放雜誌社，2004）。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下冊）（修訂版）（台灣：聯經出版公司，2001）。
- 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
- 陳晉：《毛澤東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
- 陳晉：《文人毛澤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陸益龍：《戶籍制度——控制與社會差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 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流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 麥陽、劉蓬：《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
- 傅國湧編：《林昭之死：1932-1968四十年祭》（香港：開放出版社，2008）。
- 凱瑟琳·奎塞(Catherine Keyser)著，方治立譯：《體改所與政策制定——毛以後中國的專業化研究》（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 單少傑：《毛澤東執政春秋》（香港：明鏡出版社，2001）。
- 彭大成：《湖湘文化與毛澤東》（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
- 斯塔爾、史華茲等著，蕭延中主編：《「傳說」的傳說——外國人怎樣評價毛澤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著，劉尊棋譯：《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
- 馮驥才：《一百個人的十年》（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1）。
- 黃翔：《喧囂與寂寞》（紐約：柯捷出版社，2003）。
- 新島淳良、德里克等著，蕭延中主編：《在歷史的天平上——外國人怎樣評論毛澤東》（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1）。
- 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4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 楊奎松：《「中間地帶」的革命——國際大背景下的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 楊炳章：《從革命到政治：長征與毛澤東的崛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 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濟南：朝華出版社，1993）。
- 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香港：Excellent Culture Press，2004）。
-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
- 董志凱等：《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經濟思想》（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 賈斯柏·貝克（Jasper Becker）著，姜和平譯：《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香港：明鏡出版社，2005）。
-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 鄒讜：《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
- 熊景明、關信基編：《中外名學者論 21 世紀初的中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9）。
- 趙鼎新：《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2007）。
- 劉青峰編：《文化大革命：史實與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6）。
- 劉建軍：《單位中國——社會調控體系重構中的個人、組織與國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
- 劉軍寧主編：《北大傳統與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的先聲》（北京：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
- 劉國凱主編：《封殺不了的歷史》（香港：香港田園書屋 1996）。
- 劉國凱：《人民文革論》（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
- 劉勝驥：《大陸民辦刊物的形式和內容分析：1978-1980》（台北：留學出版社出版，1986）。
-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
- 劉曉：《意識形態與文化大革命》（台北：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
- 鄭義：《歷史的一部分：永遠寄不出的十一封信》（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 盧躍剛：《大國寡民》（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98）。
- 蕭冬連：《歷史的轉軌——從撥亂反正到改革開放（1979-1981）》，《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10 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 蕭延中主編：《晚年毛澤東》（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 蕭延中編：《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二卷：從奠基者到「紅太陽」》（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7）。
- 蕭延中：《巨人的誕生：毛澤東現象的意識起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
- 錢庠理：《歷史的變局：從挽救危機到反修防修（1962-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

- 5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 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
- 錢理群主編:《走近北大》(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錢理群編:《校園風景中的永恆:我心目中的蔡元培》(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 錢理群、劉鐵芳編:《鄉土中國與鄉村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 錢理群:《周作人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0)。
- 錢理群:《壓在心上的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 錢理群:《六十劫語》(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
-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錢理群:《走進當代的魯迅》(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 錢理群:《話說周氏兄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9)。
- 錢理群:《語文教育門外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 錢理群:《遠行以後:魯迅接受史的一種描述:1936-2001》(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4)。
- 錢理群:《追尋生存之根——我的退思錄》(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錢理群:《生命的沉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 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筆記》(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 錢理群:《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北京:中華書局,2008)。
- 錢理群:《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
- 錢理群:《我的教師夢——錢理群教育演講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錢理群:《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台北: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8)。
- 錢理群:《漂泊的家園》(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2008)。
- 錢理群:《致青年朋友》(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8)。
- 錢理群:《論北大》(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 錢理群:《那裡有一方心靈的淨土》(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8)。
- 錢理群:《作教師真難,真好》(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 錢理群:《拒絕遺忘:錢理群文選》(修訂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 錢理群:《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香港:星克爾出版(香港)公司,2009)。
- 錢理群:《活著的理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錢理群:《錢理群語文教育新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 閻長貴、王廣宇:《問史求信集》(北京:紅旗出版社,2009)。
-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

- 羅平漢：《天堂實驗：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6）。
- 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翻譯組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 譚宗級、葉心瑜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內亂與抗爭——「文化革命」的十年》（上、下冊），《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第3卷）（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 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胡堯之等譯：《回憶馬克思恩格斯》（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四、單篇論文

- 《中國合作經濟》編輯部：〈馮志來、陳新宇、楊木水：「兩個半」單幹理論家〉，《中國合作經濟》2008年第9期《中國知識分子的百年鄉戀》專號。
- 支振鋒、臧勤：〈「中國模式」與「中國學派」——「人民共和國60年與中國模式」學術研討會綜述〉，《開放時代》2009年第4期。
- 王年一：〈關於「五·一六」的一些資料〉，《中共黨史研究》2002年第1期。
- 王定：〈狂熱及其災難〉，《南方周末》1998年10月9日，第18版。
- 王啟星：〈王飛、李慎之與毛澤東秘書談民主〉，《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
- 何明星：〈紅色經典的海外遺產〉，《南風窗》2009年第2期。
- 李光彩：〈張玉鳳談毛澤東〉，《悅讀》第18卷。
- 李向平：〈「毛澤東信仰」的現象解讀〉，《南風窗》2009年第6期。
- 李波：〈「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毛澤東對「鴨綠江一號」拖拉機的批示〉，《百年潮》2009年第8期。
- 李凌：〈勇破堅冰的《未定稿》〉，《書屋》2003年第1期。
- 李蔚新：〈9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在中國的復興〉，《當代中國研究》2002年夏季號。
- 杜應國：〈理性的聲音——汪小川《二鋪調查》四十五周年祭〉，《二十一世紀》網路版（2007年5月31日），第62期首發。
- 沈志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出台及中國的反應〉，《百年潮》2009年第8期。
- 周泉纓：〈我心中的文革〉，網上刊物《華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館通訊」（<http://www.cnd.org/CR>）第55期（1999年9月7日）。
- 林蘊暉：〈1956年匈牙利事件引發劉少奇的思考〉，《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
- 金津：〈馬共的革命與終結〉，《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
- 金楓：〈1998：北京之春——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被鎮壓紀實〉，《北京之春》1999年第4期。
- 姚力文、劉建平：〈新民主主義的命運和劉少奇的失敗〉，《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
- 茆家升：〈從《張愷帆回憶錄》看大躍進中的安徽官場和一個人的覺醒〉，《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
- 孫言誠：〈青海二·二三事件〉，《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

- 徐敏：〈王朔與文革後期的城市遊蕩者——以《動物兇猛》為例〉，《上海文化》2009年第1期。
- 徐樂義：〈安徽農村「大包幹」的起源和發展〉，《當代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6期。
- 徐遲：〈《一九五八年詩選》序〉，《詩刊》1959年第1期。
- 馬慶鈺：〈市場經濟呼喚政治改革〉，《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
-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二十一世紀》(香港)2006年2月號。
- 商金林：〈關於《摘星錄》考釋的若干商榷〉，《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0年第2期。
- 曹前發：〈「錯批一人，誤增三億」說之歷史誤讀〉，《百年潮》2009年第12卷。
- 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紀略〉，《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
- 陳映真：〈我在台灣所體驗的文革〉，《亞洲週刊》1996年5月26日。
- 馮敬蘭、劉進、葉維麗、宋彬彬、于羚著：〈卞仲耘之死的另一種陳述〉，《炎黃春秋》2010年第8期。
- 黃宗智：〈改革中的國家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危機的同一根源〉，《開放時代》2009年第4期。
- 溫鐵軍：〈我們還需要鄉村建設〉，《開放時代》2005年第6期。
- 雷頤：〈「麻雀」有故事〉，《炎黃春秋》2009年第2期。
- 裴春芳：〈虹影星光或可證——沈從文四十年代小說的愛欲內涵發微〉，《十月》2009年第2期。
- 趙淮清：〈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炎黃春秋》2008年第12期。
- 趙雲旗：〈中國當代農民負擔問題研究(1949-2006)〉，《中國經濟史研究》2007年第3期。
- 趙德馨：〈新中國六十年經濟發展的路徑、成就與經驗〉，《百年潮》2009年第10期。
- 劉志勇：〈關於建國後至中共九大期間「接班人」問題的歷史考察〉，《當代中國史研究》第8卷第6期(2001年11月)。
- 蔡翔：〈社會主義的危機以及克服危機的努力——兩個「三十年」與「革命之後」時代的文學〉，《現代中文學刊》2009年第2期(總2期)。
- 鄭永年：〈中國改革的路徑及其走向〉，《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
- 蕭功秦：〈困境之礁上的思想水花——當代中國六大社會思潮析論〉，《社會科學論壇》2010年第8期。
- 錢理群：〈一個未完成的歷史任務〉，2009年在大陸知識分子紀念「六四」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宣讀，未公開發表。
- 錢理群：〈和台灣學生的一封信〉，《思想》第15期(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0)。
- 閻明復：〈1957年形勢與伏羅西洛夫訪華〉，《百年潮》2009年第2期。
- 謝韜：〈民主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前途〉，《炎黃春秋》2007年第2期。
- 羅冰：〈反右運動檔案解密〉，《爭鳴》(香港)2006年第1期。
- 鐘舒民：〈正在走向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外交面臨新挑戰，中國智庫要提升國際對話能

力》，《文匯報》2010年8月16日，第7版。

黨國英、于莫：〈中國改革的現代性解析〉，《讀書》2010年第8期。

龔育之：〈農民的偉大首創——《起源—鳳陽農業「大包幹」實錄》的序言和前言〉，《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5期。

五、網站

〈170名黨員、幹部對黨的十七大的獻言書〉，2011年7月27日取自，《批判與再造》(復刊版)：<http://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07/10/02/170%E5%90%8d%E9%BB%A8%E5%93%A1%E3%80%81%E5%B9%B9%E9%83%A8%E5%B0%8D%E9%BB%A8%E7%9A%84%E5%8D%81%E4%B8%83%E5%A4%A7%E7%9A%84%E7%8D%BB%E8%A8%80%E6%9B%B8/>。

〈嶺岬山衛星人民公社試行簡章(草案)〉(1958年8月7日發布)，2011年8月16日取自，為人民服務網：<http://hi.baidu.com/yh909106/blog/item/4861c32b4b3420f8e6cd40cb.html>。

〈零八憲章〉(2008年12月10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零八憲章：

<http://www.2008xianzhang.info/chinese.htm>。

于建嶸：〈中國騷亂事件和管治危機〉(2007年11月5日發布)，2011年5月23日取自，大道網：http://www.methodfirst.cn/cl_in.html?id=129。

劉植榮：〈世界工資研究報告與借鑑〉(2010年3月3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劉植榮博客——飛翔的鐵塔：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904e310100gufv.html。

孫立平：〈中國正在加速走向社會潰敗〉(2010年4月1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中華網：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1638757/2713/17/51/6_1.html。

宋永毅：〈訪X詩社社長鶴慈〉(原載《民主中國》2003年7月號)，2011年8月16日取自，地方文革史交流網：<http://difangwenge.org/read.php?tid=6246>。

李懷宇：〈沈昌文以文會友辦雜誌「談情說愛」當編輯〉(2006年4月5日發布)，2011年8月16日取自，南方網：<http://www.southcn.com/nfsq/ywhc/ls/200604050346.htm>。

李昌平：〈九十年代三農政策基本錯誤〉(2008年1月6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三農中國網：http://www.snzg.cn/article/2008/0106/article_8748.html。

歐陽懿：〈《零八憲章》：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中重要的里程碑〉(2009年11月25日發布)，2011年7月27日取自，零八憲章：<http://www.2008xianzhang.info/Reviews/20091204%20ouyang%20yi.html>。

秦暉：〈「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原刊載於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電子報第1254期，2008年2月22日轉發)，2011年7月27日取自，學術批評網：<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9412&type=1002>〔錢註：本文原刊載於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電子報第1254期。但該網站上目前本文刊載不全，故轉引自學術批評網〕。

秦暉：〈「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改革三十年之我見〉，〈上篇：雙重效率增益與走出「負帕累托」——中國奇蹟1978—1989〉（原刊載於2008年2月21日《南方周末》電子報第1254期），2011年8月17日取自，愛思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秦暉：〈中國更需要民主辯論與重新啟蒙〉（2009年3月8日發布）《亞洲週刊》第23卷第9期，2011年7月27日取自，亞洲週刊：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tt&Path=3104908231/09tt1.cfm。

附錄：課用選文¹

-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
- 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 毛澤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1958年5月18日、20日)。
- 毛澤東：〈為印發《張魯傳》寫的批語〉(1958年12月7日、10日)。
- 毛澤東：〈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第三版)的筆記〉。
- 錢理群自編：毛澤東醞釀與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有關文件
- 毛澤東：〈關於教育革命的談話〉(1964年2月13日)。
 - 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 毛澤東：〈對謝富治在瀋陽冶煉廠蹲點的報告的批語〉(1964年12月5日)。
 - 毛澤東：〈對陳正人關於社教蹲點情況報告的批語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15日)。
 - 毛澤東：〈對中央關於撤銷《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1966年4月14日)。
 - 毛澤東：〈對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批語〉(1966年5月7日、14日)。
 - 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1966年7月31日、8月1日)。
 -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 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1966年8月5日)。
 - 毛澤東：〈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1967年10月)。
-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1957年5月23日)。
- 清華附中紅衛兵：〈三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1966年6月24日、7月4日)(附)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
- 北京市中學生四三派紅衛兵：〈論新思潮——四三派宣言〉(1967年6月11日)。
- 李一哲：〈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1974年10月)。
- 錢理群：〈魯迅與毛澤東〉(1962)。
- 錢理群：〈世紀之交的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對歷史的反思與現實困境——異國沉思錄之一〉(1995)。
- 錢理群：〈拒絕遺忘：科學總結20世紀中國經驗的第一步〉(2002)。

1 本選文為錢理群2009年9月至11月於台灣新竹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開設之「大陸戰後思想狀況——我和共和國、毛澤東六十年」課程時所用之自編教材。該課程另一教材為，錢理群：《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8)。

台灣社會研究論壇

- 01 《戰爭沒有發生？2003年美英出兵伊拉克評論與紀實》|馮建三編|2003年9月出版
- 02 《反思台灣論：台日批判圈的內部對話》|陳光興、李朝津編|2005年6月出版
- 03 《四海困窮：戰雲下的證詞》|趙剛著|2005年4月出版
- 04 《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反思會議工作小組編|2005年6月出版
- 05 《當代中國的知識感覺與觀念感覺》|賀照田著|2006年1月出版
- 06 《批判連帶：2005亞洲華人文化論壇》|陳光興編|2005年12月出版
- 07 《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鄭鴻生著|2006年9月出版
- 08 《當前知識狀況：2007亞洲華人文化論壇》|陳光興、蘇淑芬編|2007年12月出版
- 09 《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錢理群著|2008年8月出版
- 10 《實質民主：人民性的覺知與踐行之對話》|丘延亮著|2008年8月出版
- 11 《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白永瑞著|2009年9月出版
- 12 《魯迅入門讀本》(上、下)|錢理群編|2009年9月出版
- 13 《全球化下的亞洲跨國企業勞工：抗爭的圖像》|張大業編|2010年7月出版
- 14 《重新思考中國革命：溝口雄三的思想方法》|陳光興、孫歌、劉雅芳編|2010年7月出版
- 15 《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白永瑞、陳光興編|2010年11月出版
- 16 《韓少功隨筆集》|韓少功著|2011年8月出版
- 17 《陳映真：思想與文學》(上、下)|陳光興、蘇淑芬編|2011年11月出版
- 18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錢理群著|2011年1月出版

台灣社會研究 季刊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發行人：周渝

社長：徐進鈺

總編輯：王增勇

執行編輯：蔡志杰

助理編輯：廖瑞華

編輯委員：丸川哲史、王瑾、王增勇、白永瑞、汪暉、邢幼田、柯思仁、孫歌、
許寶強、夏曉鵬、夏鑄九、馮建三、趙剛、瞿宛文、Chris Berry、
Gail Hershtatter

顧問：丁乃非、于治中、王振寰、丘延亮、江士林、朱偉誠、呂正惠、
何春蕤、李尚仁、李朝津、李榮武、林津如、陳光興、陳忠信、
陳信行、陳溢茂、許達然、賀照田、黃麗玲、廖元豪、甯應斌、
錢永祥、鄭村棋、鄭鴻生、魏 玟

榮譽顧問：王杏慶、成露西、李永熾、吳乃德、吳聰敏、林俊義、高承恕、
徐正光、梁其姿、蔡建仁、張復、傅大為、鄭欽仁

國際顧問：溝口雄三、蔡明發、濱下武志、Perry Anderson、Arif Dirlik

網址：<http://www.bp.ntu.edu.tw/WebUsers/taishe/>

電郵：taishe.editor@gmail.com

聯絡電話：02-22360556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6395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263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1949-2009)

——另一種歷史書寫 (下) / 錢理群著·初版·

臺北市·聯經·2012年1月(民101年)·376面·

17×23公分(聯經學術)

ISBN 978-957-08-3925-8 (下冊:平裝)

1.中國史 2.現代史

628.7

100023425

聯經學術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 (1949-2009)

——另一種歷史書寫 (下)

2012年1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2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錢理群
策劃 交通大學亞太
/文化研究室
發行人 林載爵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編輯部地址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4樓
叢書主編電話 (02) 87876242 轉 212
台北聯經書房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 (02) 23620308
台中分公司 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暨門市電話 (04) 22371234 ext. 5
郵政劃撥帳戶 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 (02) 23620308
印刷者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 (02) 29178022

叢書主編 沙淑芬
執行編輯 阮芸妍
胡清雅
校對 王中奇
封面設計 黃瑪琍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聯經忠孝門市更換。 ISBN 978-957-08-3925-8 (平裝)

聯經網址: www.linkingbooks.com.tw

電子信箱: linking@udngroup.com